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

志怪與天啟：「聊齋」與「太平天國」敘事群的「近現代性」考察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7-2410-H-004-139-MY2

執行期間：2008 年 8 月 1 日至 2010 年 8 月 31 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高桂惠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須繳交以下出國心得報告：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

處理方式：除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0 月 27 日

目錄

壹、 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貳、 研究目的

參、 文獻探討

肆、 研究方法

伍、 結果與討論

附錄一 <太平天國的剪影——以王韜·《遯窟譚言》為主的討論>

附錄二 <清代筆記中的軍人書寫與太平軍形象之勾勒>

附錄三 <刻錄滄桑與召喚國魂——太平天國的歷史書寫>

附錄四 <太平天國敘事中的親歷文本——以《水窗春囀》為例的思考>

壹、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中文摘要：

本研究計畫擬從三方面進行考察：

一、從語體與文體到文學史觀的勾勒：

在志怪與天國的書寫中理解文學如何透過語言文字及敘事操作，呈現其文藝美學的意義與哲學等相關領域的關係，並試圖由民間搜錄到文人書寫之中，考察大眾文化與菁英論述之關係，在各種語境之創化脈絡中，檢視原有之文學史觀。「聊齋」敘事群是一個志怪傳統文類，積累承載了許多文化的異質想像，續衍作品中常帶著濃厚的「擬古」色彩，逐漸在文化創化中率先進入「讀圖」的「聊齋體」轉化，進而取得「報刊體」新質。而「太平天國」敘事群的異質色彩，借筆記體、傳奇體等各種文類書寫，逐錄見聞、表達感思，二者的「異（新）質」色彩，對於傳統的文學史、小說史建構是否可能有所啟發？以往文學史對「近／現代」的諸多議題與理解，全面考察精英文化、民間文化與西化之間的關係，並且考掘是否仍有尚待解決的新課題？

二、「異質性」、「近／現代性」及啟蒙風景的擗化：

志異與搜神的「異質性」與「近／現代性」有相當程度的對應結構，在文化不斷的衍化歷程中，「過渡性」所呈現的將然而未然的狀態，非常適合觀察社會變動中的文學生態，這一點尤其從小說是由社會中「未經概念化的不滿情緒」，以及「對質量價值的情感性憧憬」而發出來的，其「真實意識」與「可能意識」作為集體意識的辯證中介，是積極且充滿活動力的。因此，有關意識型態的擗化、小說觀念的轉型等面向，在概念化與意識型態之間，都是本計畫考察「近／現代性」的重要切入點。因此，透過兩個敘事群的「文學範式」重構的問題，試圖整理、闡析理性論述與感性言說之間的各種記載，期能貼近這一意義世界，重構、對比出各自從屬的意義轉換群（transformational group），並進而理解中國「近／現代化」過程，如何處理普世型知識和地方型知識的融滲問題，及其啟蒙風景。

三、全球化學術視野下的文化交流考察：

透過《聊齋志異》後續的文學行動與太平天國敘事群的實踐之具體細節書寫，由這兩大敘事群的創作，勾勒其文化交流的動態發展與活力。在文化不斷的衍化歷程中，「過渡性」所呈現的將然而未然的狀態，非常適合觀察社會變動中的文學生態，放在西學東漸或東學西傳的文化交流上審視，富涵時代意義與研究的縱深度。

中文關鍵詞：

《聊齋志異》、太平天國、近／現代性、經典互動、啟蒙

貳、 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是延續本人對蒲松齡《聊齋志異》與紀昀《閱微草堂筆記》的續衍現象，所引發的小說類型學意義、小說閱讀理論、小說文化意涵、小說流派觀等面向，在清代文言小說發展的意義進行深化與轉化，進而進入晚清文化轉型的小說創作語境之考察。

在時代創化轉型中，文體與語體的問題是觀察文化衍化意涵極為重要的切面，如：論者曾觀察元好問的《續夷堅志》，以為此書其雖為志怪小說，然而卻棄其質而存其形，以通俗化語言代之藻飾的文言；以敘事的雙聲話語代之敘事人的單向敘述，擴大了小說的內蘊，增添了生機和魅力，作品在敘事曲折故事的同時也傳達了美的意蘊。《續夷堅志》較之於洪邁的《夷堅志》，其語言顯然包含多層的意義，字裡行間有著作者的寄託、寓意，也就是說，語體的變化促進了文體的創造和發展，《續夷堅志》已然體現了古體小說和近體小說的浸潤與交融，顯示文言小說漸變的趨勢。從金末元初的南北民族融合、文化以及文學交融有關從語體的角度來說，《續夷堅志》開啟了一個通俗文學發展的新時代，推進了雅俗文學的交融（李獻芳 2004）。

詹頌亦曾以乾嘉文言小說作者閱讀視野與作品故事來源的系列考證，指出：自《漢書藝文志》以來，史家小說觀與後起的文藝家小說觀有別，然而清代文言小說卻可見其合流跡象，乾嘉時期的文言小說多顯示作者的博識，文人所使用的文言，在傳統教化框架中是一種權力話語，長久以來建制傳統秩序的合理性（詹頌 2003）。

語體差異這一伏線實際上早已植根在文學發展的核心地位，透過語體與文體的變化，觸發論者在解釋文學於時間和空間上，因社會的變遷及其轉化特點而顯現出來的多樣性。晚清小說界革命的最直接的議題是關注文學題材決定價值的思考方式，但其暗含的前提仍在於如何影響和塑造新型國民，即所謂的「熏」、「浸」、「提」、「刺」。這種考慮接受群體多寡的方式，從一開始就給了白話小說更多的主動，文言小說則由於用語的古雅很難在影響力上更上一層樓。魯迅的困難在於他無法擺脫小說功用的思考，而他對小說功用的思考也傾向於從影響力來判定成敗，不過在對待明清時期的幾部文言小說時，他只能用魏晉志怪和唐人傳奇的傳統來衡量，給出「擬晉」、「擬唐」的小說類型。魯迅的思考重心似乎是放在章回小說一邊，對明清文言小說的考察乃通過表現形式來衡定，比如「用傳奇法，而以志怪」的說法就是十分含糊的，只是根據文本得出的一般印象，而《聊齋志異》在流通中產生的種種變化並沒有被揭示。

20世紀90年代被認為是一個「重讀」的時代，透過新的理論視野，帶來「經典互動」的文化重構工程，所謂「經典互動」就是廣大讀者與經典之間的互動，透過互動，再一次指涉出：經典小說與好小說、暢銷書是不同的概念。「經典」永遠有一個不斷被闡釋的過程，它們幾乎是在被反復地述說、感悟中變為常識，並且通過文學教育的指認，成為一個民族乃至人類共同認同的東西。寫進文學史與小說史的，大都具有了某種經典的意味。因此，當我們再一次回顧明清文言小說與通俗小說、白話語體改革、雅俗文學的交融辯證時，《聊齋志異》的續衍及其走進報刊專欄、圖說《聊

齋》的率先進入「讀圖」時代；以及傳統筆記體由方志、鄉野奇譚、到時事傳聞的類似今日「全民寫作」的大眾參與，在在都提供我們觀察文體與語體轉變過程中的時代創化現場。

此外，從「太平天國」過去的研究基礎上，除了農民革命思想與基督教思想的關係研究；、封建性與革命性的評價；太平天國宗教的中西混雜性與衝突性；客家文化對太平天國教義影響，客家「歸宗」觀念對一神教和「小家庭」觀念形成的作用；太平天國與外國教會的互動關係等等，都一再突破傳統史觀的局限，表現出勃發的學術生命力。太平天國史是近代史領域的重要領域，也帶給史學研究相當多的新意，然而對太平天國的文學創作之研究，仍徘徊在學術視野邊緣，較多停留在眾說紛紜的「佐談」中，對相關文學的創作及價值化問題，尚缺乏系統性、創新性，是以值得在新視野、新資料中繼續挹注關切。

本計劃的設想是：「聊齋」敘事群是一個志怪傳統文類，積累承載了許多文化的異質想像，續衍作品中帶著濃厚的「擬古」色彩，逐漸在文化創化中率先進入「讀圖」的「聊齋體」轉化，進而取得「報刊體」新質。而「太平天國」敘事群的異質色彩，借筆記體、傳奇體等各種文類書寫，逐錄見聞、表達感思，二者的「異（新）質」色彩，對於傳統的文學史、小說史建構是否可能有所啟發？原來文學史對「近／現代」的諸多議題與理解，是否仍有尚待解決的新課題？以及全面考察精英文化、民間文化與西化之間的關係之介面的可能？

參、文獻探討

一、有關《聊齋志異》傳播與接受的探討

《聊齋志異》不僅在蒲松齡寫作之時已引起文人圈的詮評，後更導致紀昀《閱微草堂筆記》與之抗衡，帶來小說觀念與書寫流派的意識，如：歐陽健先生曾以《聊齋志異》的仿作《益智錄》的傳播與接受為例，指出《益智錄》的作者解鑑，主動將篇章與文人圈的好友分享，成為茶餘飯後的話題，待成書之後，有多位同鄉文士為之作序，皆在閱讀之後給予中肯讚賞，非浮泛溢美之辭，更有二任知縣葉圭書購書而讀，在跋中盛讚才華，並且生發未能及時舉才之憾。說明此乃《聊齋》盛行，已獲文人集體認同，方使解鑑得因為此「小道」而成名。對照於《聊齋》成書之初，好友多勸以經世致用之業，最後乃有高衍以「《易》之冒道」為理論依據，指出聖人原包容萬物，為「異」正名，勉強為「誌異」之書掙得一席生存餘地，實不可同日而語（歐陽健 2003）。

此外，歐陽健先生曾以《聊齋志異》續書中的沈起鳳之《諧鐸》為例，比較小說取名《諧鐸》的原因是：「諧」體現諧趣故事及生活片段，「鐸」則是由「諧」引申出來的「教」，有別於「異史氏曰」的史家「斷」筆。這種觀察「鐸」筆與「史」筆一教、一斷的差異頗有新意。歐陽健並補述《續諧鐸》乃沈氏「初草未刻」，僅有故事（「諧」）而無鐸，後乃有饒世恩續其「鐸」而書成（歐陽健 2003）。一般文學觀念認為士人恥為小說，故多用筆名，但此一時期文人卻競相寫小說以為自我標榜，並且嚴肅為之，實為饒有意義的現象。

清代乾嘉之後，《聊齋志異》的影響愈演愈烈，學者指出：清代仿聊齋小說的大量出現，出版事業的活絡是重要原因之一，續仿聊齋必須注意到維繫連續性與變異性之間的平衡（模擬提示著仿聊齋派與原著的連續性，使其中的類型規範不致於在衍承中變形、走樣，而新創則體現為新文本對原著的變異，它是自身質地相對獨立於並有別於原著的標誌。）以及把握熟悉度與陌生化之間的分寸（莊逸雲 2004、劉富偉 2005）。

之後，晚清產生的「聊齋體」又出現了新的因素，即：圖像的「聊齋體」和文字的「聊齋體」，於是又提供我們探究另一種經典確立的獨特邏輯，即溝通一種新的文本理解方式——圖與文的結合。1886年同文書局根據呂湛恩注本重新印製的《聊齋志異圖詠》，作為當時《申報》主筆的何鏞，即指出：並不是所有聊齋的每篇文字都是孤憤之作，「其事非盡為刑天舞戚」。他肯定的是圖像的重要作用。何鏞的新序之所以不同于王士禛，是因為他認為《聊齋志異》說出了一些平常的道理，但不能用微言大義的方法來解讀。之前但明倫或何守奇等人的序言題詞，便常以理解經典的方式思考《聊齋志異》，可是《聊齋志異》本身固有的詼諧性卻屢屢在這種正襟危坐的閱讀裏消失了。透過插圖，這種充滿娛樂性的想像反而不時閃現靈光。因此，何鏞的解讀方式提供了讀者另外一種解讀《聊齋志異》文本的可能性，不再以《聊齋志異》是不是經典為不可不讀的前提，而是注重讀者在何種方式上能與作者更為容易的交流？這也是他稱讚繪事者「在山經爾雅之外，別開生面者也」的重要原因（游友基 1999、黃錦珠 1999、李彥東 2003、崔美榮，胡利民 2007）。

廣百宋齋的《詳注聊齋志異圖詠》出現以後，出現了很多與之畫法相類的插圖本文言小說，比如掃葉山房本，但水準與廣百宋齋本懸殊。掃葉山房以下，則都是俗陋的濫造之流。《螢窗異草》、《夜雨秋燈錄》等文言小說，也有插圖。廣百宋齋主人在《例言》中曰：「每圖俱就篇中最扼要處著筆，嬉笑

怒罵，確肖神情；小有未洽，無不再三更改，以求至當，故所畫各圖，無一幅可以移置他篇者。」（陳平原 2003）

戈公振寫作《中國報學史》時，用「聊齋體」的總體印象來概括晚清圖畫業的基本特徵。圖像視野中的聊齋，巧妙消解了「經典」的標準問題，而以讀者對文本的圖像理解取而代之。1886—1929年，在上海各石印書局出版的13種聊齋本子中，基本都是以同文本或知不足齋本為底的圖詠本。《聊齋志異》的重要性也在圖像的傳播中深入人心。學者指出在1872-1911年這段時期的《申報》小說廣告中，有139則是關於插圖本小說的，插圖數量的增加一直是晚清書坊主在廣告中大肆宣傳的賣點之一，作為一種直觀的藝術，插圖本身就是對小說的一種廣告，它既是小說內容的一部分，也是對小說的一種宣傳。作為一種軟性的廣告手段，插圖對小說的宣傳比一般的廣告更為奏效，對讀者的吸引力也更大，能夠使很多原本不讀小說的潛在讀者加入到小說讀者群中來，以至於很多孩子也被吸引，為了看圖，去買這部比通俗小說難懂很多的文言小說，讓文言小說和通俗小說一樣受歡迎，可見插圖的廣告作用，的確發揮到了極致（劉穎慧 2006）。

由《聊齋志異》的傳播與接受，學者在裡面考掘文人圈詮評與創作生態的變化，並觀察續衍當中對的文化生產機制及其生態的回應，使我們對於理解小說觀念的現代化轉型、文學史脈絡化以及文化史的演變，提供了更為豐富的訊息。

二、《聊齋志異》的傳播續衍與「太平天國」的斷片

《聊齋志異》是在西方國家流行較早的一部中國古典文學名著。鴉片戰爭後，單篇的英、法、俄文《聊齋志異》先後問世。外國傳教士或以之介紹中國文化；或翻譯《聊齋志異》故事做為語文教材（史革新 2007）。晚清時期中西文化交流既有西學東漸，也有東學西傳。來華的外國傳教士、學者、外交官以及少數中國學者，充當了向世界各地傳播中華文化的媒介。被譽為「外傳中華文化的先行者」王韜(1828~1897)，他創作的《淞隱漫錄》先是單篇在《點石齋畫報》上連載，光緒十三年由點石齋結集成書，題名為《淞隱漫錄》，緊接著就有上海大同書局的翻版（亦在光緒十三年），書商逕直易名為《後聊齋志異圖說》，但書函外套仍然保留原來的題名。王韜《弢園著述總目·淞隱漫錄》所謂「是書——初散編於畫報中，頗膾炙人口。後點石齋主人別印單行本行世，而坊友旋即翻版，易名曰：《後聊齋志異圖說》。」即指此事而言。後來上海鴻文書局和積山書局又把它改名為《繪圖後聊齋志異》，用原版縮印發行。除此之外，其他如徐昆的《柳崖外編》被改名為《續聊齋志異》，宋永嶽的《亦復如是》先後被易名為《聊齋補遺》、《志異續編》以及《聊齋續編》、《續聊齋志異》，許奉恩的《里乘》被改題為《留仙外史》等，是書坊主出於「媚俗」與「牟利」的目的，而借《聊齋》的幌子來謀求銷路。

而王韜另有小說《遁窟謠言》是少年之作，是因他化名黃畹上書太平軍而受到清廷通緝，而遁跡香港後創作的，因此這部小說孤憤之情，對現實社會有一定程度的譴責。但此時他仍有積極用世之心，他認為「遁」的意思，不是心存逃世，志在山林，匿跡終身於荒陬窮窟，而遁世實際與用世殊途同歸；寫志怪小說，「亦緣旨寓勸懲，意關風化，以善惡為褒貶，以貞淫為黜陟，俾愚頑易於觀感，婦稚得以奮興」，《遁窟謠言》「斯編所寄，亦猶是耳。」（《自序二》）

《遁窟謠言》一書記敘粵地風情故事、太平天國燒殺搶掠題材以及涉及作者坎坷生平和外國風物的小說，應當是王韜遁居香港後的一部分作品，占全書三分之一的份量，具有一定的現實傾向（詳參

附錄)。而書中大部分寫人鬼相戀、人情世態的小說，其中篇幅短小、情節簡單、筆法樸拙。此外，王韜小說有許多反映社會時作的作品，如《遁窟謔言》就有二十多篇作品反映太平天國起義，像《傳鸞史》、《範德鄰》、《無頭女鬼》、《江西神異》等，在部分表現太平天國題材的作品中，王韜基本持否定態度，將太平軍稱為「賊」、「寇」、「逆」，並責難他們燒殺擄掠、殘害婦女的罪惡行徑。學者認為這是王韜在太平天國失敗之後，向清廷洗刷自己、表明心跡的一種舉動。另有一些作品反映開辦洋務，也有許多作品描寫妓女優伶的風流生活，。這些作品和王韜生平嗜酒好又「好狹邪遊」的生活有關（王馨雲 2004、游秀雲 2005、王曉文 2005、陳俊啟 2006、湯克勤 2007）。

王韜創作《淞隱漫錄》、《淞濱瑣話》是傳奇小說集，《遁窟謔言》亦如《聊齋》之一書兼二體，有傳奇與筆記體。他的另一本著作《甕牖餘談》則多是筆記體，此書對於清代《聊齋》與《閱微》兩部著作均有所取攝，但其特色在於申報館新型態的出版方式，如配圖、隨寫隨刊等，使王韜在題材、內容形式均有了不同的表現方式，這或許是「聊齋體」轉變至「報刊體」的一種過渡。英國商人美查（尊聞閣主人）在 1872 年創刊於上海申報鼓勵王韜寫作，兩者互動之下產生的作品亦值得觀察，申報館曾刊登廣告，搜求新奇豔異幽僻瑰緯的書，對於當時的寫作風氣應也造成了一些影響。《甕牖餘談》一書，其實也載錄了許多太平天國的掌故見聞，論者以為有史料價值（凌碩為 2007）。

由上述例子可見，王韜是觀察文言小說與時事小說、翻譯小說等不同創作面向的一個絕佳個案，類似於王韜的作家群，如創新詞「近事小說」為主要書寫，有《洪秀全演義》、《宦海潮》、《宦海升沉錄》等作品的作者黃小配也是絕佳的例子（梁冬麗、紀德君 2006），在時代的巨大變化中仍有待考掘。

此外，在蒲松齡研究中有謂其為西域回族後裔（羅香林、羅敬之 1970）；有駁斥「般陽土著說」而繫聯為蒙古貴族者（蒲喜章 2000）。這些或從「不食豬肉」的飲食書寫判斷；或是詮釋蒲氏由回、耶一神教到多神信仰變化；或放在「西域人華化考」脈絡來看，都已積累相當問題意識，對我們再一次檢視《聊齋志異》的文化轉型意義甚有啟示，尤其放在西學東漸或東學西傳的文化交流上審視，富涵研究的厚度。

三、「太平天國」研究與文學「近／現代化」研究連結的嘗試

太平天國史研究自太平天國敗亡後，清方曾從宣揚「皇清武功」的角度，陸續刊行了《欽定剿平粵匪方略》、《平定粵寇紀略》、《湘軍志》等公私著述，片斷、歪曲地記述了這段歷史。除此之外，民間談論太平天國始終是一件禁事。直到 20 世紀初的辛亥革命前夕，這一禁忌才被打破。在 1949 年之前，主要表現在史料發掘和史事考訂方面。其中，蕭一山、郭廷以、簡又文、羅爾綱、謝興堯等人筆路藍縷，是該專題研究成就卓著的第一代學者。

在 1949—1964 年間，太平天國史研究空前活躍，其研究人數之壯大，研究成果之豐富，在中國近代史各專題研究中首屈一指。與此同時，歐美學術界對太平天國史的研究也達到了一個高潮，陸續出版了一批重要論著，太平天國與美國內戰、法國大革命均成為歷史專業博士論文的熱門選題。在日本和港臺地區，太平天國史研究也同樣受到學者們的高度重視。1958 年和 1962 年，簡又文的兩部巨著《太平天國典制通考》、《太平天國全史》相繼在香港問世，尤為引人注目。太平天國史研究此時已真正成為一門世界性的熱門學問。不過，這一時期的研究也有偏差，主要表現為在理解和運用唯物史觀時存在著簡單化、教條化的傾向，一味地美化太平天國。曾有學者指出此時期「在太平天國的研究中，

尤其是在關於這次革命性質的討論中，發生過個別歷史家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望文生義、斷章取義、牽強比附使之從屬於自己的成見的現象（靳一舟 1961）。

1964—1976 年間研究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將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畫等號。如對李秀成的批判，持肯定態度的學者竟被視做「站錯了立場」，單純的學術問題被無端上升為政治問題。羅爾綱因堅持認為李秀成此舉是「苦肉緩兵計」而受到衝擊；苑書義、茅家琦、祁龍威等學者不同意戚本禹全盤否定李秀成的觀點，認為李秀成雖晚節不保，但功大於過，結果也被扣上「叛徒李秀成辯護士」的大帽子，遭到打壓。

二是影射史學氾濫成災。影射史學的實質是將歷史上的個別事例或局部現象加以普遍化、絕對化，以迎合現實政治的某種需要。在 1974 年掀起的「評法批儒」運動中，梁效之流又肆意曲解歷史，將洪秀全與楊秀清之間的權力之爭定性為「反孔派」與「尊孔派」之間的路線鬥爭，將天京內訌的起因說成是「尊孔派」篡權，意在影射、攻擊周恩來。一時間，太平天國史被肢解得支離破碎、面目全非，史學研究的科學性、嚴肅性蕩然無存。

三是給歷史人物貼政治標籤成為人物研究風行的模式。按照這種模式，洪秀全被塑造成完美無缺的農民革命領袖，並以他的是非為是非，將楊秀清定性為「野心家」，韋昌輝為「階級異己分子」，石達開為「分裂主義者」，李秀成為「叛徒」，簡單化、臉譜化的研究形成當時的學術風貌。

直至 1979 至 1999 的 20 年間，太平天國史研究較為突破，尤其是在 90 年代初，更是達到了鼎盛時期。與此前的 30 年相比，舊課題的研究進一步深入，新課題的研究得到開拓，研究範圍幾乎覆蓋了太平天國史的每一個層面；其層面涵括了：文獻史料的編纂出版和相關研究；關於太平天國政權性質等問題的討論；人物研究；政治研究、軍事、外交、經濟、文化研究；典章制度研究；宗教和區域史；社會史研究；一批工具書和大型通史類專著的問世等方面（夏春濤 2000）。

台灣對「太平天國」研究，以台灣大學政治系盧瑞鍾《太平天國的神權思想》的博士論文（1984）、政治大學歷史系王超然《天啟與實現：洪秀全的異夢及其太平天國》的碩士論文（1990）、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黃郁修《張笑天《太平天國》小說藝術研究》的碩士論文（2003），開啟了政治、歷史、文學的一些面向。此外，散見於期刊的「太平天國」通俗文學與通俗劇論述，如：于淵（1970）、吳文薰（1999）、王怡仁（2000）、王愛松（2001）、沈嘉榮（2001）、曾曉凌（2001）以及若干網路期刊則較不具學術嚴謹性。

本人在〈水滸故事傳播中的江湖與江山——以明·陳忱《水滸後傳》的「地景書寫」與「場域效應」為主的討論〉一文曾指出：孫中山領導興中會時引天地會在康熙年間之後的這一段歷史，說明民族主義根苗藉民間形式保存的隱曲。在長遠的歷史中，這些遺（殘）民，根據自己的歷史觀與道統理念，重新打造自己的歷史、自己的「江山／江湖」版圖。「演戲」、「不平之心」、「復仇之事」等等儀式化與情節化，成為傳播一再複製的變體，而其核心為民族主義「根苗」，透過播散種子的策略，實由明清之際一直傳演到了清末，「創業」即為其異質力量之想像核心。這種創業史具有史詩性質的美學特徵，可視為水滸式的「史詩英雄」後期組曲之主調，是英雄末路的歷史長考，卻使我們無意中瞥見「建國」的靈光與啟發，透過沒有邊界的想像，或可使歷史生發跨時代的巨響。（高桂惠 2007）

因此，本人試圖繼續追問的是：這些具有「史詩英雄」組曲之藝文想像，是否另有可資比較的文本書寫？不論太平天國做為「意識形態」的核心所引發的歷史、宗教、政治等研究；或是做為文化創發的原型所生產的文學、戲劇、影視等創作，都不亞於《水滸傳》、《聊齋志異》等小說續衍現象的豐富多元。尤其「太平天國」宗教之特殊性，與西方傳教士之介入，在中國「近／現代化」過程中所呈現的全球性意義，以及民間下層啟蒙（李孝悌 1992），甚至可以說是多層理啟蒙的觀察價值。對民國以來梁啟超和國粹派所關注的「民史運動」，以「民史」代替「君史」的「正史範式」重構的理念，回應到明代《水滸傳》等「民變」、「黨社」之研究角度（吳晗、羅爾綱、張蔭麟），「太平天國」研究在文學方面的不足仍有極大的探討空間，尤其是在通俗文學的發展，以及庶民文學的建構方面。

選擇聚焦太平天國敘事群和《聊齋志異》續衍研究之對應，乃在於宗教所引發的「可能意識」（conscience possible. Goldmann, Lucien 1965）的傳播與理解，這兩個敘事群都具有某種意義的民間意識型態的結構對應關係（homologie），透過文學創作以及接受、評論的不斷辯證和擴散視野，期望更貼近「近／現代化」中文學發展的一些面向。

肆、研究方法

本人近兩年國科會計畫針對《聊齋志異》與《閱微草堂筆記》續衍之辯證，在異端譜系中知識概念所衍伸的類型變化，觀察《聊齋志異》的大量仿擬、續作中形成典範與典範的複製操作，考察這種操作性質對鬼怪的異質他性的影響及發展；以及由搜神、志異的地理志書寫方式到理學、心學、三教等的知識概念之演變如何影響到通俗書寫的議題；並對異質書寫如何透過象徵隱喻的手法，形成豐富的意義轉換群 (transformational group)，進而理解中國神話世界意義之域，以及故事群由民間搜錄到文人書寫之中，大眾美學與小眾藝文之關係。

透過上述研究過程，發現志異與搜神的「異質性」與「近／現代性」有相當程度的對應結構，在文化不斷的衍化歷程中，「過渡性」所呈現的將然而未然的狀態，非常適合觀察社會變動中的文學生態，這一點尤其從小說是由社會中「未經概念化的不滿情緒」，以及「對質量價值的情感性憧憬」而發出來的，其「真實意識」與「可能意識」(conscience possible 高德曼 Goldmann, Lucien 1913-1970) 作為集體意識的辯證中介，是積極且充滿活動力的。因此，有關意識型態的擄化、小說觀念的轉型等面向，在概念化與意識型態之間，都是考察「近／現代性」問題很好的切入點。

本計劃依作品蒐錄及系統的閱讀累積，將針對不同系統的創作進行觀察，相關敘事群的文化闡釋其基本點，是把文化理解歸結為「經典」的重讀及界定。做為文化文本的文學批評所關注的是書寫現象、作家作品的綜合語境、文化類型和文化系統結構以及它們自身的話語、型態、運作過程，它們之間的對話、溝通、整合所發現的一些共同性問題和個別殊異的比較等等，以「小說敘事學」的理路進行文本分析；也就是對小說家在具體創作活動中，如何透過各種敘事行為來述說故事作為分析對象(徐岱《小說敘事學》1992)，這種意義上的「經典」閱讀是對小說史的擴寫與文學史的重寫，而擴寫、重寫的過程使「經典」得到進一步的確定，只有擴大的「經典」，才能獲得在文學史上地位的相對永恆。

因此，對於小說史的整體理解，以及因商品經濟而大量刊刻的小說所蘊藏的傳播力量和廣大的文化負載，期望賦予更整全的參照。續衍現象對原著的閱讀與再創造，不僅細緻的表達了讀者接受的文學現象，也傳遞了文學語境的細緻轉折，對明清時期經歷典範轉移的白話/文言的語境變換或可有更立體而有力的見證。

伍、結果與討論

〈清代筆記中的軍人書寫與太平軍形象之勾勒〉一文¹從兩大面向來考察清代筆記小說中的軍人書寫。首先，以清代筆記小說中的軍人書寫作一整體的考察，指出清代筆記中富含類型意識的軍人形象書寫，既有正面價值的軍人形象，也有漁色、術士化等異質性存在。其次，則以寫太平天國亂事的筆記為主，探討王韜《甕牖餘談》對太平天國之亂的描寫。蒲松齡以憤書為軍人形象書寫基調，不免其幽微感慨的特質；紀昀對軍人這一群體透過類型意識的內化，以及其後之續衍筆記小說家的集體勾勒軍人形象，是對傳統精神價值譜系的回望靈光。王韜書寫軍人形象的不容易歸位，也不容易定調，正是由於當時軍隊組織的凝聚力鬆散和缺乏共同的政治傾向所致，地方士紳集團建構的軍事組織概念與正規的清軍組織有著明顯差異，相對於清代筆記小說的書寫，王韜《甕牖餘談》中面對無論是清軍還是太平軍方，雖然放在傳記或對政治的批判語境中進行，他仍不分陣營的展演出「軍人」以潑灑熱血、燃盡生命而成就的悲壯美。這是不同於蒲松齡、紀昀對軍人的理想角色期待，王韜屏除了敵我之分，對軍人的驍勇氣慨投以審美眼光，並關注不同軍人個體之獨特性，一方面正映現了傳統文人經由士紳階層的轉化，到了晚清洋場才子的個人印記，以及那價值轉型中的難言處境。

而有關太平天國的研究，本人即曾以王韜《遯窟謔言》為考察對象指出：《遯窟謔言》中有關太平天國為主的相關敘事，乃是立足於「豔異」的書寫傳統、以弱抗暴的虛構意識、亂世中道德抉擇與出處境遇的反思，表達對太平軍亂世的直觀感受，透過「遇仙」、「遇豔」以及「遇鬼」的文化語境，再一次檢視那個岌岌可危的世界。這種置於「聊齋」仿擬語境下的太平天國書寫，一方面符合於那個時代經典確立的獨特邏輯，另一方面則期望借傳統文類與語言的文化圈慣性，提供溝通新的文本理解方式，這又是另一種以虛擬語境創作的歷史敘事。²

〈刻錄滄桑與召喚國魂——太平天國的歷史書寫〉一文指出：太平天國運動由本地、家鄉到國家順序這一「內部觀點」的提出，引發我們再往內部深掘的視角。當戰場小聚焦到日常生活，並具體的落在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生死呼吸的瞬間，它們累積的情感思想，匯聚為時代總重量的歷史書寫，或者可以理解為神啟權威與世俗理性的遭逢，然而，在這一歷史性相遇，表面上二者之間似乎並未帶來實質性的對話，因為疾病、瘟疫、飢荒，接踵而來的社會危機使人間烏托邦的理想，及人類自我道德約束力幻滅，卻同時又召喚著受苦心靈對文化的新認識和詮釋，或至少是對文化的再確認。刻錄滄桑與召喚國魂並置互存的紀錄，說明當現實中的一切事物，連同現實自我的生命、生存都成為一種觀看的對象，而神佛遭「團練之勇」、「歛財之貪」者擬象或仿真時，軍事目的的手段，以及宗教技術化，更模糊了正統與異端的等級次序。不同於晚明遺民對故國頻頻回首的篤定眼神，太平天國運動實已深深撼動中國人心的「內部視野」。³

此外，以親歷文本之「現在式」的文字，以及事後回顧的視野；或者是仿擬語境中的神（鬼）話

¹ 高桂惠〈清代筆記中的軍人書寫與太平軍形象之勾勒〉，「嘉義大學第四屆中國小說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2009.10.30.31。

² 高桂惠〈太平天國的剪影——以王韜·《遯窟謔言》為主的討論〉，「玄奘大學第一屆東方人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玄奘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中心，2009.06。

³ 高桂惠〈刻錄滄桑與召喚國魂——太平天國的歷史書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2009 敘事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2009.11。

製造，正指出這一段歷史敘事叢豐富的「敘事驅策」(narrative imperative)，提供了創作者將生命中的某些感受、理解或是記憶鋪敘並尋求自我解釋的慾望與衝動。因此，每一個描述視角對後人的體悟與理解重點是「裝框」的歷程，視框分別出自不同身份者的觀察視角，他們由各自的立足點出發，記錄曾經看到的一切。「視域」以及「時間」影響這些撰述者對過去歷史的感知，作者選擇性地建構其記憶，由現在審視過去，賦予過去意義，可以說，撰寫時的立足點便顯得分外重要。〈太平天國敘事中的親歷文本——以《水窗春曉》為例的思考〉⁴一文即從一個幕僚的視角切入太平天國年間相關的敘事，考察作者如何從親身的經歷去表達幽微的感知與隱含的批評，在歷史人物尚未完全定論之前，面對瞬息萬變的兵燹，以及詭譎多變的官場，清軍內部的視野，毋寧也是一種理解太平天國的方式。

《水窗春曉》的作者歐陽兆熊是當時清庭中流砥柱的權臣之幕僚，透過他片段、側面與私密的書寫，我們看見歷史層峰人物「不為人知」的那一面；與正史文體比較，稗官野史的形式與修辭與其披露的內容互為表裡。我們知道書寫者的立場常會影響其觀看視角與認知結構，而其融入書寫當中的敘事模式、關注與排除的書寫對象，會形成一種遺留於文本之內，而可與文本之外的時空對話的感知結構。體制形塑某種書寫形式、規範某種內容，使其操持真實權威的話語，例如檔案，仍容有虛構的空間。問題是，「真實」的概念一如對神的信仰，不容一絲懷疑，當有檔案中有所虛構，而且並非全然是人為偽造，而是文類本身的侷限，當檔案的建構性被揭露，「真實」所賴以昂揚獨立的基礎也就危殆不定了。在志人史傳的文本傳統要求下，歐陽兆熊蒐集、編纂曾國藩與左宗棠的許多軼事，這些軼事對正經正典的歷史人物「記載」反成了月旦臧否的插針之處，透過此，我們得以看見官方歷史大敘述之下的裂隙，這裂隙使得「真實」產生其他可能性。除此之外，對清庭與非災區的北方官民來說，曾國藩、左宗棠等可謂大清三傑，但由於歐陽兆熊持史傳的蓋棺論定寫法，對人物的褒貶躍然紙上，距離文學渲染的英雄形象，仍有一大段距離。透過幕僚之眼的近距離觀察，都轉化為歷史現場的小人物，有許多喜怒哀樂與爭議性的話題不斷湧現。

透過親歷文本，我們得知不同身份與階級在這場大動亂中的的想法、感受和行為。某種程度來說，做為「重讀」歷史文獻的我們，同時也是躋身重塑歷史者，這種文本，脫卸我們當代史料之眼，轉而著重其中情緒、敘事手法與文體形式差異的意涵（前者為編年，後者類志人筆記），儘管各異其趣，豐富我們對太平天國的深層理解之外，這些立足邊緣位置的書寫，不自覺象徵了一種時代尚未消化的文化價值，對於動亂前後的文化系統來說，「他們」接下來的活動，會形成一種必然的歷史價值轉換的媒介。

⁴ 高桂惠〈太平天國敘事中的親歷文本——以《水窗春曉》為例的思考〉，《東亞漢學回顧與展望》，長崎中國學會會刊《創刊號》，頁 234-246，2010 年 7 月 24 日。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1.〈清代筆記中的軍人書寫與太平軍形象之勾勒〉，第四屆中國小說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10

2.〈太平天國的剪影〉，第一屆東方人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06

3.〈太平天國敘事中的親歷文本〉，長崎中國學會會刊《創刊號》，2010.7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透過一系列的「太平天國」書寫的「重讀」，對這一段近現代歷史的再審視，可以深化我們對自己所生存的時代氛圍有另一些參照面向。一方面是由文學去回顧官方意識所建構的史料之真實性問題；二方面則由親歷文本之「細讀」，去檢視歷史人物神話化之前的形象；三方面由文學造史、志怪造史、民間傳奇英雄之造史等面向反思歷史感知的問題。如果說：「百年建國」是一個重要的當代議題，孫中山以為「建國」靈光的太平天國之種種理解，應也是這一當代議題之重要立足點。本研究的關懷，是一個民族心靈在中西交匯點的「現場」測繪。

太平天國的剪影——以王韜·《遯窟譚言》為主的討論

*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高桂惠

提要：

本文選擇考察《聊齋志異》續衍之下王韜的《遯窟譚言》中有關太平天國為主的相關敘事，乃在於這些敘事具有某種意義的民間意識型態和文人圈的小眾群體之結構對應關係 (homologie)，透過文學創作以及接受、評論的不斷辯證和擴散視野，期望更貼近文學創作參與「近／現代化」發展過程的歷史剪影。文中透過作者的創作歷程、文本的具體分析勾勒，考掘王韜的《遯窟譚言》乃是立足於「豔異」的書寫傳統、以弱抗暴的虛構意識、亂世中道德抉擇與出處境遇的反思，表達對太平軍亂世的直觀感受，透過「遇仙」、「遇豔」的鎮痛模式，以及「遇鬼」的文化「他性」之凸顯，再一次檢視那個岌岌可危的世界。《遯窟譚言》既有「鐸筆」之勸懲，亦具「史筆」之評斷，更饒「戲筆」之諧謔，其雜化的特性，實與晚清文化政治諸面向快速轉型，以及為了喚起更深層的文化印記，並以聊齋等文言小說的文化圈來自我定位的寫作意圖有關。

關鍵詞：太平天國、《聊齋志異》、《遯窟譚言》、王韜、近／現代化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 97-2410-H-004-139-MY2 的部分成果，於玄奘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中心主辦之「玄奘大學第一屆東方人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2009.06），感謝與會先進賜與寶貴意見。

一、前言

太平天國研究自太平天國敗亡後，清方曾從宣揚「皇清武功」的角度，陸續刊行了《欽定剿平粵匪方略》、《平定粵寇紀略》、《湘軍志》等公私著述斷斷續續記述了這段歷史，除此之外，民間談論太平天國仍是一件禁事。直到 20 世紀初的辛亥革命前夕，這一禁忌才被打破，在 1949 年之前，主要表現在史料發掘和史事考訂方面。

此後，太平天國研究與美國內戰、法國大革命均成爲歷史專業博士論文的熱門選題。在日本和港臺地區，太平天國史研究也同樣受到學者們的注意，1958 年和 1962 年，簡又文的兩部巨著《太平天國典制通考》、《太平天國全史》相繼在香港問世，尤爲引人注目，太平天國史研究此時已真正成爲一門世界性的熱門學問。不過，這一時期的研究也有偏差，主要表現爲在理解和運用唯物史觀時存在著簡單化、教條化的傾向，一味地美化太平天國。

而在 1974 年掀起的「評法批儒」運動中，學者將洪秀全與楊秀清之間的權力之爭定性爲「反孔派」與「尊孔派」之間的路線鬥爭，將天京內訌的起因說成是「尊孔派」篡權，意在影射、攻擊周恩來。這種影射史學的實質是將歷史上的個別事例或局部現象加以普遍化、絕對化，以迎合現實政治的某種需要，一時之間，太平天國史的史學學術性遭到嚴重扭曲。

1979 至 1999 的 20 年間，太平天國史研究有一些進展；尤其是在 90 年代初，更是達到了其鼎盛時期。與此前的 30 年相比，舊課題的研究進一步深入，新課題的研究得到開拓，研究範圍幾乎覆蓋了太平天國史的每一個層面；其層面涵括了：文獻史料的編纂出版和相關研究；關於太平天國政權性質等問題的討論；人物研究；政治研究、軍事、外交、經濟、文化研究；典章制度研究；宗教和區域史；社會史研究；一批工具書和大型通史類專著的問世等方面。¹²

臺灣對「太平天國」研究，以台灣大學政治系盧瑞鍾《太平天國的神權思想》的博士論文（1984）、政治大學歷史系王超然《天啓與實現：洪秀全的異夢及其太平天國》的碩士論文（1990）、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黃郁修《張笑天《太平天國》小說藝術研究》的碩士論文（2003），開啓了政治、歷史、文學的一些面向。

本人在〈水滸故事傳播中的江湖與江山——以明·陳忱《水滸後傳》的「地景書寫」與「場域效應」爲主的討論〉一文³曾指出：孫中山領導興中會時引天地會在康熙年間之後的這一段歷史，說明民族主義根苗藉民間形式保存的隱曲。在長遠的歷史中，這些遺（殘）民，根據自己的歷史觀與道統理念，重新打造自己的歷史、自己的「江山／江湖」版圖。「演戲」、「不平之心」、「復仇之事」等等儀式化與情節化，成爲傳播一再複製的的變體，而其核心爲民族主義「根苗」，透過播散種子的策略，實由明清之際一直傳演到了清末，「創業」即爲其異質力量之想像核心。這種創業史具有史詩性質的美學特徵，可視爲水滸式的「史詩英雄」後期組曲之主調，是英雄末路的歷史長考，卻使我們無意中

1

² 有關研究可以參考夏春濤：〈二十世紀的太平天國史研究〉，《歷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頁 162-181。

³ 詳參：高桂惠〈水滸故事傳播中的江湖與江山——以明·陳忱《水滸後傳》的「地景書寫」與「場域效應」爲主的討論〉，《東華人文學報》（2007 年，第十期），頁 157-180。

瞥見「建國」的靈光與啓發，透過沒有邊界的想像，或可使歷史生發跨時代的巨響。

因此，本文試圖繼續追問的是：這些藝文想像，是否另有可資比較的文本書寫？不論太平天國做爲「意識形態」的核心所引發的歷史、宗教、政治等研究；不亞於《水滸傳》、《聊齋志異》等小說續衍現象的豐富多元，尤其「太平天國」宗教之特殊性，與西方傳教士之介入，在中國「近／現代化」過程中所呈現的全球性意義，以及民間下層啓蒙，甚至可以說是多層理啓蒙的觀察價值。對民國以來梁啓超和國粹派所關注的「民史運動」，以「民史」代替「君史」的「正史範式」重構的理念，回應到明代《水滸傳》等「民變」、「黨社」之研究角度（吳晗、羅爾綱、張蔭麟），「太平天國」研究在文學方面的不足仍有極大的探討空間，尤其是在通俗文學的發展，以及庶民文學的建構方面。

本文選擇考察《聊齋志異》續衍之下《遯窟謠言》中有關太平天國爲主的相關敘事，乃在於這些敘事具有某種意義的民間意識型態和文人圈的小眾群體之結構對應關係（homologie），透過文學創作以及接受、評論的不斷辯證和擴散視野，期望更貼近文學創作參與「近／現代化」發展過程的歷史剪影。

二、從王韜文言小說的創作歷程談起

王韜（1828- 1897）創作文言小說第一階段是 1880 年以前，他先在中國大陸生活，後遷居香港，斷斷續續地「隨意撰就」第一部文言小說集《遯窟謠言》，又名《遯叟奇談》。初結集于光緒元年（1875），共十二卷，一部分爲少年時所作，另外一部分是 1862 年逃往香港後創作的作品。他在《弢園著述總目》中曾說：「少時即有《雞窗瑣話》一書，聊以遣興。……嗣後，日有所增，成《遯窟謠言》十二卷。」還說：「同治紀元之歲，餘以避兵至粵，寄跡香海……夙寡交遊，閉門日多，風晨雨夕，一編自怡……於是竊效幹寶之搜神，戲學髡蘇之說鬼，燈地更闌，濡毫暝寫，久之遂如束筍。因並篋中所存髫年之作，厘爲十二卷，名曰《遯窟謠言》。」（《自序二》）⁴

王韜早年作小說，主要出於「好奇」、「遣興」，如他所說：「少時即有《雞窗瑣話》一書，聊以遣興」，而遯跡香港後創作小說，卻是爲了遣懷洩憤。他因化名黃畹上書太平軍而受到清廷通緝，初到香港，孤獨寂寞，閉門日多，無以遣懷，因此寫作小說，多孤憤之作，對現實社會有一定程度的譴責。但此時他仍有積極用世之心。他認爲「遯」的意思，不是心存逃世，志在山林，匿跡終身於荒陬窮窟，而遯世實際與用世殊途同歸；寫志怪小說，「亦緣旨寓勸懲，意關風化，以善惡爲褒貶，以貞淫爲黜陟，俾愚頑易於觀感，婦稚得以奮興」，《遯窟謠言》「斯編所寄，亦猶是耳。」（《自序二》）黃懷珍在此書的序言中也寫道：「托于齊諧、虞初者流，寄其慷慨激昂之致」，可見王韜此時對自己的生命仍有相當的熱情。

從 1884 年至 1889 年，王韜在光緒九年（1884）得到總理大臣李鴻章的默許，由香港回到上海定居，這時《申報》館主英國人美查（尊聞閣主人）多次請他賜稿。於是《淞隱漫錄》從 1884 年下半年開始在附屬於《申報》的《點石齋畫報》上陸續刊載，後由點石齋石印局彙集成單行本出版，共十二卷一百一十七篇小說。書出之後，翻版者眾多。有的更名爲《後聊齋志異圖說》（上海鴻文書局），有的

⁴ 本文所引《遯窟謠言》據臺北：廣文書局印行《中國近代小說史料續編》冊 29，1987 年。文中引文後註明頁碼，不另加註。

改名為《繪圖後聊齋志異》（上海積山書局），流傳廣遠。

申報館不僅推動王韜的小說創作，對其興趣還有相當的引導作用。王韜《豔史叢鈔序》云：「邇見海上尊聞閣主人集吳門秦淮畫舫諸錄，付之手民，播於藝苑。」又云：「向聞山陰悟癡生、苕溪修月樓主人、滬城縷馨仙史將撰《春江花月志》，專記歌浦一隅之佳麗，誠海陬之嘉話，盛世之閒情也。」《海陬冶遊餘錄序》云：「曩滬上縷馨仙史有《擬刻春江花月志啓》，原思廣為網羅，以張豔麗。後卒無好事者贊成其事。」可見王韜輯《豔史叢鈔》，以及作《海陬冶遊附錄》、《海陬冶遊餘錄》、《花國劇談》對青樓題材的注意是深受申報館的影響。

我們若從一個文學家的創作個案來重新審視一種題材的發展，或許可以得到不一樣的小說脈絡動向。就「太平天國」這一題材的演述，從藝文創作的角度來看，仍有非常強烈的現實性：有關太平天國的小說創作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應是黃世仲的《洪秀全演義》，作者以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價值觀來反觀比照太平天國革命，有意識以《洪秀全演義》的寫作服務於反清革命的政治目的，因此，小說首先著意突出了洪秀全等太平天國領袖們反清復漢的歷史使命感；此外，黃世仲還有意識地把太平天國政權拉到一個較滿清專制政權更優越，等同於西方的民主政權的位置，顯現其進步的面向，反映了革命派作家強烈的反滿復漢民族情緒。

然而，也有一些維新派（或認同維新）作家的態度，他們承認清廷腐敗，卻主張通過「改良」解決問題，作品多直接或影射抨擊當局的腐敗無能。王韜創作中提及太平天國等有關時事的問題，相對於其他作家的書寫，他的視域是由一個傳統文人逐漸轉型為具有文人／報人等多重文化身份的變化歷程，由於這個動態的變化歷程，使得理解他的每一部創作都具有更多層理的意涵，他「隨意撰就」第一部文言小說集《遯窟謠言》，就是瞭解這個變化歷程的第一步，我們由小說的具體書寫出發，試圖提供理解這一段歷史轉型期中，整體民族在文化政治等面向的調和苦路。

三、《遯窟謠言》中太平天國的災難書寫

傳統小說往往呈現程式化的戰爭場景描寫，或者為求突出個別英雄，將戰役濃縮為敵對陣營雙方勇力型英雄之間你來我往的輪回格鬥；有時是智慧型英雄的謀劃策略與言詞交鋒；另一些小說是庶民對清明政治的冀望的帝王或統帥型的英雄。在王韜《遯窟謠言》中在戰爭逃難的人群，往往失去了對人類本質力量的自我觀照能力，也沒有強而有力的整合力量，戰爭的描寫似回復到更遠古的尚武縱欲的戰爭文化，既缺乏對這場戰難有一個明確的認識，也沒有回應的能力，相對於古典戰爭小說所塑造的「仁政」、「霸政」的兩極範疇，《遯窟謠言》中太平天國並沒有被賦予任何神聖與善意的可能。⁵

王韜小說有許多反映社會時事的作品，《遯窟謠言》就有二十多篇作品反映太平天國起義（詳參附

⁵ 陳穎：〈從中國戰爭小說看中華民族政治倫理觀的演進（上）〉，一文指出中國遠古戰爭神話根基於政治倫理之上，而非如希臘戰爭神話尚武縱欲的表現，史傳文學更進一步明確了戰爭人物的政治道德標準。但它還不是真正意義的戰爭，而儒家哲學理論體系，對中國戰爭小說政治倫理觀的形成更具有重要影響。中國古代戰爭小說反映的戰爭又大致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是封建王朝政權更迭的「興廢爭戰之事」，戰爭發生在不同統治集團之間；二是農民起義戰爭，發生在被壓迫階級與封建壓迫階級之間。《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頁58—66。太平天國長期被理解為農民起義，但是在王韜的筆下，這場戰爭沒有正當性，沒有被置入任何的理想色彩與革命激情。

錄)，如：《傅鸞史》、《範德鄰》、《無頭女鬼》等，在部分表現太平天國題材的作品中，王韜基本持否定態度，將太平軍稱為「賊」、「寇」、「逆」，並責難他們燒殺擄掠、殘害婦女的罪惡行徑。論者認為這是王韜在太平天國失敗之後，向清廷洗刷自己、表明心跡的一種舉動。⁶

如果這種看法屬實，則對戰火洗劫的描述應是最直接的證明，《遯窟讖言》的「災難」書寫大多著墨在逃難的人群與浩劫的畫面。小說中圍繞著許多毫無準備的老百姓一面臨動亂就潰不成軍，在傳聞中竄逃的人們；以及努力抗敵的鄉勇；趁火打劫的土匪；忙著埋藏財物的人們；以及臨難殉死的苦難大眾；來不及竄逃屍解的各種現象。

以小說美學的角度來看，《遯窟讖言》中太平軍通常以背景的姿態作為小說框架，成為小說人物命運的轉捩點。但是我們若仔細審視小說的整體意象，大抵在災難的最後，都有某種程度的圓滿處理。如：《無頭女鬼》（卷7）、《義烈女子》（卷8）都是慘死戰火的無頭女鬼控訴太平軍，後來蒙書生為其安葬；《碧蘅》（卷2）、《女道士》（卷2）在戰爭時受到異人符籙救渡；《相術》（卷11）、《孟禪客》（卷11）在戰火後重新致富。面對太平軍的描繪，王韜《遯窟讖言》鮮少兩軍交鋒的處理，人群大多停留在訊息散播的紛紛揚揚之中，而浩劫過後，不管生存下來，或是死後幽魂，都得到安頓。故事以較多的「遇仙模式」代替傳統的「果報模式」，給予小說人物極大的精神補償。⁷所以在小說中王韜雖然以負面詞彙指稱太平軍，那只能說是一般庶民的直觀感受，應該還無法證明作為表明心跡的有意創作。

學者曾指出清代志怪小說蒲松齡《聊齋誌異》與他的其他作品多帶有鄉土紀實況味，同時具有溫存的認同與苦難的凝視，這與紀昀《閱微草堂筆記》的「鄉戀情結」頗為接近。⁸有關鄉土紀實這一視野的提出，對我們理解明清志怪小說深富啟發性。本人曾討論明清志怪的鄉土風情，與魏晉遠方遐異的蒐錄有所不同，它們由志異性向紀實性傾斜，既帶有一種隨俗心態，又對於此岸世界的恐懼效應、禁忌效應尋求另一些救濟的管道，⁹王韜透過怪異書寫來回應戰爭，應是身世流離感受中的自我定位之折射。

四、以豔為史——在太平軍亂離中淪落風塵的豔姬才媛

如前所言，王韜輯《豔史叢鈔》是受到申報館的影響，但是他長期以來對青樓題材的關注，其實在他許多創作品中佔據重要的位置，是理解當時文化生態不可忽視的要素。《遯窟讖言》描寫才媛豔姬在兵革滿天下之時，遭逢拐賣，淪落風塵，後經救贖的故事，這種以豔為史的災難書寫，在受傷的大

⁶湯克勤：〈論王韜的文言小說創作〉，《蒲松齡研究》（2007年第1期），頁145-157。

⁷劉敬圻認為「遇仙模式」是比「果報模式」多了一份輕鬆，多了一份俗麗，也有更濃重的鎮痛色彩，是一種乘了想像翅膀的媚俗心態之集大成。劉敬圻：〈《聊齋誌異》宗教現象解讀〉，《文學評論》（1997年5期），頁61。

⁸劉敬圻〈《聊齋誌異》宗教現象解讀〉一文指出蒲松齡《聊齋誌異》的宗教現象具有偶像的蕪雜狀態及其文化淵源，由於從眾心理，導致他雖有深具批評鋒芒的困惑型偶像，也富涵其時代、家鄉及父老親朋們的宗教情緒原生態，是一個根深葉茂的鄉土文學家。同上註，頁56-58。而《閱微草堂筆記》乃紀昀在二十多歲離家之後，四十多年未嘗返鄉，在遍嘗人情冷暖，加之對乾隆皇威的畏懼及士大夫的使命感，使其在公領域晦言思鄉，然濃重鄉情，《閱微草堂筆記》在「地域風土」與「家族人事」二方面的高密度書寫，紀昀數百次提及滄州大小地名，對當地篤實學風頗為自豪，對生活週遭小人物的事件描述亦生動入微。至於家族方面，對於妻族、母族的親戚也多有書寫，而對於家風展現以及兒時記憶等等的描寫也都如數家珍，可見少年的家鄉印象對晚年的紀昀而言仍十分珍貴。詳參：劉樹勝：〈論紀昀的鄉戀情結——《閱微草堂筆記》的主體感之一〉，《滄州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卷4期（2004年12月），頁9-15。

⁹詳參：高桂惠〈清代《醉茶志怪》透過驚悚、怪誕、另類閒賞所展演的志怪文化〉，〔韓國〕《中國小說論叢》（2008年9月，第28輯），頁65。

地輾轉流離的受害者群像，是繼《聊齋志異》之後開啓另一種浪漫書寫的形式。

〈碧珊小傳〉寫一位由北平到廣東就任的廉直縣官，遇高州之亂蒙難，遺下十歲女兒碧珊遭到拐賣，在妓院試圖自殺，夢中預知日後得救，還魂後果得救贖。（《遯窟譚言》卷 1，p.3-4）

〈鶯紅〉描寫鶯紅貌美有文才，當太平軍攻陷杭州，她的家人皆遇難身亡，而她則被匪徒擄賣為武人妾。武人正妻善妒，千方百計想要攆走她。後來武人死於戰地，妻子帶著所有的錢財改嫁。此時太平亂前愛慕鶯紅的某公子願意娶她，但她認為自己已是殘花敗柳，辭了這樁婚事，從此長齋誦經繡佛，坐化而逝，年僅十八。（《遯窟譚言》卷 2，p.15-17）

〈綠芸別傳〉綠芸為太史女，習風鑒之術，能預知吉凶。後來父亡，歸柩時被舟人擄賣作妾。買她的蔣翁知道她是宦家女，便認她作義女，和蔣翁女城為閨中密友，二女文名遠播。綠芸為蔣翁娶了妾，果然立得三男。周氏次子夙有才名向綠芸求親，綠芸認為他適合蔣翁女，望能嫁給周氏長子，後來果然姊妹成為妯娌，夫婿皆登進士，太平亂後，綠芸隨夫婿衣錦歸鄉。（《遯窟譚言》卷 11，p.170-172）

〈于素靜〉于素靜逃難時被女僕賣至妓院，因不願見客，被鴇母百般凌虐。後女屈意佯從，於酒席上痛哭吐露身世，引刀欲死。坐中有個姓陸的客人，是于女家的世交，替她打官司緝捕女僕。陸氏本想替她另謀姻緣，但她認為自己已許了人家，不應再嫁。後來陸氏巧遇于女的公公，便讓她嫁給原來許的丈夫。作者讚于女能在亂離中「以堅貞自矢，名節克全」。最後得遇夫家，可見天理報應不爽。（《遯窟譚言》卷 12，p.189-190）

上面這幾個故事裡碰觸到對於那個動盪時代的生存景象與想像，故事裡有最原始的暴力和欲望，也有最高貴的情操和忍耐，但是在故事當中大量呈現的更是描摹人情世態的轉變。像卷一〈碧珊小傳〉碧珊的父親作為一個窮官吏，從「家貧族小」的諸生，連上京應考的旅費都沒有的人，好不容易中榜，分發廣東，最後卻因「孤立寡援，不能安於其任」滯留南方，導致女兒的不幸。

而卷二〈鶯紅〉和碧珊一樣，「自遭亂後，親舊間益不復相聞問」（《遯窟譚言》p.17），這些豔姬才媛大多是在失去家庭的保護之下，於陌生人的對應中「出險入夷，遇難不驚」，並以此來「覘其所守」（《遯窟譚言》p.173）。

〈綠芸別傳〉的綠芸有非常傳統的占卜預言系統作為安身立命的依據，這故事和〈于素靜〉中女主人翁被僕人趁亂所賣，以及機智求救的歷程，使我們看到社會秩序因戰亂而鬆動的危機感，表面上說的雖然是天理報應不爽，以及命定觀，但是人在亂世所遭受的痛苦與絕望才是故事的本質。

五、以義行控訴暴行——遭太平軍擄掠的百姓之「死難」問題

《遯窟譚言》表明心跡最強烈的方式應是「以死明志」，以及以自殺式的殲滅太平軍來面對脅迫。如：

〈傅鸞史〉傅鸞史自小聰慧，太平亂起，被選在偽東王身旁做女簿書，甚得東王寵愛。然她常厲

聲指責偽官不通文書、品格低下，為眾官員忌恨，屢向東王進讒，東王藉細故以監禁她。傅鸞史在病重之際，作書與東王告白願與他下世共結連理的心願。東王得知後不但放了她，在太醫的醫治下，她的病也逐漸痊癒。後來她經神人點醒「孽緣已盡，汝可速去」後便不知所蹤；一說她在金山落髮出家。（《遯窟讖言》卷 1，p.10-12）

〈朱慧仙〉太平亂時，武昌城陷，朱慧仙為太平軍擄至女館，時東王徵貌美識字女子為女簿書，女館百長性和婉，匿而不報慧仙。後來有人密報此事，女百長被處以酷刑，慧仙不得已入東王府，挾毒藥伺機毒殺東王，無奈事敗被殺。時人有詩、文讚其烈舉。（《遯窟讖言》卷 3，p.32-33）

〈趙碧娘〉太平亂時，趙碧娘為賊所擄，以其貌美，被選入繡館。碧娘為賊首繡冠時，以穢布為襯，要賊首倒楣。賊首知曉後，怒而杖責她，並謀將她活活燒死。碧娘轉醒後，自縊而死。作者讚其貞烈，後又記其顯靈平疫、鄉里建廟祭祀之事。（《遯窟讖言》卷 3，p.45）

〈月嬌〉月嬌是金陵名妓，時太平亂起，月嬌來不及逃出來，便令廚娘幫她置備酒餚「死當為醉飽鬼，不願汙賊刃也」。不料此時太平軍破門而入，逼她與之歡好。月嬌婉聲勸酒，趁賊醉時拿刀殺了他們，隨後自縊而亡。後人作有筆記、樂府記錄歌詠此事；逸史氏曰：「月嬌乃一勾欄中妓女耳，猶且不屑與賊

偶，矢志捐生，誓不為賊所汙，何其烈與？吾知世之號為鬚眉男子，有愧於此妓者多矣。至於從容杯酒之間，親決賊首，談笑自如，尤見其難，謂之烈女也，豈過譽哉？」（《遯窟讖言》卷 2，p.23）

〈范德鄰〉范德鄰在太平軍兵臨城下時，仲金資助鄉勇抵禦。當太平軍破城而入，地方官逃出城外，本有一鄉紳管氏極力阻止官員棄成而去，然而地方官的手下用刀背砍他、用鐵椎擊他，一見他不支倒地，便快快逃出城去了，范德鄰的兩個侍兒一個撞柱而死，一個與他飽食對飲毒酒而死。太平軍進到他家時，看到滿桌酒菜，開心得大吃大喝，不慎飲了毒酒，盡數死亡。（《遯窟讖言》卷 6，p.83-83）

太平天國設有女官制度，相關機構叫做「女館」，亦稱「女營」，主要分為兩個系統：一是統領女館的軍中官，二是在天王府、東王府等處供職的朝內官，太平天國廢除宦官制度，一律改用女子執事，所以朝內官人數較多。但是就太平天國整個職官體系而言，有些是恩賞性質的虛銜，女官除負責管理女館、承擔王府雜役，鮮少參與機要和軍國大事。後隨著民女大量逃逸，女館和繡錦衙急遽萎縮。¹⁰王韜《遯窟讖言》這一類的故事非常鮮明的描繪女性在面對女簿書、繡館等官職與手工藝之職能威逼時的對抗，以及面對「性」的暴力脅迫時之慘烈犧牲。而當中「女館百長」站在同情民女的角度，則被處以酷刑，以無辜人民的「義行」強烈的凸顯太平天國的「暴行」。

六、財德的反思——太平軍亂世中道德抉擇與出處境遇的折射

王韜對道德問題的描述其實是多面向的，《遯窟讖言》卷九的〈趙遜之〉中提到：「時江浙為髮逆竄陷，流民男婦逃之漢口者殊多，無所得食，多願自鬻為人妾媵，貧而無妻者，爭往購之。」（《遯窟讖言》卷 9，p.137）而有時就會發生「騙婚」的情況。這故事說的是一位武昌趙遜之，老實忠厚，為

¹⁰ 這方面資料與討論詳參：張德堅《賊情匯纂》卷三，見中國史學會編：《太平天國》第 3 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10。夏春濤：《天國的殞落——太平天國宗教再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 月初版），頁 350-353。

童子師，收入不豐，年過三十尚未娶妻，朋友勸他趁此機會趕請娶妻，沒想到他將女子娶過門，卻是一個老太太李代桃僵。趙氏甘心受騙，將他視作生母奉養，老婦取出一囊珠給他，在典當明珠的路上，趙氏看到有一女子插牌自賣，動了惻隱之心將她買下，帶回去才發現她正是老婦的女兒，一家三口歡喜團圓，衣食無虞。

〈趙遜之〉雖然說的是善有善報的故事，但是這對母女逃難時是被官兵擄賣，圖轉售獲利，這種視老百姓為財物的亂世，要講究節操殊為不易。這個故事的豐富性在於它不是單純的以死明志，或是控訴太平軍，而是針對「官軍」所為，雖然官軍軍法嚴飭，營兵不敢將所掠婦女帶回營中，但還是在街市公開買賣議價，無辜的百姓成為最底層的受害者，僅倚賴買客最後一絲殘存的善念或可免於難，讓道德意識凸顯亂世最深層的悲哀。

《遯窟譚言》除了上一節的亂世忠義的道德問題，王韜畢竟仍對專屬於他那個時代特有的道德困境有一種深度的悲憫，所以他也蒐錄了一些失節的個案，在亂世中作為生命抉擇的另一些選項思考，如：

〈江遠香〉太平之亂時，蕭九及其妻子江遠香雙雙被擄。蕭九在太平軍裡任職；江遠香被賣入倡家，後又被賣作小妾。一日蕭九在某園中聽聞琵琶聲，效似自己妻子所彈，入園一見，果然是自己的妻子，兩人歡喜重逢。妻子勸蕭九離開太平軍，兩人逃至上海。（《遯窟譚言》卷 1，p.13-14）

〈江遠香〉篇後的逸史氏評論道，這夫婦倆一個供職偽軍、一個甘作人妾，皆不可言節言貞，然其情可憫。然而妻子江遠香勸夫脫離太平賊軍，作者對此大表讚揚。逸史氏曰：「蕭生陷身賊中，不即死義，忍垢偷生，轉經數省，其節已無可稱，而其情或猶可諒。其婦始墮平康，矢志不更，無玷堅白；然甘作小星，偕隨赴浙，稱之日貞，則亦未也。惟一見故夫，數語後即勸離賊窟，決計遠引，卒以智脫，誠巾幗中之矯矯者矣。」（《遯窟譚言》卷 1，p.14）

這個故事顯然已開顯出對智巧的讚美，而原諒女主角失節的缺失。

〈劉氏婦〉劉某因嗜賭而家道中落，至清軍營裡從戎，一日為太平軍所擄，生死未卜。因為家窮，他的父母催促媳婦改嫁。十年後，劉某自太平軍處逃出，經商有成，歸鄉本欲與父母妻子團聚，沒想到人事已非。（《遯窟譚言》卷 6，p.87-89）

故事中女主人翁改嫁後面對前夫求見時，心中的念頭是：「再醮之婦，與前夫恩違義絕，何顏相見？」（p.88）充滿自責之情。故事中載錄了夫妻二人的兩封書信，文辭典雅，雖然情感深厚但又無法顧念前情的困難，兩封書信廣為流傳，故事的結尾將輿論與官斷並呈：

或有議婦之忍心者，有憐婦之志者，然以理言之，婦固非矣，而又有辭可辨也。當時死耗已真，家貧難守，其別嫁也，由於翁命。即與後夫相聚，已越十年，一旦相離，心有不忍，亦人之常情也。此等案牘，即經官斷，揆法原情，亦有甚難處者。家庭之事，有非旁觀之所能置喙者，置之不論可也。（《遯窟譚言》卷 6，p.88-89）

王韜在這些分分合合之中去審視貞節情理，反而較前所舉之道德典範更具寫實風格，勾勒亂世中

那不足為外人道的艱難處境，比起前者，這一類的事蹟更證明那個時代生存不易，死亦艱難。

此外，卷一〈奇丐〉的故事也是一個因善行而蒙受恩報的奇情，主人公施沁泉為人豪爽、輕財好客，一日他在風雪中救了個乞丐，見他談吐不凡、有經國志，便待他如上賓。三年後，乞丐投筆從戎，施氏則家道中落，適逢太平亂，他不得已在裡頭做文書小吏。清兵破太平天國，誤當他是賊首，此時一個大清軍官將他救了下來，原來就是他曾救的那個乞丐。軍官贈與他為數可觀的金錢並護送他回鄉，自此施家又恢復了往日榮景。（《遯窟譚言》卷1，p.6-7）

故事重心雖然以施沁泉的角度來命篇叫做「奇丐」，但是施君在兩軍勝負中得免於禍，也隱射出在雙方陣營中一種「非自願」處境的尷尬與危險。在亂世中安身立命的確是一條非常辛苦的路，試想：若無前面對乞丐的善行與因緣，施沁泉必定罹難，這故事的傳奇性，是建立在兩個人物兩次遭逢的榮枯與互助上，而兩軍陣營的勢力消長，恰見證了人情悲憫、英雄相惜高於政治武力。

《遯窟譚言》卷五寫一個有趣的道學先生的故事，主人翁言必程朱，長髯過腰自稱「冉道人」，而人稱「周髯」。太平天國之亂時，賊軍亦感其德而不敢騷亂。太平軍欲強取鄰里寡婦，周髯出面保之，往後鄉里都稱他「周聖人」，備加敬重。後來，周髯與友人買舟回鄉，見友人在艙內與船家女調笑，便將他們趕了出去，睡了一夜，竟稱病不起。原來他與船家女共處一夜，船家女戲將他的鬍子盡數割去。讓周髯斯文掃地。（《遯窟譚言》卷5，p.64-65）

故事大半部描述太平軍與讀書人的互動極力渲染、抗賊、保全嫠婦的風骨，以及為人敬重的事蹟：

嗣有賊至，周讀書自若，賊中有文雅者，詢其讀何書？周曰：「此廉洛關閩之學也。」因為講太極無極之道，陰陽動靜之理，鎔鎔不已，聽者倦而去。鄉中多有被賊焚掠劫殺者。而周獨無恙，人以為此固皆盛德所感，賊亦化之。（《遯窟譚言》卷5，p.64-65）

然而故事末後道學先生失節時，王韜以眾人嘲笑的話作結道：「周髯之髯，生于少年，保于中年，矜于暮年，而贈于蘭年（案：船家女之名），惜哉！」（p.65）這故事一方面指向太平軍與庸眾對假道學的蒙蔽無知，王韜一方面又以遊戲之筆嘲諷道學之裝腔作勢。

此外，讀書人對自己生命出處的徘徊也在亂世中呈現為自我錯亂的狀況，《遯窟譚言》卷九描寫一士人孫藝軒少有文名，卻從人學興訟打官司，後與老師、雇主不歡而散，從此閉門讀書，考取舉人。考取後，又巧取豪奪、魚肉鄉里。太平軍攻陷其鄉，孫某挺身而出為太平軍徵稅，又應太平天國之科舉，高中第一，從此氣燄更勝。一日，孫某突然想到：「我今日萬無生理，持能殺賊而死，則芳名永在。」遂持刃殺賊首，後自刎而死。最堪細味的是故事最後的評價：「孫所為雖反復詭譎，而末後殺賊一著，似猶不失為血性男子也。」（《遯窟譚言》卷9，p.135-136）孫藝軒的「反復詭譎」，就當時的士人處境來說，可能才是最實際的狀況。

除了道學、文士的群像，王韜對想要發災難財的人也有一種調侃的意味，如〈石崇後身〉故事就說一位富翁被相士算出是石崇後身，將在近日得百萬。沒幾天有人告訴他他家旁邊的房子底下埋了何祿搜括來的金銀財寶，富翁用數倍的價錢買下房子，掘地無果。客人又要他買下另一棟房子。富翁前後被騙萬金，發現被騙時，客人早已遠走他方。（《遯窟譚言》卷9，p.139）這種「利令智昏」的毛病，

乃肇因於紅匪渠魁何祿括掠的財物引起世人的盜寶熱，亂世中除了嗜血的本性之外，仍潛藏著人性最頑強的好財好貨的本能。

七、亂世哀音——虛構意識下的幽冥際遇

石昌渝先生曾經從「鬼論」的出現來思索文化意涵，指出：魏晉以前的志怪題材大多是神話、仙話、傳說等等，比較沒有鬼魅的意象，「仙論」起於周，而「鬼論」作為一種理論的成立當在漢末，由仙話到鬼話的發展，顯示魏晉鬼魅意象逐漸形成人格化、人情化以及文學化的傾向，¹¹因此，幽冥世界的種種神秘經驗，逐漸縮合感性與理性的鴻溝。《遯窟譚言》描寫亂世冤魂，多作哀悼知音，偶有作為遇豔的遐思。如：

卷四〈芝仙〉寫一書生寄居荒宅，夜間見一「少年麗人凭闌望月，俯視諸人，嫣然微笑，旋即將頭取下，置於闌角，於袖中出梳櫛，為之整理。項血漂流，密灑如細雨，一沾人身，冷若霜雪，直欲注入肝脾。」（《遯窟譚言》卷4，p.48）

卷四〈賈芸生〉賈芸生納粟做浙省縣尉，然其時浙省陷於太平亂，賈生便投筆從戎。太平亂平後，賈生在一幽靜宅第中住下，有一麗人現身，自言是在太平亂時仰藥自盡的女鬼，自薦枕席。後來賈生要到異地任官，此女才吐實說自己其實是人，家人在亂中身亡，她不願被舅舅賣作人妾逃了出來。之前說自己是鬼實是爲了試探賈生是否真心。賈生讚其貞慧機變。待她爲自己的妻子，女子亦爲他生了個兒子。

卷四〈攝魂〉楊生在松江有座別墅，一天有個陌生人來訪，楊生請他入屋，兩人志趣頗合，相談甚歡。言談間楊生談及有妓瑤娘貌美，陌生客人即畫符召瑤娘魂魄來，陪酒歌曲。陌生客人辭別楊生時，要楊生快快遷家至上海，松江要遭兵難了。沒多久，果然太平亂起，楊生因早早徙家幸免於難。

卷七〈無頭女鬼〉李某爲準備考試暫居江寧某鬧鬼的庭園，夜晚，果有一個無頭、一個青衣女鬼獻身。她們皆因爲太平軍快破城，不願受辱，自刎自縊而亡。二鬼談起太平天國內部首領荒淫、擄掠婦女之事，又言裡頭女子因幫助清軍而爲東王車裂事，此女亦因此義舉死後成了散仙，她們並且說「金陵女館中，前後所死女子，大抵不下數萬人，幸早自裁，不致罹此辱劫，言已又復歎歎。」（《遯窟譚言》卷7，p.110）

本人曾考察《聊齋志異》續衍之作，大抵以鬼神的觀念實指向人類對於死亡的困惑、靈魂的存有、墳墓棺槨的私密空間、陰間陽間的空間重疊及擴散現象、鬼魂體現靈性與俗性融合的特異稟性，凡此，都在一個刻意拉回蒙昧意識的狀態中重新啓動，以取得對存有世界的另一種觀照。中國小說「志怪體」的類型意識正是在蒙昧與啓蒙中往復辯證，對於生存的感知不斷透過異質性的斷裂、切割、衝擊等聚焦，來突顯文化的「他性」經驗。¹²

¹¹ 石先生依據顧炎武《日知錄》把鬼論成立的標誌定在泰山爲陰司之說的出現，與之前神鬼一體的觀念區隔，此時鬼與神明確分離，鬼通通是泰山府君的臣屬，志怪小說題材的演進反映了鬼神思想發展的歷史。參閱石昌渝：〈論魏晉志怪的鬼魅意象〉，《文學遺產》（2003年2月），頁15-24。

¹² 詳參：高桂惠：〈豔與異的續衍辯證：清代文言小說「蒲派」與「紀派」的綺想世界——以《螢窗異草》爲主的討論〉，

《遯窟譚言》開始「竊效干寶之搜神，戲學髯蘇之說鬼」，有意虛構。《點石齋畫報》版面的限制卻使《淞隱漫錄》不得不寫成約一千三百字到一千九百字之間(半頁十六行，行四十字)的傳奇體小說。雖然味閑廬盜版時將其改名為《後聊齋志異圖說初集》，申報館也在廣告中宣稱「與蒲留仙《聊齋志異》後先媲美，可無愧色」，畫報連載《淞隱漫錄》和《淞濱瑣話》時，這種虛構意識越發凸顯。凌碩為認為：《淞隱漫錄自序》花了一半篇幅以西方科學知識證明幽冥之說不可信，而後半篇則自陳仍要求諸幽冥的不得已。中國小說像王韜這樣以科學來證明幽冥內容的不可信的本不多見，因而也鮮少作者有王韜那樣明確而自覺的虛構意識。¹³《遯窟譚言》中透過女鬼的自訴與還魂，這種「避禍」模式，相對於另一種綺豔，同樣也是充滿了頹唐和虛無的虛構意識。

八、餘論：置於「聊齋」仿擬語境下的太平天國

清代言言小說大抵可概括為對《聊齋志異》和《閱微草堂筆記》的繼承和模仿。《聊齋志異》的文體特點正是紀昀所批評的「一書而兼二體」(即筆記體與傳奇體)，《閱微草堂筆記》則力圖堅持單純的筆記體。王韜對二者都有所嘗試，如：《遯窟譚言》接近《聊齋志異》的二體相雜，而其另一作品《甕牖餘談》則是比較單純的筆記體。

王韜早年比較重視小說內容的真實性，雖然小說的真實性自古受人懷疑，但這主要是由於它出於街談巷議，道聽塗說，來源不甚可靠，並非作者有意虛構。這種小說的創作狀態著重在接近「論學」與「清議」的文人圈和社會大眾的傳聞之鍛接處，帶有某種程度的混融與詼諧，就像《聊齋志異》仿擬之作沈起鳳的《諧鐸》一般，小說取名《諧鐸》，「諧」體現諧趣故事及生活片段，「鐸」則是由「諧」引申出來的「教」，有別於「異史氏曰」的史家「斷」筆。¹⁴「鐸」筆與「史」筆一教、一斷的筆法，頗能解釋當時創作的根本命意。王韜著《瀛壖雜誌》即一心要補邑志之缺，《甕牖餘談》也「就耳聞目見，據實而書，無妄語，亦無溢詞」。即使寫《海陬冶遊錄》這樣的「遊戲之作」也具有當時創作文言小說的常態認知。

歐陽健認為清末解鑑的《益智錄》一書中所有的序跋之小說學價值，乃在於為他作序之人多有才學，能夠建立自己的小說史觀。如：黃南賓包容這部小說勸懲不強的博物書寫，視野宏闊；葉圭書稱《益智錄》「無一骯髒語、無一輕薄語、勸善懲惡，一軌於正，大異乎《聊齋》之呵神詈鬼」成為定評；蓋防如指出該書「內寓勸懲外示詭」的創作理念；馬國翰則點出書中「重言多於寓言」，許多奇異之談，其實指涉世間眾人未知的事物，不應只以無稽之談視之，賦有「萬物多奇」的概念。¹⁵《遯窟譚言》其實與上述這種種自我正名的小說觀非常雷同，也是站在「立言」的傳統，以及博物書寫的角度蒐錄題材。

以往學者在理解王韜的太平天國書寫有太多的政治視角，如果就王韜早期作品《遯窟譚言》而言，他從受苦的女性，再一次省視她們身上的特質，透過太平天國所折射出的時代剪影，充滿了一個個等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2008年，第1卷第1期)，頁129-165。

¹³凌碩為：〈申報館與王韜小說之轉變〉，《求是學刊》(2007年1月，第34卷第1期)，頁106-110。

¹⁴歐陽健：〈沈起鳳與《諧鐸》〉，《蒲松齡研究》(2003年第2期)，頁129-145。

¹⁵歐陽健：〈《聊齋志異》仿作《益智錄》的傳播與接受〉，《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8卷第3期)，頁34。

待救贖的走馬燈畫卷。王韜的《遯窟讕言》乃是立足於「豔異」的書寫傳統，以弱抗暴的虛構意識，亂世中道德抉擇與出處境遇的反思，既有「鐸筆」之勸懲，亦具「史筆」之評斷，更饒「戲筆」之諧謔，而其雜化的特性，實與晚清文化政治諸面向快速轉型息息相關。

《遯窟讕言》中太平軍的災難，應是爲了喚起更深層的文化印記，有關這點，我們從小說選擇文言載體，¹⁶而王韜又自稱「聊齋替人」，可以看出他自我脈絡化，並以聊齋等文言小說的文化圈¹⁷來自我定位的寫作意圖。《遯窟讕言》的太平天國的書寫，一方面是符合於那個時代經典確立的獨特邏輯，另一方面期望借傳統文類與語言的文化圈慣性，提供溝通新的文本理解方式，亦即：爲報刊和圖文閱讀形式黏合時事，並在傳統文化土壤創化小說此一文類的新生命。

¹⁶ 「語體差異」這一伏線實際上早已植根在晚清小說界革命的內部，小說界革命最直接的效果是產生了題材決定價值的思考方式，但其暗含的前提仍在於如何影響和塑造新型國民，即梁啟超所說的「熏」「浸」「提」「刺」，其所指稱的小說主要是影響力深遠的小說，而並不在意語體上的差別。這一問題到了魯迅那裡，他的困難在於無法擺脫小說功用的思考，而他對小說功用的思考也傾向於從影響力來判定成敗，不過在對待明清時期的幾部文言小說時，魯迅只能用魏晉志怪和唐人傳奇的傳統來衡量，自然無法給《聊齋志異》一個精準的定位。其思考重心是放在章回小說一邊，故而對明清文言小說的考察只能通過表現形式來衡量。像「用傳奇法，而以志怪」的說法是十分含糊的，只是根據文本得出的一般印象，而《聊齋志異》在流通中產生的種種變化並沒有被揭示。雖然他沒有回避晚清王韜的《後聊齋志異》對《聊齋志異》的繼承，但他卻無法解釋其爲什麼不是「後子不語」。詳參：李彥東：〈論《聊齋志異》的經典形成邏輯〉，《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3月，第21卷第1期），頁80-83。

¹⁷ 詹頌曾指出：乾嘉文言小說作家多有喜人說鬼談異的愛好，本文列舉和邦額《夜譚隨錄·自序》、袁枚《新齊諧·序》、曾衍東《小豆棚·序》、樂鈞在《耳食錄·自序》、《閱微草堂筆記》等文中提及的創作原因爲例，說明此時期文人好奇談異風氣之盛，寫作小說類筆記和小說專集成風，友人之間以此爲尚，互相影響，互相競爭，互相贈閱，形成了一些寫作小圈子。另外有一些人主動將自己的作品寄給作者，欲借名人之作留名或將所寫故事傳之更廣。亦有作者將親友、門生作品采入己作。作家採錄他人作品亦大體出於道德與文章兩種考慮。文人不滿足於僅僅講述奇聞異事，還要借談異特別是談狐鬼故事以諷刺世相、針砭世風、抒發人生感慨乃至表述自己的學術觀點與思想觀點。出於這種動機，他們不止是直述所見所聞或轉述他人見聞之可異可歎者，還有意無意虛構一些故事。詹頌：〈乾嘉文言小說作者的交遊與其小說寫作〉，《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頁92-97。

此外，同上註所引歐陽健在〈《聊齋誌異》仿作《益智錄》的傳播與接受〉一文之說：「《益智錄》成書之前，解鑑即主動將篇章與文人圈的好友分享，成爲茶餘飯後的話題，待成書之後，有多位同鄉文士爲之作序，皆在閱讀之後給予中肯讚賞，非浮泛溢美之辭，更有二任知縣葉圭書購書而讀，在跋中盛讚才華，並且生發未能及時學才之憾。」，《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8卷第3期），頁29-35。可見清代言言小說的創作氣氛之中，多有文人圈共同參與的另一種理趣。

附錄

卷／頁碼	篇名	《遯窟調言》太平天國災難書寫
1-6	奇丐	<u>適髮逆東竄，江浙盡遭兵燹</u> 。生陷於賊中，為其掌偽文案，屢謀逸去。竟不得間。逾年，賊勢窮蹙，諸偽王詣大營獻城投降， <u>官軍入城，下令剃髮</u> 。以生操楚音，而髮又盈尺，疑為賊中渠魁，執之見大帥，已擬駢首矣。
1-10	傅鸞史	無何，洪楊巨逆，已陷九江，順流東下。 <u>金陵素無備，危甚，城中官紳，無策扼禦，倉猝閉關</u> 。賊因是得附城下，晝夜攻城，二月十日竟於水西門 <u>蟻緣發堞</u> ，城遂陷。數日，賊區分城中人， <u>設男女二館</u> ，女館又分前後左右中為五軍。每軍以一至八，又分八軍，軍設女偽軍師一，統女偽百長數十。 <u>諸婦女遭其拘禁，無異處狴狴</u> ；時城中婦女數，約十萬，傅鸞史亦被錮密室中，求出不得。
1-13	江遠香	偶隨忠獻至杭垣時，甫經兵火，頽垣敗礫，觸目荒涼，江間男女殉節死者，尸填衢巷。 逸史氏曰：「 <u>蕭生陷身賊中，不即死義，忍垢偷生，轉經數省，其節已無可稱，而其情或猶可諒</u> 。其婦始墮平康，矢志不更，無玷堅白；然甘作小星，偕隨赴浙，稱之日貞，則亦未也。惟一見故夫， <u>數語後即勸離賊窟</u> ，決計遠引，卒以智脫，誠巾幗中之矯矯者矣。」
2-15	鶯紅	忽寇氛東竄，杭垣遽陷，女全家遇難，惟女獨存，被匪人掠賣為一武人妾。武人由行伍接職總戎，豪鹵不韻，自頂至踵，並無雅骨；而大婦尤奇妒，女雖曲意下之，終不得其歡，感想今昔，淚痕常濕枕函。
2-22	月嬌	明年春間寇事起， <u>秦淮兩岸青樓，大半徒避於利涉橋北</u> 。姬適欲行，而賊已猝至， <u>因閉戶待死</u> ，令廚娘為之治饌具酒，曰：「死當為醉飽鬼，不願汗賊刃也。」須臾賊破門入，婢媳盡逃，靚妝豔服，端從中亭。 <u>賊至逼與歡</u> 。 逸史氏曰：「 <u>月嬌乃一勾欄中妓女耳，猶且不屑與賊偶，矢志捐生，誓不為賊所汗，何其烈與？吾知世之號為鬚眉男子，有愧於此妓者多矣。至於從容杯酒之間，親決賊首，談笑自如，尤見其難，謂之烈女也，豈過譽哉？</u> 」
2-24	碧蘅	無何粵逆順流東下，官民久不見兵革。束手吁嗟，竟無防禦。武昌破，女與生皆陷賊中，擄之至船，下攻金陵亦陷。
2-26	女道士	庚辛之間，江南淪陷，洞庭遘難尤慘，珠簾碧瓦，蕩作飛灰，一片歡場，鞠為茂草。
3-32	朱慧仙	忽聞粵寇之警，時兩楚鼎沸，三湘雲擾，武昌適當其冲，顧守備久虛，訓練無素。兼以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民間皆以為城

		<p>不可保，爭思出避。女舉家倉皇走。徒以城閉不得出。壬子十二月初四日，賊掘地道攻城，城陷，女遂被擄。賊順流捷下，所獲婦女，悉閉置舟中，載之具東。</p> <p>上海毛對山曰：「嗟乎！賊陷十餘省，所擄婦女不下數十萬，如九妹者，能有幾哉？至某女以庇九妹之故，損其軀，則尤士大夫之所難也。」</p> <p>吳詩人貝子木無咎有詩吊之云：「鬚眉幾輩愧青史，匍匐泥中欠一死，雌虹墮地霹靂鳴，乃有湖湘小女子。鳩賊進持酒一觴，憤拼弱質婉清揚，歐刀不惜遭寸磔，肉糜骨粉皆奇香。嗟呼澆溷花，化作碎階玉，荊州曼仙同一哭，澧蘭沅芷賦招魂，合譜神弦薦芳醪。」</p>
3-43	掘藏	<p>當髮匪竄陷，倉皇出避，室中無一物可攜。惟將祖傳古銅鼎彝諸器，瘞於室後菜圃中，賊退歸家，見所居無恙，喜甚。</p>
3-45	趙碧娘	<p>時寇氛已將東竄，蘭陵素無備禦，城中官先期逃去，紳民竭力固守。賊圍攻日益急，城卒陷，女為賊所掠。轉送之金陵賊窟，蓋拔其尤者，以媚酋目也。碧娘由是入女館，錄於偽百長，受約束。</p> <p>逸史氏曰：「碧娘一弱女子耳，然其絕意偷生，蓄志殺賊。貞義激烈，豈出古人下哉？」</p>
4-51	賈芸生	<p>時江浙皆為盜窟，寇氛尚橫，杭桓陷於賊中，久不得復。生因投入大帥幕，司筆札，磨盾賦詩，上馬草檄，頗以為豪。</p>
4-52	諸葛爐	<p>忽傳賊氛東竄，不日將犯境矣，陳率里中無賴數百人，自成一隊，一切槍炮器械悉白置，請於官。願備城守。邑中官，白面書生也，事起倉猝，罔如所措，得陳以為足恃，發帑金以作賞項。諸無賴悉踴躍，賊游騎之至城下者殲之，益以為功。</p>
4-56	攝魂	<p>子宜遠避，即郡城亦非安土，春申浦上，尚可衣栖，急移子家，勿緩。……無何髮逆陷吳門，四出竄擾，松郡各鄉無不慘罹兵燹，惟上海得無恙，客言皆驗，楊生先期徙去，竟免於禍。</p>
5-64	周髯	<p>賊至時，民盡竄逸，而周屹然不動。賊到門，開關，聽其入。既入，延之上座，指室中所有，謂之曰：「貧士元長物。所藏惟有此耳，君等不棄，可盡攜去。」賊相顧而笑，歎曰：「此人亦大好膽量。」竟釋之。嗣有賊至，周讀書自若，賊中有文雅者，詢其讀何書？周曰：「此廉洛關閩之學也。」因為講太極無極之道，陰陽動靜之理，鎔鎔不已，聽者倦而去。鄉中多有被賊焚掠劫殺者。而周獨無恙，人以為此固皆盛德所感，賊亦化之。……</p> <p>是鄉有李姓婦少寡，賊涎其美，欲強娶之，請一無賴子為媒。勢將篡取之去。周聞即往賊處。以大義責之。賊怒。將拔刀相擬，旁有偽鄉官。急止之曰：「不可，此周聖人也。眾心所屬。傷之恐激眾變。」是賊職甚卑，聞是言遂不放肆</p>
5-69	巫氏	<p>顧親迎有日，適遵發匪之亂，縣民結團相抗，村鄉間各出丁壯，人自為守，賊來輒敗，銜之甚。江南之團結鄉民者，力勇勢盛，</p>

		蓋以溧水金壇為最，縣民自以為足恃，可待官軍之援，不意賊眾日益，四圍並進，時率黨環攻者，賊首偽侍王李世賢也。蒲塘烏山正當賊沖，屠戮無算，孔氏子為賊擄之而去，未知存亡。
6-82	范德鄰	不意庚申春間，寇氛大敗張帥之師，潰于金陵城外，張帥殉節丹陽。賊逼城下，範倉卒無所為計，但日持二侍兒而泣曰：「適有不測，當以一死報。」時郡紳萬籌城守事，范以十萬金供軍需，且上書當事，願括資餉士，以共禦此危城，郡紳皆壯之。無何，賊攻城急，守土者皆有去志。何督將乘輿出城，郡士管君敬伯阻立與前，哭而請曰：「大人一行，此城休矣！」何督麾下兵士，便競持刀背，橫斫其首，首破流血被面，然猶攀與不放；旋又有以鐵椎擊之者，管君暈絕踣地，而何督竟出矣。蓋其時外城已陷，官兵散走，賊皆緣牆蟻附而上，民之未盡逃者，皆閉戶待盡。街衢間申馬洶洶，範之僮僕婢媵，悉先期避去。頃之賊入其家，見室中闐無一人，而案上杯盤狼籍，酒盈樽而肉堆碗也。群賊大喜，盡相大爵。
6-87	劉氏婦	時值紅匪倡亂，因投軍營充壯勇。一日在省北隨官軍出城，與紅匪接仗，為匪所擒。匪見劉軀幹雄健，年尚少壯，堪供驅使，因逼協，使從留於賊巢。
7-100	甯蕊香	甯蕊香蘇州皋橋女子，咸豐庚申髮逆之亂，吳門淪陷，父母皆沒於難，從族叔秋坪避兵至滬，時年僅八歲也。
7-110	無頭女鬼	一女已前斂衽曰：「妾金陵富室女子也，髮逆來犯，白刃於此，家人匆促避寇，即葬妾於樓下。」綠衣者亦自述：「我與渠已為中表姊妹行。小字蓮嬌，亦以寇至，縊此樓中，時家人已盡去，賊來後葬妾於梨樹下。」……二女因談賊中情事，謂所攜女子，具擇其尤者，歸東賊偽府。東賊長枕大被，縱欲無度。有湖北珠仙者，國色也，年僅十七，尚未破瓜，東賊嬖之甚，封為偽丞相；女固識字，為之判決文書。一日女探知城外官軍攻賊甚急，而賊將有撲山虎者，驍勇善戰，數窘官軍。女假東賊檄文，調之至閑曠處，於是賊之要隘數處，盡為官軍所奪，幾薄城下。東賊知女所為，車裂以殉。幽冥主者，憐女之死，申文上霄，遂命作散仙，遊行自在。……金陵女館中，前後所死女子，大抵不下數萬人，幸早自裁，不至羅此辱劫。
8-111	尸解	楚中大帥聞吳名，招致幕下，令在行伍立功。每殺賊，吳必以身先，百步外取賊目首級，百無一失，賊中稱之為飛劍將軍。
8-115	葉芸士	忽遭赭寇之變，城陷家破，生父母皆歿于難，惟生子然逸出，所蓄一空，流離失所，幾難存活。迨克復之後，所居屋宇，具付一炬。
8-116	義烈女子	杭垣湧金門外，以西湖為名勝所，自經髮逆之亂，所有湖濱別墅，盡遭兵燹，破瓦頽垣，爭生蔓草，長廊小樹，半付劫灰。妾因郎君體羸弱多病，遂賃此莊，以為養痾計。不料寇氛倏至，

		郎君聞警病劇，不能即徒；妾義不獨去，遂及於難。
8-120	貞烈女	時賊竄杭垣，勢披猖甚，郡中烽隧迭警，人皆惴惴，慮朝夕不相保，多有徒居以避其鋒者。馮君為眾紳公舉主守城事，義不得他往。……賊中凡擄婦女，先設立女館，俟城中搜刮既盡，然後遣配賊黨。
9-135	孫藝軒	群薦孫於官，以為可當是任，實欲借此以害之也。孫匿跡不出，未幾城陷，至冬賊欲取民間漕米，以充盜糧，而苦無魚鱗冊籍可稽，賊目乃遍征昔時紳董。孫昂然出應，為賊主徵收之役，鄉民益為側目，然無如何也。賊開偽科，孫復往應試，巍然居第一，為偽博士。自此益無忌憚。凡賊館之事，無不預聞，作事頗刻酷，民間有孫老虎之目。 孫所為雖反復詭譎，而末後殺賊一著，似猶不失為血性男子也。
9-137	趙遜之	時江浙為髮逆竄陷，流民男婦逃之漢口者殊多，無所得食，多願自鬻為人妾媵；貧而無妻者爭往購之。
9-139	石崇後身	何祿者，紅匪渠魁也，咸豐四年，佔據佛鎮，舉旗首事，所括掠資財，多不能攜。皆掘地埋貯，是事人多知者，而莫悉其處。
10-153	妙塵	庚申春間，髮逆下竄，山左右居民，逃匿一空，生獨留不去。一賊入其室，向生索錢物，生指其首示之。賊怒揮刀斫之，頭落身僕而無點血，賊驚而走；後親友收其骸葬之，人以為屍解云。
11-165	孟禪客	庚申春間，大帥師潰於金陵，赭寇南下，自丹陽以上，悉陷於賊，常郡危在且夕。生乃盡室以行，旋為鄉人所劫，無一物存。
11-170	綠芸別傳	髮逆下竄，蘇台既陷，鹿邑亦墟，時遷徙死亡者無算。甲子春間，官軍克復省垣，居民始得歸田里。
11-175	瓊仙	粵斐下竄，父母遷避鄉間，路遇土匪行劫，遂與相失。時姬止十二齡，為人掠賣至平康，輾轉至蜀，幸鴛母性和，悉隨其意，不至沉淪苦海耳。
12-179	柔珠	（金姬）江浙之亂，為鐘表戚攜之至澳門。無何，其人死，旅食維艱，貧無所歸，不得以遂向勾欄中覓生活，然不肯輕見人也。
12-189	于素靜	庚申之亂，觀察已先沒，赭寇倉猝薄城，大肆淫掠，眷屬以不及走避，多及於難，惟一子得抱孫逸出。女時年僅十齡許，張姓女僕攜之出走，輾轉至上海，女僕固與滬北勾欄相識，互與往來。一日鴛母見女詫曰：「此玉天仙離碧霄也，近來滬上殊無此人物，再待二三年，何憂不值千金？」女僕聞言心動，後卒以五百金署券賣之章台。

徵引書目

中國史學會主編：《太平天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三冊，張德堅：《賊情匯纂》），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0年。

王韜：《遯窟讕言》，《中國近代小說史料續編》冊29，臺北：廣文書局印行，1987年。

石昌渝：〈論魏晉志怪的鬼魅意象〉，《文學遺產》（2003年第2期），頁15-24。

李彥東：〈論《聊齋志異》的經典形成邏輯〉，《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3月，第21卷第1期），頁80-83。

夏春濤：《天國的殞落——太平天國宗教再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6年。

夏春濤：〈二十世紀的太平天國史研究〉，《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頁162-181。

高桂惠：〈水滸故事傳播中的江湖與江山——以明·陳忱《水滸後傳》的「地景書寫」與「場域效應」為主的討論〉，《東華人文學報》（2007年，第十期），頁157-180。

高桂惠：〈豔與異的續衍辯證：清代言言小說「蒲派」與「紀派」的綺想世界——以《螢窗異草》為主的討論〉，《長庚人文社會學報》（2008年，第1卷第1期），頁129-165。

凌碩為：〈申報館與王韜小說之轉變〉，《求是學刊》（2007年1月，第34卷第1期），頁106-110。

陳穎：〈從中國戰爭小說看中華民族政治倫理觀的演進（上）〉，《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頁58—66。

湯克勤：〈論王韜的文言小說創作〉，《蒲松齡研究》2007年第1期，頁145-157。

詹頌：〈乾嘉文言小說作者的交遊與其小說寫作〉，《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頁92-97。

劉敬圻：〈《聊齋誌異》宗教現象解讀〉，《文學評論》（1997年5期），頁54-65。

劉樹勝：〈論紀昀的鄉戀情結——《閱微草堂筆記》的主體感之一〉，《滄州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4年12月，20卷4期），頁9-15。

歐陽健：〈沈起鳳與《諧鐸》〉，《蒲松齡研究》（2003年第2期），頁129-145。

歐陽健：〈《聊齋誌異》仿作《益智錄》的傳播與接受〉，《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8卷第3期），頁29-35。

清代筆記中的軍人書寫與太平軍形象之勾勒*

高桂惠* 郭書瑄**

論文提要

本文從兩大面向來考察清代筆記小說中的軍人書寫。首先，以清代筆記小說中的軍人書寫作一整體的考察，指出清代筆記中富含類型意識的軍人形象書寫，既有正面價值的軍人形象，也有漁色、術士化等異質性存在。其次，則以寫太平天國亂事的筆記為主，探討王韜《甕牖餘談》對太平天國之亂的描寫。蒲松齡以憤書為軍人形象書寫基調，不免其幽微感慨的特質；紀昀對軍人這一群體透過類型意識的內化，以及其後之續衍筆記小說家的集體勾勒軍人形象，是對傳統精神價值譜系的回望靈光。王韜書寫軍人形象的不容易歸位，也不容易定調，正是由於當時軍隊組織的凝聚力鬆散和缺乏共同的政治傾向所致，地方士紳集團建構的軍事組織概念與正規的清軍組織有著明顯差異，相對於清代筆記小說的書寫，王韜《甕牖餘談》中面對無論是清軍還是太平軍方，雖然放在傳記或對政治的批判語境中進行，他仍不分陣營的展演出「軍人」以潑灑熱血、燃盡生命而成就的悲壯美。這是不同於蒲松齡、紀昀對軍人的理想角色期待，王韜屏除了敵我之分，對軍人的驍勇氣慨投以審美眼光，並關注不同軍人個體之獨特性，一方面正映現了傳統文人經由士紳階層的轉化，到了晚清洋場才子的個人印記，以及那價值轉型中的難言處境。

關鍵詞：太平軍 軍人書寫 清代筆記小說 王韜 《甕牖餘談》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 97-2410-H-004-139-MY2 的部分成果，於嘉義大學舉辦之「第四屆中國小說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2009年10月30、31日）後修訂，感謝與會先進賜與寶貴意見。

*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畢業，國科會專任助理。

一、前言

本文以清代筆記小說中的「軍人」書寫為觀察主軸，試圖探究承載了文人意識的筆記小說，如何書寫軍人群體。而起於道光末，喧騰整個咸豐年間，至同治初年方遭平定的太平天國，倚靠其悍勇軍隊橫掃江南眾省，太平天國的軍人在清人筆記中往往被視為寇賊，但其身份亦是隸屬太平天國軍制中的軍人，其特殊性值得關注。本文所言之「軍人」，是指任軍職、武職者，執行軍事任務，參與征戰，地方性的團練屬之，包括清代後期太平天國起義之太平軍。

在中國文言小說中，「軍人」之書寫所受到的重視，可謂大不如白話小說。在白話小說部份，經典《三國志通俗演義》以漢末至晉動盪的歷史為主要舞台，搬演一幕幕沙場征戰戲碼，小說中的諸多人物皆屬軍人，其他的歷史演義與家將小說，莫不以軍人為重要人物，歌頌其勇猛善戰、盡忠報國。白話小說興盛始於宋元，源自活躍於城市中勾欄瓦舍的下層文人之表演底本，浸染了市井之通俗品格，頗能切合聽眾讀者的閱讀趣味。而筆記小說是由文人創作的案頭文學，反映了文人的意識與生活，與軍人之征戰沙場似屬全然不同的場域。

實際上，文人與軍人在所受的教育技能、從事的職業等方面有很大不同。從考試制度層面來看，清代武舉分作武童試、武鄉試、武會試和武殿試四級，考試內容包括馬射、步射、硬弓、舞刀、掇石等外場考試，以及考策論、默寫武經之內場考試。¹⁸外場與內場考試內容有所因革，內場考試方面，於順治年間以策論為主，題目出自兵書與四書；康熙年間縮小考試範圍，策題出自《孫子》、《吳子》、《司馬法》三部兵書，論題出自《論語》、《孟子》；乾隆年間則策論皆出於《武經七書》，嘉慶以後則因武人多不能文，往往敗於內場，而廢除策論，僅要求默寫《武經七書》之一段，¹⁹武人之少通文墨，可見一斑。此外，康熙時曾施行文武生員舉人交叉考試之辦法，以利文武人才之互通，然而參與者寥寥無幾，²⁰文武人才之壁壘分明，誠為普遍現象。因此，文人如何在屬於雅文學的筆記小說中書寫軍人，便顯得饒堪細味。

本文從兩大面向來考察清代筆記小說中的軍人書寫。首先，以清代筆記小說中的軍人書寫作一整體的考察，並再細分為四部份討論；其次，則以寫太平天國亂事的筆記為主，探討太平天國軍人的特殊形象。清代的筆記小說可謂是中國文言小說發展歷程中，繼魏晉筆記小說、唐代傳奇之後的另一高峰，依其內容可略分為《聊齋志異》為代表的志怪派以及《閱微草堂筆記》為代表的雜俎派筆記小說兩大流派²¹，成果豐碩。本文擬以《聊齋志異》與《閱微草堂筆記》及其仿擬作品為主要研究對象，就

¹⁸ 戴偉謙：《中國武舉與武術之探微》（台北：師大書苑，2006），頁 51。

¹⁹ 詳參馬明達：〈清代的武舉制度〉，《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1999 年第 4 期，頁 58。《武經七書》，即《孫子》、《吳子》、《司馬法》、《尉繚子》、《李靖問對》、《黃石公三略》及《姜太公六韜》，參見戴偉謙：《中國武舉與武術之探微》（台北：師大書苑，2006），頁 51。

²⁰ 同前註，頁 58。

²¹ 有關於文言小說、筆記小說、傳奇小說等名詞的界定，歷來學者討論極多，由於本文的討論重心不在文體之辨明，對於《聊齋志異》及其仿擬作品，皆不再進一步作筆記體或傳奇體之細緻區分（如陳文新《中國筆記小說史》，《聊齋志異》便不在筆記小說之範圍內，詳參氏著：《中國筆記小說史》，台北縣：志一出版社，1995）。本文擷選的筆記小說以志怪小說為主，亦旁及軼事（志人）、國史（寫一代軼事，志在補史）、事類（專計某一類軼事）、雜俎（雜記志怪、軼事、考辨等多種內容）等類別的筆記小說作品。有關筆記小說內容分類引自吳禮權：《中國筆記小說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清代前期的筆記小說作品中以《聊齋志異》爲主；清中葉之小說則以《閱微草堂筆記》、長白浩歌子《螢窗異草》、閒齋氏《夜譚隨錄》爲主，清代後期包括了許奉恩《里乘》、宣鼎《夜雨秋燈錄》、俞樾《右台仙館筆記》、王韜《淞隱漫錄》、《甕牖餘談》等書，擷取其相關篇章，進行析論。²²

二、清代筆記小說中富含類型意識的軍人形象書寫

在清代的筆記小說中的軍人書寫，大多夾雜著傳統類型意識表現其特質，並呈現形象特質下的期望轉化：

(一) 驍勇特質下的才德期待

敘寫軍人的驍勇氣魄，是清代筆記小說中軍人書寫的一大主題。屬清代前期的《聊齋志異》中，此類主題多篇幅較短，寫軍人與常人殊異的剛猛氣性，軍人以此特質征戰得勝、助人，多屬正面的形象描寫。卷五〈陽武侯〉²³匯集陽武侯薛祿之四件異事而成篇，帶有命定之發跡變泰特質，而陽武侯薛祿與妻子赴戍所途中雙雙被兩虎精魂加身，從此「勇健非常，丰采頓異」，終以軍功封陽武侯，其妻則在陽武侯死後，懷胎十五年，方產下繼承爵位的男嬰，亦呈現出相當之「異」。卷六〈大力將軍〉寫查伊璜偶然見一乞兒食量、力量驚人，鼓勵乞兒投入行伍，並贈金助之，多年後乞兒已成將軍，堅將其家產、姬妾等所得與查伊璜一半，後查並賴之得於文字獄中身免。卷八〈黃將軍〉手無寸鐵而逼退響馬，受同行之孝廉鼓勵從軍，遂腰蟒玉。卷十〈布商〉中防海將軍警覺果斷，救了險遭妖僧逼迫自縊的布商。卷九〈王司馬〉則寫王司馬以智巧，令北兵懾服。

和邦額所撰《夜譚隨錄》中，卷三〈三官保〉²⁴寫好勇逞力之少年「三官保」極爲傳奇性的人生與際遇。三官保爲旗人，「皓齒明眸，雪膚華髮，言笑嫵媚」，容顏甚美，但卻「負氣凌人，好勇逞力，往往於喧衢鬧市間，與人一言抵牾，或因睚眦小怨，必至狠鬥兇毆，雖破腦裂膚，終不出一款軟語」，因其貌美而暴戾，故有「花豹子」之號。面貌極美卻又性烈如火，三官保帶有衝突性的審美形象躍然紙上。該篇的前三分之二篇幅，寫三官保以其殊於常人的耐痛力令聞其盛名而前來找碴的佟某、張某懾服，甘爲其跟班之經過。三官保遭佟某所辱，木棒鐵尺打至體無完膚無法動彈，仍嬉笑怒罵，面不改色，佟某益怒，「取棘針一掬，刺入保兩足指甲縫中；又用豬鬃，探其尿管，深入二吋許，仍罵不絕口」，佟某遂尊三官保爲「神人」，願爲其鷹犬。三官保懾服張某之經過則更加血腥駭人：「乃於股上刻

頁 9-10。本文所謂的清代筆記小說，以《聊齋志異》與《閱微草堂筆記》及其仿擬作品爲主，將清代筆記小說分爲「聊齋」、「閱微」兩大派別的研究頗爲普遍，詳參吳禮權《中國筆記小說史》；苗壯《筆記小說史》（杭州：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頁 348-350；黃子婷《〈聊齋志異〉與《閱微草堂筆記》之仿擬作品研究》（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²² 依據《清代小說簡史》，清代小說可分爲初期、中葉與清末三期，清代初期，包括順治、康熙、雍正三朝，是清亡國逐步建立和鞏固的時期；清代中葉，從所謂「乾嘉盛世」延續至道光前期，是清王朝盛極而衰的時期；清代末年，從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戊戌政變，是清王朝的衰亡時期。參閱張俊、沈怡鈞：《清代小說簡史》（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頁 4-5。

²³（清）蒲松齡：《聊齋志異》，收於史仲文主編，顏品忠、顏吾芑等點注：《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頁 9184-9185。此套書所收錄之《聊齋志異》以《鑄雪齋抄本聊齋志異》爲主進行點注，並參考《聊齋志異圖詠》十六卷本與《聊齋志異》手稿本。

²⁴（清）閒齋氏：《夜譚隨錄》，收於史仲文主編，于淑娥點注：《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頁 13372-13377。

劃至骨，吱吱有聲，剗成『天下太平』四字，皮翻肉突，血流被踵，肌膚白嫩映面，色如胭脂染血。旁觀者無不蹙眉嚙齒，代為不耐，而保談笑自若，似毫不痛楚者。」後三官保與佟某、張某路過回族勇士余班龍墓，佟大讚其勇猛，保艷然不悅，遂出輕蔑之言。夜間余班龍之魂魄來會，以其絕藝服之，三官保自從被余班龍魂魄挫折了戾氣，就性情大變，成爲一循規蹈矩之士，「幡然而悔，遂折節讀書，不復語力」，昔日黨羽「勸其振作，但含笑不語，佯以怒激之，唯敬謝而已」，後入羽林軍，征緬甸時戰死，死時年方二十。就全篇布局而言，作者寫三官保逞兇鬥狠之年少經歷處，人物動作、話語無不悉心描繪，活靈活現而使觀者怵目，可謂塑造了一個以絕頂毅力耐力揮灑自我剛勇特質的傳奇人物，就如研究者所論，〈三官保〉爲《夜譚隨錄》之名篇，生動地刻劃了旗人少年粗獷剛勇的性格特徵，而展現出充溢著京旗特質的俠義精神²⁵。此篇末之評點文字有「恩茂先曰」與「蘭岩曰」二則，皆讚其知改過爲勇，而對其「剛勇自恃」投以譴責眼光。據此而論，作者和邦額身爲旗人，亦是一個浸染了儒家思想意識的文人，雖然他對其勇猛特質不無讚賞之意，卻以一猛士之魂挫折之，使其明瞭人外有人，負氣逞力之不可爲，終究使之回到倫理綱常之正軌，爲國捐軀以成就其身爲軍人之最高價值。

《夜雨秋燈錄》之〈父子神槍〉寫戈氏父子善用火槍，因路見不平而與營卒衝突且擊斃之，遂犯下死罪，後減罪判充軍雲南，甚得邊將信任，以其善用火器之故，入雲南深山中，捕獲種種珍禽異獸，邊將讚之「真神勇也」²⁶，以此進貢遂得天子特赦而返，子得參將之職，升六合鎮軍。此則之中，父子憑藉著善用火器的絕技、正義感與遇異獸而無懼色的氣概，屢屢轉危爲安。據于師號之研究，宣鼎（1832-1880）出生於書香世家，是諸生卻於科舉之途無所表現，家道中落後，曾有一段形同乞丐的落魄生活，後曾從軍，中晚年以任幕僚與販書賣畫維生。²⁷宣鼎生活於道光至光緒年間，寫作年代已屬晚清，故事中的父子以其出神入化的槍法，得以化險爲夷、發跡變泰，此情節安排具有一定程度的時代意義：除了義與勇，對於軍人之角色期待已然擴展至器械的使用能力。

（二）精氣爲神之極致化價值

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昀紀錄了一種以「精氣」爲別的軍人獨特價值：卷十〈烏魯木齊提督巴公彥弼〉一則，記巴公夢遇已故護軍統領某，任冥官而隨軍籍記載歿者，統領某詳細說明了戰死士兵登記之分類標準與辨別方法：

問：「次第安在？」曰：「赤心爲國，奮不顧身者，登黃冊；恪遵軍令，寧死不撓者，登紅冊；隨眾驅馳，轉輾而殞者，登紫冊；倉皇奔潰，無路求生，蹂踐裂屍，追殲斷脰者，登黑冊。」
問：「同時受命，血濺屍橫，豈能一一區分，毫無舛誤？」曰：「此惟冥官能辨矣。大抵人亡魂在，精氣如生。應登黃冊者，其精氣如烈火熾騰，蓬蓬勃勃；應登紅冊者，其精氣如烽煙直上，風不能搖；應登紫冊者，其精氣如雲漏電光，往來閃爍。此三等中，最上者為神明，最下者亦歸善道。至應登黑冊者，其精氣瑟縮摧頹，如死灰無燄，在朝廷褒崇忠義，自一例哀榮，陰曹

²⁵ 管謹嚴：〈《夜譚隨錄》對清中期京旗生活的描畫〉，《民族文學研究》2008年第三期，頁134。

²⁶ 詳參石正人選編：《聊齋誌異續編》（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6），頁81。

²⁷ 于師號：《宣鼎與《夜雨秋燈錄》研究》，南京師範大學2005年碩士學位論文，頁9-14。

則以常鬼視之，不復齒數矣。」巴公側耳敬聽，悚然心折，方欲自問將來，忽炮聲驚覺。後常以告麾下，曰：「吾臨陣每憶斯語，便覺捐身鋒鏑，輕若鴻毛。」²⁸

此則記述了巴公之夢，道出陰間軍籍登錄之一套特殊標準，不以戰功論，而以盡忠為國而不懼死的「精氣」之別為戰死之兵將分等。在此評量標準之中，軍人以捨身之氣魄成就其存在價值，不似文人以著述立言，亦不以立功之實際征戰貢獻論之，而是一種剛猛的，「烈火熾騰，蓬蓬勃勃」的生命能量來衡量。

這段敘述，將軍人超脫乎好色、愚昧等刻板印象之外，亡命捨身不是匹夫之勇，而是展現出一種以忠義之心為根柢的生命力道，達其極致者甚至可以「神明」稱之。一般軍民之普遍想望應在於戰功彪炳、立業揚名，而這套標準以慷慨捐軀、亡身報國成就生命之崇高，將軍人能達到的精神層次提昇至一種超凡境界。生命之燦然終結往往成就了軍人存在價值的極致，唯有身殞，方能體現其悲壯的美感。然而不能不注意的，此段話由巴公所述、紀昀所錄，可能已經過紀昀之潤飾，因而此「精氣」之說，亦可能內化了青英文人對軍人之理想化的角色期待。

(三) 對漁色之心的譏評與平衡

對軍人帶有貶意的描寫，在清代筆記小說軍人書寫中為數不少，多集中在敘寫軍人好色、不通文墨、缺乏智識以致受騙等類型題材。《聊齋志異》卷五〈武孝廉〉中，狐妻對武孝廉石某有救命之恩，並資助其夤緣得司閩職，石某卻他娶，並在得知其為狐後欲殺之而後快，忘恩負義的下場是不得善終；卷六〈庫將軍〉負義背叛上司，夢冥王以油澆其足，醒而遂死；卷八〈局詐〉中之副將軍與卷十一〈王者〉中的湖南巡撫，皆因貪利受賄而遭懲罰。《閱微草堂筆記》譏嘲軍人之性好漁色，則頗為直露：卷七〈裘文達公言〉寫一護軍為道旁一屋宇窗內之少婦所誘，入窗頸項即被掛起，原來是遇到縊鬼現美婦形誘求替死者，幸為裘文達所救起。該篇中另有一人因口渴而被溺死鬼所誘，相較之下，護軍被色誘而遇險，其色心被突出。而卷九〈同年蔣心餘〉一則更具代表性：

同年蔣心餘編修言：「其鄉有故家廢宅，往往見豔女靚妝，登牆外視。武生王某，粗豪有膽，竟攜被獨宿其中，冀有所遇。至夜半寂然，乃拊枕自語曰：『人言此宅有狐女，今何往耶？』窗外小聲應曰：『六娘子知君今日來，避往溪頭看月矣。』問：『汝為誰？』曰：『六娘子之婢。』又問：『何故獨避我？』曰：『不知何故，但云畏見此腹負將軍，亦不解為何語也。』王後每舉以問人曰：『腹負將軍是武職幾品？』莫不粲然。」後問其鄉人，曰：「實有其人，亦實有其事，然旁皇竟夜，一無所見耳。其語，則心餘所點綴也。」心餘好談諧，理或然歟？²⁹

此則以戲謔之筆諷刺武人之好色與缺乏學識，寫武生王某期待與美麗女鬼發生艷事，卻遭女鬼譏笑其

²⁸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收於史仲文主編，朱彤芳點注：《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10287-10288。

²⁹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收於史仲文主編，朱彤芳點注：《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頁 10267。

胸無點墨，避不見面。經紀昀求證後，證實武生與女鬼婢女之對話為虛構，但此則多少反映了紀昀之同年友人所代表的文人群體，對從事武職者普遍的輕蔑譏嘲之見。《閱微草堂筆記》有二則亦寫武人好女色、乏識見之缺失，如卷七〈甲與乙相善〉之撫軍輕信友人而致家財被侵吞；卷十〈昌吉平定後〉寫烏魯木齊參將某平定昌吉後，擇逆黨之女最麗者教以歌舞，後不得善終。

《夜雨秋燈錄續錄》之〈石翹翹〉³⁰一篇，亦為一辛辣含諷之作。武弟子員甘生，一日宴罷返鄉途中遇一麗人，自稱石翹翹，請甘生相助渡河，後主動邀其至家中少憩，女為之吟詩、唱曲，遂相與雲雨。事後請甘生續韻，生搖頭不肯，興致又來，以陽具示之：「此物又翹翹如石矣」，麗人遂大怒推之下床，甘生遂昏厥，後於一古碑邊醒轉，回家後口吐綠水，大病一場方癒。作者宣鼎於其篇末評論中說：

懊儂氏曰：昏夜留賓，玉肌薦寢，魅亦有情甚矣。□袂高歌，擁衾聯句，魅又風雅甚矣。殆至勘破情人一丁不識，那得不反目麾去。噫！武夫操雅，其取厭討憎，有勝於甘生萬萬者，魅遇之，又當如何哉？總之肆惡淫兇，且為頑蠢不靈之石所擯逐，彼翩翩雛伎，楚楚佳人見狂且而避如鬼物者，可以恕矣。³¹

宣鼎曾從軍以及身處戎幕，當閱軍人無數，而其年少時優渥的生活與其文人背景，應使其對文人、軍人之別有較為切身的感受。小說中的甘生因一表人才而吸引女鬼，女鬼滿懷著與他吟詩作對的綺麗憧憬，甘生絲毫不能應對，竟以佳人芳名戲稱其雄性器官，好色且粗鄙不文，諷刺訕笑意味極其濃厚。宣鼎於篇末評論武夫「其取厭討憎，有勝於甘生萬萬者」，且「肆惡淫兇」、「頑蠢不靈」，其厭棄武人之輩至此，《夜雨秋燈錄》中雖亦收錄了讚揚武人之篇章如〈父子神槍〉，然由〈石翹翹〉篇末評語之強烈措辭，仍可見文人對武人某種程度的成見與鄙夷。

《螢窗異草》中所收錄的〈姜千里〉³²與〈卜大功〉³³二篇，則以軍人的落難為主幹，寫軍人受女性異類（熊精之女、女鬼）援助而得以化險為夷之傳奇經歷。姜千里為「閩之武孝廉」，以其「輕財任俠」而「取重鄉邦」，卻因此得罪許多無賴而銜恨欲報，某劇盜夫婦遂與無賴勾結，入其家為奴僕。姜千里甚倚重之，絲毫不察，一再為劇盜夫婦所害，不僅財用被竊且身受重創幾死，偶遇母熊精與人類生下之女阿惜，娶其為妾得復仇。阿惜見姜千里落難，曾與奚落：

女復詰孝廉何如人，答曰：「武舉人。」女大笑曰：「以武科而不能弭盜，其如搦管者何？」孝廉大慚。

阿惜此語奚落姜千里以武科出身，卻為盜所擺佈，於智識與體能皆不如人，詞鋒更掃及文人，諷其文

³⁰ 石正人選編：《聊齋誌異續編》（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6），頁 590-592。

³¹ 引自宣鼎：《夜雨秋燈錄續錄》（合肥：黃山書社，2008），卷一，清光緒鉛印報館叢書本，頁 276。

³² （清）長白浩歌子：《螢窗異草》，收於史仲文主編，馬子富點注：《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頁 13809-13816。

³³ 同前註，頁 13493-13497。

弱，彰顯其颯爽的俠女風範。〈卜大功〉中，卜大功為明清之際投筆從戎、應募而征的俠士，落入張獻忠之囚，遂為女鬼救出。該女鬼為武科世家之後，因不願辱於賊自盡而亡，得煉形之術而成為鬼仙，故能為卜大功之妻。卜聽信鬼妻之言沉潛以待，改朝換代後方出而位至總鎮，女鬼卒受封誥。此二則筆記小說中，軍人之身份僅為身份，而無可展現勇武之處，作者以軍人之落難寫異類女性之才，軍人於此二篇之中，形同異類女性藉以實現自我的載體，在展現異類女性智巧穎慧的同時，亦透露對武人之暗諷。

(四) 術士化的軍人形象

異於一般武勇形象之軍人，有些作品聚焦於描寫其身懷特殊技能。如：《聊齋志異》卷八〈采薇翁〉³⁴之肥男子采薇翁身負異能，自薦入劉芝生營中，因其臍大可容雞子，肚中藏有諸般兵器，劉甚禮敬之，後卻因為建議劉嚴以律下，引發譖言，劉從下屬之言欲誅之，方斷其頭即自動接合，斬其腹則無血，且見眾兵器聳聚，眾均駭異，劉知之後欲挽回，采薇翁已杳無蹤跡。本篇中的軍隊為劉芝生於明清鼎革之際「聚眾而成」，成份複雜，「烏合之群，時出剽掠」，其劫掠行為與盜寇無異，在某種情況之下，軍人保國衛民的保護者角色轉而為擾民的侵略者，呈顯出軍人的某種盜賊屬性。是故采薇翁勸之：「兵貴紀律。今統數萬之眾，而不能鎮懾人心，此敗亡之道」，劉芝生深敬其言，嚴加懲治違紀者，然而對采薇翁的異能既佩且懼，終被讒言影響決意誅除之，反映懷異能之士不免遭忌之憾，與蒲松齡仕途屢屢受挫之人生慨嘆有所暗合。

《聊齋志異》卷八〈崔猛〉³⁵寫一血性男兒崔猛，遇不平之事往往折人手足、取人性命，聞鄰婦惡毒，虐姑罵夫，竟「鼻耳脣舌盡割之」，悍婦立斃。後經道人指點得遇貴人，才免去因負氣仗義而致償命之禍，於明清鼎革之際，組成三百餘人之土團，使一方賴以安定。蒲松齡慣於文末以「異史氏曰」開啓評論，於〈崔猛〉一則中，對受崔猛之恩而湧泉以報，助之成立土團的李申大表讚揚：

異史氏曰：「快牛必能破車，崔之謂哉！志意慷慨，蓋鮮儷矣。然欲天下無不平之事，寧非意過其通者與？李申，一介細民，遂能濟美。緣撞飛入，剪禽獸于深閨；斷路夾攻，蕩妖魔于隘谷。使得假五丈之旗，為國效命，烏在不南面而王哉！」

蒲松齡於此段評論中透露其特殊的識人思維，他認為「志意慷慨」、豪氣干雲的崔猛乃「意過其通者」，其作為往往大快人心，卻失之太過，故崔猛雖路見不平即拔刀相助，卻竟篇不以「俠」稱之。而本業不明，因妻子有姿色而遭豪富之子甲設局誑騙，積欠大筆賭債的李申，在某甲與其妻被殺身亡後，因殺人罪遭逮，聞崔猛自首投案後，堅意為之擔罪。崔猛獲判充軍雲南，得歸後，李申始終追隨之，為之效力，甚至干犯死罪，報其恩德。李申與脾氣一來即負氣鬥狠的崔猛不同，他沉著以對，善於布局籌劃，且知恩圖報，對主忠心，有技有謀，故蒲松齡讚之可任以軍事大權甚至「南面而王」。蒲松齡對

³⁴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史仲文主編，顏品忠、顏吾芟等點注：收於《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頁，頁9621-9622。

³⁵ 同前註，頁9571-9576。

描寫武勇人士之篇章甚少評論，獨於此篇之末，發激賞之言，應具有一定之代表性，刻劃出其心中理想之武人形象。崔猛與李申，恰形成一組耐人尋味的對照角色，看似剛猛勇武、豪氣非凡的崔猛，卻「意過其通」；形象模糊卻能忍有謀的李申，可任之以「五丈之旗」，不但呈現出不以尋常眼光衡量人才之識見，也反映作者渴盼才華能被發掘之隱微心緒。

蒲松齡於科舉仕途上屢遭挫敗，其辛酸血淚化爲《聊齋志異》這部「孤憤之書」，自蒲松齡的人生際遇出發，關注其作品中的抒情性，一直是聊齋研究的重要命題，由此探討人才問題以及文人對科舉出仕之追求與失落³⁶，或是自他塑造的不同面貌之書生形象，求索其自我定位與感慨，如陳文新即以「狂生」類型的人物探討蒲松齡投注了自己人生經驗的藝術性創造³⁷。我們在對《聊齋志異》中的軍人相關篇章進行考察後，可以發現蒲氏對軍人的書寫帶有一種「志他者之異」的意味。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胡太虛撫軍〉寫胡撫軍能視鬼，謂其家中諸僕室皆有鬼出入，唯某僕之室除外，後該僕死，其婦守節終身。該篇賦予軍人術士化的異能形象，強調節婦、烈婦等正氣凜然，鬼亦避之，結合其寓勸懲的創作旨趣。卷十四〈甘肅李參將〉則寫李參將精康節觀梅之術，先後爲大學士、翰林與郎官占物，能藉人所拈之物而占其終身，不同人拈同物亦有不同占語，往往靈驗，文中舉「煙筒」爲例：

一翰林拈煙筒，曰：「貯火而其煙呼吸通於內，公非冷局官也。然位不甚通顯，尚待人吹噓故也。」問：「歷官當幾年？」曰：「公毋怪直言。火本無多，一熄則爲灰燼，熱不久也。」問：「壽幾何？」搖首曰：「銅器原可經久，然不見百年煙筒也。」其人慍去。後歲餘，竟如所言。又一郎官同在座，亦拈此煙筒，觀其復何所云，曰：「煙筒火已息，公必冷官也。已置於牀，是曾經停頓也，然再拈於手，是又遇提攜復起矣。將來尚有熱時，但熱又占與前同耳。」後亦如所言。³⁸

李參將以煙筒之質地、特性爲人占卜，言之成理而甚爲靈驗，其占卜對象恰皆爲文官，此則中的參將一反武人不通文墨之刻板印象，以其特殊技能成爲大學士、翰林等高級文官諮詢之對象，呈現出較爲特殊的軍人之智慧面貌。而卷十三〈烏魯木齊千總柴有倫〉，則寫千總曾助一傷重回婦速死，後得回婦之魂相助，方能順利渡水，此則以軍人擅長殺戮之特質助人，在軍人之肅殺形象之中注入人性之溫情，即異族之鬼，亦懂得回報恩情。

整體而言，《閱微草堂筆記》之軍人書寫篇幅更顯簡短，敘述益形精要，又多以紀錄他人之見聞的敘事手法爲之，較《聊齋志異》而論更顯出距離感，志異述奇的氛圍較淡，而突出勸懲寓善的說理力道。前所摘錄的篇章，皆表現出這種傾向，指向戒色、慎交友、守貞節等道德勸說，體現紀昀以小說傳達思想與知識的「寓勸戒」信念³⁹。

³⁶ 周先慎即從如何愛惜人才、選拔人才的角度切入《聊齋志異》中有關科舉考試題材的小說，認爲蒲氏將自己切身體驗的痛切之感鑄入小說之中，呈現出應舉士子的多種樣貌，詳參氏著：〈《聊齋志異》中的人才問題小說〉（上），《文史知識》2008年07期，頁25-34；〈《聊齋志異》中的人才問題小說〉（下），《文史知識》2008年08期，頁33-42。

³⁷ 詳參陳文新：〈蒲松齡的自我確認與人生感慨——論《聊齋志異》的狂生形象〉，《明清小說研究》1995年04期，頁79-87。

³⁸ 同前註，頁10473。

³⁹ 參考陳文新：〈《閱微草堂筆記》與中國敘事傳統〉，《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6年3月第2期，頁138-157。

三、王韜對太平軍的形象書寫

王韜之筆記體著作《甕牖餘談》以收錄太平天國紀事與外國異聞為主，前者即包含了太平天國之亂中，清方與太平軍方將領的相關軼聞。該書卷一共十八則，其中十五則皆記於太平天國亂事中清方英勇戰死將領之事蹟，其體例不同於志怪小說，而近於雜俎類⁴⁰。在交代人物的籍貫、進身歷程與官階後，尤特別注重人物性格特性之描述，摹寫其表情變化、記述表現其性格的實際事例、描繪其衣著特徵、屢入具臨場感的人物對話等細緻之敘事手法，使人物個性化、立體化。如〈紀全玉貴事〉寫全玉貴面對楊秀清帶領大軍而來，即「肆口謾罵」；「玉貴在營，喜衣素衣，每戰偏袒而前，軍中號為『白袍將』，所有裹首巾，上繡拚命二字」⁴¹詳述其穿著習慣，具象化全玉貴的外在特徵，其拚命形象躍然紙上。〈記伊興額戰績〉一則錄與副都統伊興額相識者之言：

營員中有與都統相識者，皆言其忠介之氣，溢於言色，談兵扼要，密合韜鈴，約束士旅，極為嚴肅。有妄取民間一物者，立寘重典，雖所親愛，法不少屈，以是能得士卒心，雖死不怨。兵民相安，數年如一日，往往禦賊於前，兵食不繼，而鄉民以麥飯往餉者，其事嘖嘖在人口。至今徐宿士民，道及都統戰事，猶能指畫其進退節制，結營臨陳，歎為奇才異勇。⁴²

王韜錄實際見聞者感佩之語，更增其真實性，所讚揚的軍人特質，不僅在於軍事才能之「奇才異勇」，更在其律下謹嚴，仁德愛民。除了表現軍人之性格特徵，王韜多以具臨場感的書寫方式重現戰鬥殺敵之場景，以血腥直露的筆觸寫實描摹軍人的受創身體，突出軍人忠烈之異。如〈記吳秀才事〉寫吳秀才「僅存親兵十餘人，而自亦創甚，體無完膚，血殷袍幅」⁴³，敵眾我寡亦不改其志。〈周軍門〉寫周盛華力戰髮匪（即太平軍）情況：

當事急時，盛華馬已被斫，猶步鬥，手刃數十賊無敢近者。繼以刀鈍不可入，賊知其力竭，以長矛奮刺之，陷其胸，盛華猶躍起丈餘，大呼殺賊而死。練丁中有李長勝者，猛戇善撲，是日以救盛華故，於賊陣中三入三出，最後賊圍之數重，力戰得脫，甫回營嘔血不止，倚土牆而僵，然鬚髯猶磔張也。⁴⁴

此則擷取軍人死亡之瞬間畫面，周盛華躍起、大呼殺賊而死，李長勝嘔血、倚土牆而僵，皆以動態摹寫連結死亡之靜態，對比且強化了死亡之永恆靜止，彰顯其精神的不朽。〈南楚雙忠傳〉亦寫魏承祝死時慘況：

（魏承祝）力竭，與其僕王福羅祖繩同死於難，身被七十餘創，賊銜之刺骨，割其首，剖其肺

⁴⁰ 雜俎類之筆記體雜記志怪、軼事、考辨等多種內容。見吳禮權：《中國筆記小說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頁9-10。

⁴¹ 王韜：《甕牖餘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卷一，頁3b。

⁴² 同前註，卷一，頁2b。

⁴³ 同前註，卷一，頁4b。

⁴⁴ 同前註，卷一，頁5a。

腸，懸諸樹以為標識。賊收隊入城，軍士夤夜盜其屍，移殯衡州，搏土作頭顱以殮。後兩月餘，城復，知縣戚天保，函首裹腸胃，遣人齎至，乃復啓棺納焉。行間死事之慘，未有過於魏君者也。⁴⁵

此則將受太平軍所創的傷痕數量化，並且如實描述身首分離、剮肺刈腸的死無全屍慘況，烘托清方將領的忠勇氣節。

《甕牖餘談》在卷一記述清方之將領忠烈而亡，在卷六、卷七、卷八則皆記太平軍方的將領事蹟。王韜雖以「賊」稱呼太平諸王與將領，卻於部份篇章中，不掩其敬佩讚許之意。王韜對太平天國之曖昧態度，頗引起學界關注。據稱，王韜為求以其智識實現政治理想，曾上書江蘇巡撫、上海道台而未獲重用，遂憤而轉向太平天國，以黃畹之名向太平天國上書獻策建言，卻被清兵截獲，只得至香港避禍。⁴⁶孫慶於《王韜生平與著作研究》中，彙整了歷來有關「王韜是否以黃畹之名上書太平天國」之討論，得出肯定的結論，《甕牖餘談》對太平軍諸王與將領之正面描寫，亦為證據之一。⁴⁷考察《甕牖餘談》對太平軍的描寫，於諸王之記事大率以負面述論為主，與其他寫太平天國軼事的著作相同，多直呼以寇、逆、賊、匪等詞彙。寫太平諸王與將領之記事大致循同一個模式，先概說其發跡進身經過，與洪秀全、楊秀清等「逆酋」的結交，再詳述所參與的重要戰役資訊，包括日期、地勢、過程、結果、雙方死傷情形，也述及清方參與該戰役的將領事蹟。整體而論，戰役紀錄佔了較大的篇幅，亦含有許多敘事片段，包括東王楊秀清漸驕橫進而引發天京事變之經過，對將領軍人與金陵居民施行之管理措施，進佔天京後諸王腐敗淫奢之荒謬行徑等，如〈洪逆顛末記〉中寫洪秀全入金陵後「漸荒於色，自奉甚奢」⁴⁸，末期清方圍攻益緊，糧食匱乏，竟建議軍民食百草之根所製的甜露，王韜評之「其恃妄誕慢如此」⁴⁹。於部份篇章中，則對所描寫之人物有形象化的清晰描繪，如〈紀東逆事〉中寫東王楊秀清「容貌瘦削，軀幹猥瑣，其面作青白色，目常有疾，鬚多繞頰而微黃，目不識一丁字，而權詐」⁵⁰，寥寥數筆而其特徵盡現，並突出其淫亂、殘忍與豪奢：

性尤淫，縱逼取民間女子未盈十七歲者三十六人，偽號王娘。好殺人，必先假天父指出甲其事乙某事當殺，使賊眾驚為神。……在城偶出，前後擁護數千人，金鼓旌旄之屬，凡數十事，轟雷耀日，而後繼以洋綉五色巨龍，長徑百丈，高亦丈餘，行不見人，音樂從其後，謂之東龍樂，已大興至，輿夫五十六人，輿內左右立一童，執蠅拂，捧茗甌，謂之僕射，輿後僞屬官百餘人從焉，又繼以龍行乃畢。……蓋東賊素弱，行淫無度，故多病，曾造一大牀，四面玻璃，中貯水以蓄金魚，荇藻交橫，窮奇極巧，枕長四尺五寸，即此見其淫亂之一端。⁵¹

⁴⁵ 同前註，卷一，頁 6a-6b。

⁴⁶ 江沛：〈王韜社會變革意識評析〉，收於林啓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頁 233。

⁴⁷ 詳參孫慶：《王韜生平與著作研究》，南京師範大學 2008 年碩士學位論文，頁 8-10。

⁴⁸ 王韜：《甕牖餘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卷六，頁 3a。

⁴⁹ 同前註，卷六，頁 8b。

⁵⁰ 同前註，卷六，頁 9a。

⁵¹ 同前註，卷六，頁 9b。

王韜陳述楊秀清之生活細節，從其出巡排場與器用具象化其淫奢之負面特質。其他諸王之記事，率多類此，如〈紀西賊事〉寫西賊妻與東王有私，西賊竟感與有榮焉；〈記翼賊事〉寫石達開之怯懦畏戰。僅〈紀干賊事〉、〈記英賊事〉中，對太平諸王有正面描寫。

王韜對於太平軍方之正面書寫，皆集中於面對死亡之無懼，落於敵人之手亦不色沮之氣節。於〈紀干賊事〉中，洪仁玕面對沈葆楨之審鞫「詞色不撓，歷供前後作賊事，不少諱」⁵²，寫其不因居於下風而色沮，沈靜以待生命之終結；於〈記英賊事〉中，讚許英王陳玉成之意則更為明顯：

官軍圍廬州甚急，糧絕援窮，遂為官軍所克，英賊乃遁之壽春。時英賊所踞之地，前後悉為官軍所得，羽黨散亡，洪酋又褫其偽職，屢加嚴責，壽春固苗沛霖出入所也，遂誘之至官軍營，或有勸之降者，英賊毅然不可，植立不跪，惟乞一死，乃寘之極刑。自英賊死而賊中無悍酋，越二年而洪逆亡。⁵³

這段文字中，「毅然」、「植立」、「惟乞一死」等語，雖簡賅而讚許之意昭然，一個不畏劣勢而堅守立場的剛毅硬漢形象躍然紙上。

於《甕牖餘談》卷八〈賊中悍酋記〉之中，羅列未列入專記之將領記事，其敘述皆採以下模式：介紹其籍貫、本業、加入太平天國經過、征戰軌跡、戰功、授封偽職、殞命經過，亦有數則包含了較為細緻的事件描寫。王韜於此篇之首，寫了一段簡介文字：

自竄江浙以後，所封偽士不勝枚舉，其間兇酋悍黨，破名城而抗官軍者，所在皆有，如李開芳之守馮官屯，林啓榮之守九江，葉芸來之守安慶，皆堅忍不屈，而金陵賊巢之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眾自焚而不悔，實為古今罕見之劇寇。⁵⁴

雖稱這些軍人為「古今罕見之劇寇」，卻又讚其「堅忍不屈」，留露出王韜不得不堅守政治正確，卻又無法掩飾激賞之情的複雜情緒，而「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眾自焚而不悔」，更以驚人數字凸顯出太平軍的悲壯氣魄。王韜於〈賊中悍酋記〉之中，既詠嘆太平軍將領之悍勇，又須表白屬於清方的「我軍」立場，其飄忽的複雜心緒，屢屢可見。且看王韜寫「賊中三悍酋」之首的羅大綱：

大綱能與賊同甘苦，得賊眾心，其臨陣時驟馬往來，剽迅如風，在諸悍酋中最稱猖獗。凡賊遇窮蹙之時，輒以大綱往，而大綱至亦惟知身先率賊，捨命與官軍相抗而已。⁵⁵

王韜寫羅大綱能放低身段，深得下屬愛戴，此為能得人心；策馬馭風，身段矯捷而有俠氣；臨陣則能身先士卒，捨命抗敵，非勇而何？寫曾天養，亦飽含佩服之情：

⁵² 同前註，卷七，頁 6b。

⁵³ 同前註，卷七，頁 9b。

⁵⁴ 同前註，卷八，頁 1a。

⁵⁵ 同前註，卷八，頁 1b。

曾天養，廣東人，驍桀敢死，然性頗和易近人，能與賊絕甘分苦，身同患難，以是賊無貳志。……塔軍門臨陣，每好匹馬衝鋒，嘗於一日携親卒四人，進覬播鼓臺，曾賊知軍門自至，突出欲擒之，獐鬚張目，勇氣百倍，直呼軍門名，橫矛遙刺其馬。親卒黃明魁，躍起刺曾賊墜馬，曾賊回刺明魁，傷右脅，軍門親刃曾賊殪之，繼奪獲其旗，視所署字，方知為偽丞相天養，天養素推為渠魁，伏誅後賊為之茹齋六日。⁵⁶

曾天養之形象與羅大綱相似，皆驍勇而能得下屬之心，不但描繪其死前奮勇攻擊「我軍」之狀，更記載了太平軍在曾天養殺敵殞命後，帶有神聖化意味的「茹齋」儀式。寫黎振暉「攻城陷陣，往往獨出先驅，賊中壯之」，「攻長沙南門時，奪賊大旗，奮勇先登，官軍急以鎗擊之，傷其一目，既愈，膽雄氣悍，猶自若也」⁵⁷，特別突出他在激烈戰事中，臨陣無懼、奮勇獨出之「壯」，與清方、太平軍方之敵我份際無關，而是出於對黎振暉個人的「膽」、「氣」而生的一種對英雄豪傑之衷心嘆賞。

整體而論，王韜之記太平天國眾寇事蹟大率以譴責之態度為書寫主調，怒責諸王入金陵後的鬆懈享樂行徑，直斥禁止男子歸家與妻「有私」卻以婦女賞賜將領的荒謬措施，以及不斷流露對百姓遭血腥慘酷屠戮的哀矜之情。雖如此，卻在敘寫干王、英王，以及羅大綱等將領時，又難掩其激賞心緒。而為了明哲保身，往往於帶嘉勉意的敘述文字後，繼以力道更強的怒責言論，試圖弱化、掩蓋其讚許之情，如評干王洪仁玕「一粗識之無之一庸妄男子」、「不過掉弄文字以自矜異」，論英王陳玉成「惡積禍盈，卒膏斧鉞」。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有關羅大綱、曾天養、黎振暉等「賊中渠魁」之書寫，幾乎沒有嚴厲的指責文字，則王韜對這兩位悍酋的敬佩之意，可謂昭然。

在文學作品中如何針對太平天國以及代表清朝政府的官僚體系進行描述，這本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複雜問題，黨月異在其碩士論文《論王韜的文言小說》中即指出：「王韜可能出於對太平軍所造成江南地區人民的傷亡有著憤怒，也或者是一開始對清政府即採附和姿態，……然而王韜後來隨著對太平天國瞭解加深，對清政府愈發失望的心態，漸漸傾向太平軍一方，就王韜經歷看來，他到過太平天國佔領區，對其宗教觀念、商業政策有所理解，加以 1854 年其墨海書館友朋洪仁軒升任太平天國總理朝，都使王韜對太平天國有了好印象。事實上，王韜的態度是曖昧不清的，……不過這些作品多寫在太平天國起義失敗之後，顯然又有向清廷輸誠之意。」⁵⁸

王韜之於太平天國有著十分複雜的轉變過程，他上書太平天國，是由於實現自我的正途受挫，轉而另尋他徑以求進身；他對太平天國軍人的激賞與正面描寫，未必隱含王韜對太平軍起義行動的正面支持與肯定。相反地，在《甕牖餘談》對太平天國之亂的描寫中，處處可見他對黎民百姓因戰火而受難的深切同情，以及對太平天國之掌權者之荒謬政策與貪淫行徑的譴責。然而，太平軍固然有著許多可訾議處，卻不能掩蓋某些軍人燃盡生命所綻放出的光輝，就這一人性關懷而言，王韜對羅大綱等人

⁵⁶ 同前註，卷八，頁 2a。

⁵⁷ 同前註，卷八，頁 4a。

⁵⁸ 黨月異：《論王韜的文言小說》，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3 年 10 月），頁 42—45。

的書寫，應是一種出於對軍人爲信念而捨命之無懼態度的關乎審美的謳歌之情。這種對軍人無懼死亡的英勇態度之審美感受，實凸顯了文學作品的軍人書寫中，以死亡爲崇高境界的一種文學傳統，一種軍人力戰而死方能展現的悲壯美。

四、結語

孔復禮在《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一書中指出「太平天國的教義之所以能爲一個嶄新的社會秩序發展理論根據，部份是由於原來的隊伍已經脫離了它們的社會母體：作爲村社，它們已懷有對新的和更純潔的村社生活的嚮往，已產生了一種共同的前途中的具體利害關係，這種關係只有村社而不是一股孤立的武裝人員才能發展起來。……一個防禦地方的複合組織，因為它內部的凝聚力鬆散和缺乏共同的政治傾向性，會與已存在的秩序發生衝突。」⁵⁹

就實際的國家內部情勢來看，在太平軍運動時期，地方的士紳階層顯然成爲清廷政府，以及太平天國兩方都企圖爭取的勢力，那麼士紳階層究竟如何看待自己在這兩方之間的關係？王韜書寫軍人形象的不容易歸位，也不容易定調，正是由於當時軍隊組織的凝聚力鬆散和缺乏共同的政治傾向所致，地方士紳集團建構的軍事組織概念與正規的清軍組織有著明顯差異，其回應的形象與蒲松齡、紀昀等清代文言筆記中的軍人形象自有相當差異性。

因此，本文從清代文言筆記的軍人形象，到晚清的《甕牖餘談》中的軍人形象書寫的勾稽，正可從此一特定面向回應出：戰爭顯示出秩序衝突下的價值反思，以及各種人在角色化過程參與其間的調和之路。「軍人」作爲秩序與價值的維護者，具有國家輔助武裝的地位，並與帝國政權有著深深淺淺的關係。蒲松齡以憤書爲軍人形象書寫基調，不免其幽微感慨的特質；紀昀對軍人這一群體透過類型意識的內化，以及其後之續衍筆記小說家的集體勾勒軍人形象，是對傳統精神價值譜系的回望靈光。相對於清代筆記小說的書寫，王韜《甕牖餘談》中面對無論是清軍還是太平軍方，雖然放在傳記或對政治的批判語境中進行，他仍不分陣營的展演出「軍人」以潑灑熱血、燃盡生命而成就的悲壯美。這是不同於蒲松齡、紀昀對軍人的理想角色期待，王韜屏除了敵我之分，對軍人的驍勇氣慨投以審美眼光，並關注不同軍人個體之獨特性，一方面正映現了傳統文人經由士紳階層的轉化，到了晚清洋場才子的個人印記，以及那價值轉型中的難言處境。

⁵⁹ 孔復禮著；謝亮生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台北：時英出版社，2004年9月），頁260—264。

主要參考書目

筆記小說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

(清)長白浩歌子：《螢窗異草》

(清)閒齋氏：《夜譚隨錄》

以上皆徵引自史仲文主編，《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清)宣鼎：《夜雨秋燈錄續錄》，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

(清)王韜：《甕牖餘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年。

石正人選編：《聊齋誌異續編》，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6。

相關研究論著

于師號：《宣鼎與《夜雨秋燈錄》研究》，南京師範大學2005年碩士學位論文。

吳禮權：《中國筆記小說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林啓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年。

周先慎：〈《聊齋志異》中的人才問題小說〉(上)，《文史知識》2008年07期，頁25-34。

周先慎：〈《聊齋志異》中的人才問題小說〉(下)，《文史知識》2008年08期，
頁33-42。

苗壯：《筆記小說史》，杭州：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胡友筍：〈《九歌》悲壯美感談〉，《船山學刊》2005年第3期，頁142-144。

孫慶：《王韜生平與著作研究》，南京師範大學2008年碩士學位論文。

馬明達：〈清代的武舉制度〉，《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1999年第4期，頁57-61。

陳文新《中國筆記小說史》，台北縣：志一出版社，1995年。

陳文新：〈蒲松齡的自我確認與人生感慨——論《聊齋志異》的狂生形象〉，《明清小說研究》1995年
04期，頁79-87。

陳文新：〈《閱微草堂筆記》與中國敘事傳統〉，《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6年3月第2期，頁138-157。

黃子婷：《〈聊齋志異〉與《閱微草堂筆記》之仿擬作品研究》(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張俊、沈怡鈞：《清代小說簡史》，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

管謹嚴：〈《夜譚隨錄》對清中期京旗生活的描畫〉，《民族文學研究》2008年第三期，頁132-137。

戴偉謙：《中國武舉與武術之探微》，臺北：師大書苑，2006年。

蘇珊玉：《盛唐邊塞詩的審美特質》，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

刻錄滄桑與召喚國魂——太平天國的歷史書寫*

高桂惠*

一、前言

明末董說、丁耀亢都不約而同的在其創作中定位理想讀者的解讀，提出「知我者，其為《春秋》乎！」到了蒲松齡《聊齋自志》則感嘆：「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前者創作的是透過變造創傷意象，來表述強烈的歷史意識；⁶⁰後者藉鬼狐花妖，表述對歷史的懷疑和對現實的批判。「知我者」的召喚，對作者而言，也許是一種永不可能實現的臆語，或可說是依違於正史與邊緣史的對價焦慮。⁶¹

對於太平天國，我們說得太多，卻知道得很少。透過千千萬萬的見證人，目擊者，在一幕幕流民圖⁶²的瑣碎話語中，他們的「呼吸生死」⁶³究竟曾經如何的走過歷史畫面？

二、衣衫藍縷的大地

(一) 死亡，就在我們身邊——太平天國的死傷殘疾

記下比較重要的事情，屬於流水帳似瑣碎記錄，即是「記事備忘日記」的特色，⁶⁴簡賅的記錄筆法目的並不在於細述事件始末，對於事件的評價與感想存在作者腦中，這些記錄無非是作為「電鈴之扣碼、書庫之目錄」，供寫作者日後回憶時一點提示。⁶⁵由此可知，日記的性質是極私人的，惟有寫作者自己才知道當時最細微的記錄動機與欲觸發的記憶，對於讀者而言，只能由作者選擇記錄／記憶的事件推敲作者當時的生存狀態、感受與價值判斷。大時代之下的私人日記有助於我們在官方文書之外，去碰觸時人生命的真實。沈粹《避寇日記》連篇累牘幾乎記下個人及身邊的人生命變化的細節，甚至是瀕死的對話，它們與作者有不同遠近的關係：

有關個人的病狀：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 97-2410-H-004-139-MY2 的部分成果，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舉辦的「2009 敘事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2009 年 11 月 28-29 日），感謝與會先進賜與寶貴意見。

*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⁶⁰ 丁耀亢《續金瓶梅》用《太上感應篇》的善書包裹情色，藉調和德色命題，來述說亡國之痛；董說藉《西遊補》和《西遊補問答》來述說失落的感受。

⁶¹ 郭皓政〈一部失意的「歷史」——論《聊齋志異》的文性質與歷史品格〉一文由蒲松齡以屈原、李賀、干寶、蘇軾自我脈絡化；並以達摩「面壁人」為其創作姿態，這種「零餘人」心態，乃創造一種有別於正史的「邊緣史」。《《聊齋志異》研究》，2006 年 01 期，頁 15-26。

⁶² 《難情雜記》中，〈王恆燾序〉指出而其閱書而覺「驚心動魄，雖古之流民圖無此淒楚。噫，予亦局中人，烏堪卒讀。」羅爾綱、王慶成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 6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74。

⁶³ 《難情雜記》王萃元序亦說：「其間飢寒奔竄之苦楚，呼吸生死之情狀，莫不備載。」《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 5 冊，頁 272。

⁶⁴ 參見鄒振環：《日記文獻的分類與史料價值》，《復旦史學集刊》第一輯《古代中國：傳統與變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307-334。

⁶⁵ 吳宓：「凡藏儲腦海者，他日就此記之關鍵，一按即得。故惟示綱目，而不細敘，藉免費時而旋中輟云」。見吳宓：《吳宓日記》第 2 冊（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頁 19。

是夜寓學善堂鄭妹丈處，即發瘧。⁶⁶

已晚，走至董宅，而余力已大憊矣，是夜宿董宅，又發瘧。⁶⁷

余身腿皆僵，（下缺數字）使遍體壯熱，至廿三日方涼。⁶⁸

時妹病初癒，余時便身壯熱，不得汗解，且患痢日數次，在舟中夜數數起，食不下嚥。……至烏鎮沈梅卿處乞治，沈曰：「速服藥，否則，變三虐矣。」……即買藥下榻鄭妹丈家，四妹亦病連日，賴諸甥女看至藥餌，余心甚感焉。⁶⁹

有關家人的疾病：

家母欲歸家，以天忽大風雨遂止。是夜驟冷，家人皆傷風。⁷⁰

余至鄉時，家人輪流患目疾，余寒疾未癒，又染目疾，是以大憊。母妹皆發瘧，一家五口均臥病，不能興，雇兩女工，人甚骯髒。⁷¹

老母病臥，寸步不能行，骨瘦如柴，身熱，咳嗽不止，終夜不輟，余無奈何。此時鎮上無從求醫藥，以醫者亦病，用藥多代用也。余乃於十六日竭誠求大士仙方，每日連吃仙方兩劑，越二日咳嗽稍稀，夜有一時許安枕矣。⁷²

姊嗽病大發。⁷³

母曰：「爾姊前日走後，病日劇，奈何？」余曰：「此刻從何得醫藥，明辰至鎮，當銜哀極誠求神明而已。」

姊呻吟床第，朝夜不止。……適鄉人鄰舍有鎮人逃難於產中遘病，邀鍾小園看病，余亦邀為母、姊、妻等看病，醫謂姊但恍惚，無甚病也。是日，姊已不食，謂余曰：「甚毋買藥，余朝夕求死也。」⁷⁴

方姐之未死也，妻以產後遘疾，多謔語，余既請醫視之，又至卜肆問凶吉。⁷⁵

董曰：「爾母尚好，惟爾妻初四夜死矣，後二日所生女亦死。」余聞之神魂驚喪，亦不知何以變至此。蓋於初三日去雙，而內子產後病未癒，於初四傍晚有鄉媪來借布機制其門，鄉人去即變

⁶⁶ 沈梓：《避寇日記》卷一，《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8冊，頁19。

⁶⁷ 沈梓：《避寇日記》卷一，頁30。

⁶⁸ 沈梓：《避寇日記》卷一，頁31。

⁶⁹ 沈梓：《避寇日記》卷一，頁33。

⁷⁰ 沈梓：《避寇日記》卷一，頁11。

⁷¹ 沈梓：《避寇日記》卷一，頁31。

⁷² 沈梓：《避寇日記》卷一，頁36。

⁷³ 沈梓：《避寇日記》卷一，頁21。

⁷⁴ 沈梓：《避寇日記》卷一，頁31。

⁷⁵ 沈梓：《避寇日記》卷一，頁32。

症，謔語不清。鄉間惟老母與徐嫗及堂弟在，再四灌以湯水，而謔亦甚，鄉間無醫藥可求，口中喃喃，惟以長毛至為言。⁷⁶

有關鄉里的疾病：

是時新瘧亦瘟疫流行，死者無數，主人家亦多病人。⁷⁷

瘟疫大作，死者日以五六十人，而染病者都是寒疾之狀，多則二日，少輒一周時許，亦有半日即死者，直至廿三、四兩止，疫稍稀。⁷⁸

《避寇日記》裡不僅紀錄家人鄰里多人病情、症狀、醫治過程，還紀錄病人發病時的「謔語」：「口中喃喃，惟以長毛至為言」。這裡值得思考的是，《避寇日記》中所記錄的事件究竟是沈梓個人的經驗還是時人的集體共感？若以沈梓在日記中書寫的「生病經驗」為線索，發現這不僅是沈梓的個人經驗，同時也是時人面對的問題。根據余新忠的研究，在咸豐十年到同治三年之間，被清軍與太平軍反復攻打、占領的蘇浙皖地區爆發大規模的疫疾流行，⁷⁹而沈梓則以自己的筆記錄下了自己與家人患病的經驗。可以說，疾病的流行是時代的集體共感，但作者「壯熱」、「發瘡」的身體感受，病中逃難與無醫可求的經驗，家人病故收葬的傷痛、春節僅有母子二人存活度過的寂寥感等，卻是極其個人的。

司徒琳在檢視儒者的創傷曾指出，作者如何描寫所經歷的苦難，如何記錄所體會的驚駭，皆與個人的社會地位、自覺的義務感以及處事原則……等有關⁸⁰，正如哈布瓦赫所揭示的：現在的情勢影響人們對過去的歷史具有選擇性的感知的⁸¹，有些作者以自我與他者的痛苦、死亡來感知，然而除了大跨度的鳥瞰一場戰局與劫後餘生⁸²，在掌握世事的歷程中，停留在某一個細節畫面的刻錄，更呈現了某種情緒的極致，這種當下性的細節，有時又是非常特殊性與個人性的，如龔又村著《自怡日記》在這一方面按時間順序細述一些私人瑣事，非常有畫面感、臨場感：

（咸豐十年三月）二十日丑刻，得第四子培初，因墜地受傷，煙燻始啼，半日即變。予年逾艾，左耳病聾，雙目多淚，自嘆早衰，不分又添逋累，懸華一見，雖可惜不為凶也。但內子產三兒乳枯，至此轉潤，無兒索飲，未免傷心。向年是日，有湖田龍舟迎接李王，此回邑侯示禁，因東南尚有賊匪，恐賽會一開，奸細易於混跡耳，故城戶均書人口存簿稽查。⁸³

（咸豐十年五月）廿七日，清早，予咳血，想因郁熱所致，天氣晴燥，書塾雖面北，而背後炙驕陽，不可久坐，且臨街負貶（販）鮑魚者，均擺攤塾前，市囂不絕。復有留養難民，雜處祠

⁷⁶ 沈梓：《避寇日記》卷一，頁 35。

⁷⁷ 沈梓：《避寇日記》卷一，頁 35。

⁷⁸ 沈梓：《避寇日記》卷一，頁 36。

⁷⁹ 余新忠：〈咸同之際將南瘟疫探略〉，《近代史研究》2002 年第 5 期，頁 86。

⁸⁰ 司徒琳著，王成勉譯：〈儒者的創傷——《餘生錄》的閱讀〉，《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9 期，2008 年 6 月，頁 4。

⁸¹ 〔法〕哈布瓦赫（Halbwachs, M.）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58。

⁸² 如江蘇儀徵縣某蒙館塾師程畹其《避寇紀略》記太平天國癸好三年、丙辰六年克儀徵和戊午八年攻破江北大營時逃避事說：「慨自戊午越境，迄金陵克復逆伏誅之歲，六易寒暑。中間更金陵大營之潰，張忠武扼於重臣，戰歿丹陽，江督何桂清遠遁上海，東南淪陷，中原震動，西夷內逼，顯廟北狩，淮揚岌岌僅存。紅巾退踞天、六，進犯揚州，視儀徵如傳舍。官兵扼河以守儀揚各鄉，利則戰場，頓則甌脫，居民荒田不耕者，恒數百里。賊至以江州為命，稍後不脫，雖老嫗無不淫污致死，雖乞丐無不拷掠求金，不遂則裹以棉，浸以油，而投於火。賊以厚毒速亡，如是者數歲，歲三四至，遺黎幾盡。」可與《咸同廣陵史稿》記揚州繁華係太平軍撤退後，毀滅於清軍的焚掠互證。《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 4 冊，頁 371。

⁸³ 龔又村：《自怡日記》，《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 6 冊，頁 22。

門，藉苦寢地，釀成溼疾，時疫又興，死者相繼，婦哭兒啼，遺溺遍地，難與為鄰。⁸⁴

（咸豐十年六月）廿四日，予齟齬齒搖，紅白痢未淨，乃就張岳生診視。……聞西賊逃回江陰，山東梁國泰之功，虞境雖清，而江城仍失。⁸⁵

（咸豐十一年）中秋，寒雨。悶課祐兒，恨其昔年連病，竟斫性靈，讀書喉澀，往往半句中止，氣不灌輸，而溫故如隔世，大半遺忘，其於世故亦全不知，似非克家之子。況吾自避難以來，了無生色，一腔慙直，於俗不諧。欲覓蠅鬚之館，迄少機緣，覺無才足庇妻子。惟羨大侄之暗中排難，醫不忘酬，親友皆感，到處種緣，事畜無虧，點金有術，遠勝吾父子矣。⁸⁶

（咸豐十一年九月）觀音誕日，祐兒仍寒熱，幸得潘相國家沈香神曲，其母誦佛煎之，服即大汗，病體霍然。翌日，仍熱似瘧，伯謙來診視，連服兩劑，又邀周婦推驚。（頁79）⁸⁷

（咸豐十一年九月）廿六、廿七兩日大雨水漲，稻不得登。祐兒服侄劑病癒，惟祉兒久患便血，日解頻頻，大受其累，曾焙棉子搗灰酒沖服之，未能即止。⁸⁸

（同治元年八月）初七日，是夕祉兒甫起床，而幼女靜方又病。……十二日，女病轉重，倩家金園廷琥推拿，仍遣伯謙診治，夕為焚鑪請喜，旦暮不安。⁸⁹

（同治元年八月）十四日，予與內人又病，倩伯謙診視，兼延朱金奎挑痧，全家半在床，乃招族妹服侍。⁹⁰

（同治元年）中秋，不意熱根未淨，嘔吐頻仍，自悔無以慎疾，矧婦苦肝風，女熾心火，仍是危機，乃禱送神鬼，兼之喚魂。⁹¹

（同治元年八月）十七日，伯謙仍來診脈。次日，予緣叫喜吃驚，中宵又聞匪傷張氏病母，並聲言供應不豐，將劫其媳，牽馬進港，勢欲來沖。平明，又聞打門，疾呼賈氏下櫓開船，因朱氏人船俱被押去也。三次驚惶，予熱又作。⁹²

（同治元年八月）廿二日，驚報幼女唇焦肢冷，形木聲尖，頭重眼昏，病甚危篤，幼兒次女及陪病陸婦又患寒熱急痧，內子鎮夕不眠，予亦煩躁。伯謙按脈，仍嫌耗費心神，乃書五禁於柱云：「要命莫作詩，保病莫翻書，求靜莫較辭，改性莫食脂，安分莫焦思。」……次日，幼女因母病分床，連呼阿娘，而起病以來，眼無一合，汗無一滴，神昏語讞，人面莫辨，其象不佳。予則服藥熱治，夜得三夢，一夢到蔡東家撞到（倒）雙酒瓮；次則自知有疾，偶拈一侶字；三

⁸⁴ 龔又村：《自怡日記》，頁31。

⁸⁵ 龔又村：《自怡日記》，頁34。

⁸⁶ 龔又村：《自怡日記》，頁74。

⁸⁷ 龔又村：《自怡日記》，頁79。

⁸⁸ 龔又村：《自怡日記》，頁79。

⁸⁹ 龔又村：《自怡日記》，頁111。

⁹⁰ 龔又村：《自怡日記》，頁112。

⁹¹ 龔又村：《自怡日記》，頁112。

⁹² 龔又村：《自怡日記》，頁112。

則亦知在毛界，遷徙進城，半途醉酒家，跌倒泥溝，呼大兄扶起，旋進靈公殿喜廟台，巍煥如仙界。竊思酒為水雞，祐兒食此而厥，金福食此而亡，今早欲覓水雞煎湯特停之。又想夢多反證，遷徙進城，是由城遷鄉也。避難以來，深得猶子之助，故先兄手扶。今夏祀火神，家家用紙錢，予家僅香燭，今特補禮，命子代叩神前，而一人疊口，又豈呂仙早示女疾無可救之方，當信此歟？抑或當視病女口疳，當防合家口過歟？午後，朦朧中又見一塊生肉，量來方七寸，幼女恰合七歲，恐非吉徵。⁹³

（同治元年八月）廿四日。夕聞南京逆匪被官兵攻城，浙江衢州克復，狂喜之至，予病霍然。⁹⁴

（同治元年八月）廿五日。而猝驚幼女靜方培禱之變，目矇風起，彌留至戌刻，竟應黃昏食肉之夢，年僅七齡耳，慘哉！⁹⁵

（同治元年閏八月）初四日，祐兒寒熱煩惱，因招伯謙醫視，帶沉香神曲，言須得暢汗，垢濁下行，病乃脫體。……予坐至夜中，誓每晨誦包元帥傳宣觀音咒，及關帝先天神咒一百八遍，焚香膜拜天地神佛祖宗，每月朔焚冥鏹一角，拈香禮天，每逢齋期茹素三月，或可淨心慎口，稍贖前愆。⁹⁶

（同治元年閏八月）十二日，始大解，病減八九，沈得山丈來視，為我言鎮江官兵遇賊，眾退進城，被賊填屍城口，城內火藥雖盡，幸將藥桶投出焚屍轟賊，賊始逃。……江南救援無兵，殊堪焦慮。⁹⁷

（同治元年閏八月）望日。……既望，祐兒因餘熱未清，牙齦腫腐，時見血痕，王小庄與伯謙同議瀉黃法治之，並吹涼藥。⁹⁸

（同治元年閏八月）十七日。……祐兒牙根毒蔓。⁹⁹

（同治元年閏八月）十八日，次女又寒熱，唇乾口燥，未得即涼。¹⁰⁰

（同治元年閏八月）十九日，里中祀瘟部，予出分金，虔誠往拜，夕憩蘆棚，聽曲三鼓，踏月而回。翌日，次女恙未減，而書生來讀，斗室難離，未得靜養，甚為憂心。祐兒雖熱有起止，而牙疳仍熾，厥勢非輕。¹⁰¹

（同治元年閏八月）廿四日，次女熱盛，見紅白疹。……越日，女仍焦灼，因汗未暢，疹發無

⁹³ 龔又村：《自怡日記》，頁 113。

⁹⁴ 龔又村：《自怡日記》，頁 113。

⁹⁵ 龔又村：《自怡日記》，頁 113。

⁹⁶ 龔又村：《自怡日記》，頁 114-115。

⁹⁷ 龔又村：《自怡日記》，頁 115。

⁹⁸ 龔又村：《自怡日記》，頁 118。

⁹⁹ 龔又村：《自怡日記》，頁 118。

¹⁰⁰ 龔又村：《自怡日記》，頁 118。

¹⁰¹ 龔又村：《自怡日記》，頁 118。

多。……族中喪事，往謁不及暢談，知今秋無家不病，素衣盈盈，與咸豐五年相仿。¹⁰²

龔又村《自怡日記》中紀錄了大量的作者及其家人的疾病歷程，其疾病書寫集中於咸豐十一年、同治元年二年間，又以幼女靜方於同治元年八月間患病至身亡之記載最為詳盡，作者記幼女病情轉重後，「唇焦肢冷，形木聲尖，頭重眼昏，病甚危篤」；次日則更為嚴重：「連呼阿娘，而起病以來，眼無一合，汗無一滴，神昏語讞，人面莫辨」。當日，作者還紀錄了不祥的夢兆，「朦朧中又見一塊生肉，量來方七寸，幼女恰合七歲，恐非吉徵」¹⁰³，其擔憂驚怕深入魂靈，其幼女果於數日後病故。於紀錄幼女病情之日記中，還交錯著作者自身、作者之妻以及其餘子女的病況紀錄，以及作者聽聞的太平軍戰況（同治元年閏八月十二日的記載），將醫者（伯謙）之言、生理反應、病情與戰況穿插敘述，由記載可見，作者背負著喪女的巨大哀傷，以及自身的病痛，卻又關注著太平天國亂事之戰況，呈現焦灼之感。

龔又村《自怡日記》所建構的，就是在太平亂事中所切身經歷的，外部之「國」的戰亂肆虐與內部之「家」的病苦之自我敘事，世變與家變交錯，戰爭與疾病的雙重死亡威脅，折磨著戰亂中的苦難人們。在日記中，無論是書寫實際的戰況，抑或是作者家庭中對抗疾病的戰爭，皆充滿焦慮、無奈而無依的情緒，這樣的自我敘事深刻且真實地反映了世變中的亂離傷痛。

誠如陳思伯《復生錄》著眼於戰亂對身體的摧殘¹⁰⁴，細寫嚴峻、恐怖的環境，以及如何一再地暴露於死亡的陰影下，包括自己的凍餒、足痛、瀕死經驗，乃至於描寫別人之傷殘、死亡，最後說道：「四載亂離，萬死一生，令人不堪回首。光緒甲午仲冬，寄硯淦川，幕窗閒暇，回憶前四十年所歷難中苦境，筆之於書，乃安不忘危之意。望諸子各錄一本，置於案頭，時時寓目，俾共知予身得來不易。至於處世為人，務遵祖訓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字做去，予處顛沛流離鍾猶得生還者，皆賴此八字力也。願諸子力行好事，不問前程，積穀積錢，莫如積善，庶可期永昌厥後，不負天佑予歸，延續陳門二房宗嗣之恩德也已。」¹⁰⁵陳思伯之所以聚焦於戰亂中的恐怖遭遇，目的並非出於對戰爭的控訴，或是一種揮之不去的傷痛情緒，相反的，他是要彰顯一種儒家的處世原則，表明正是此一力量而使其得以延續宗祠，故他實是欲藉由書寫、紀錄，將此思維傳遞給後代子孫。

陳才芳的《思痛錄》亦近似於此，其自言：「思痛錄者，芳自述遭難始末也。同治癸亥，髮逆圍陷漢南，全家殉難，芳屢次被擄，辛苦備嘗，身受重傷，萬死一生，真所謂痛深創巨矣。迄今承平二十餘年，回憶官府之剝削，兵勇之搜括，人民之互相殘食，以及城陷後屋宇成灰，屍骸露積，傷慘之狀，

¹⁰² 龔又村：《自怡日記》，頁 118-119。

¹⁰³ 以上三則引文皆見龔又村：《自怡日記》，頁 113。

¹⁰⁴ 陳思伯：《復生錄》自述太平天國壬子二年（清咸豐二年）冬，太平軍攻克武昌時，被編入軍中，任右一軍旅帥鄭阿培變理，掌管筆墨事件，後隨北伐軍北伐，攻抵天津，駐軍靜海、獨流，困守連鎮，營中食盡，逃出投降清軍，又隨僧格林沁至高唐、馮官屯，李開芳被擒後，始回武昌等情事。寫太平軍凍死情狀：「甲寅四年正月初間，林逆在獨流約會駐紮靜海李逆傳令，夜由冰上踏雪急走。行冰路六時餘里，東方漸明，始上大堤。雖出重圍，而冰上凍死休息賊屍，沿路皆有。次早見堤上或坐或臥之賊甚多，出以為睡熟，迨呼喚不醒，推知應手而倒，始知全行凍死。至午前猶有大呼熱急，自行解衣飲雪，倒臥雪中滾死者，周身紅色，想是外受寒逼，陽氣內攻於心耳。予履冰一夜，足未停趾，次日行至午後稍為歇息；又行一夜，幸身帶麵食，得以不飢。至第三日，聞前隊駐紮陳穀莊，問距靜海縣，已行三百餘里矣。予因衣履結冰甚厚，不少溶化，兩腿凍直，難於行走，中途在已熄滅灰火內少立片刻，忽然掣痛，豈知因此一立竟將足趾煨熟，到陳穀莊剪開鞋襪，見十趾黑色，又休息三日，雙趺使見潰爛，兩手拳曲，並月不能稍伸，不但手與面上退去黑殼一層，搶將左手二只凍死半節，可謂奇冷矣。二月杪，林逆忽又傳令由陳穀莊夜行。正當北道解凍之日，途中淤泥節節皆是，凍足之賊何能行走？一陷泥中，開口呼救。賊目慮官軍得信追襲，抽刀自殺，可憐。因足痛落後者，悉為官軍斬馘無遺。是夜陷死悍賊數逾萬計。」《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 4 冊，頁 347-348。

¹⁰⁵ 陳思伯：《復生錄》，頁 355。

歷歷如在目前。誠恐日久安居，頓忘苦境，爰就身所親歷者略序梗概，亦痛定思痛之意云爾。」¹⁰⁶

對照楊鼎昌的〈《思痛錄》序〉所言：「大難當前，孝子不死，其信然哉！……方其遇賊也，以母故忍弗死；其給賊也，又以母故弗恤死。視棄母之後，臧賢不肖，相去何如也。夫賊擄必死，逸而獲傷被體必死，給賊不得金，則更不得不死。且自度必死，而春亭竟以不死，於此見天之不死之者，其機至隱，其理至明。而所為眷孝子者，且未有已矣。厥後掇魏科登顯仕，特報施之。」¹⁰⁷這一段「不死」的感觸，說明作者幾乎沒有辦法解釋活下來的原因，只能拈出一個無法被證明的「孝子不死」的感悟。

書寫死亡是爲了當下的需要，同時也創造了血緣關聯的重要性，更強化了這種重要性的時代意義。¹⁰⁸疾病作爲戰爭的前景，表露了人們束手無策的窘迫，「無家不病，素衣盈盈」訴說著成千上萬人的死亡，不但揉合了社會中對肉體苦痛的感受，更指向不祥的幻想——天譴，是人們在竭盡所能地尋找出路，而無路可走時在文化和講述之中再度喚起倫理道德的超穩定結構，作爲自圓其說的心靈鎮痛模式。

（二） 饑餓，如影隨形——物價實錄與民生疾苦

戰爭不僅觸動生命現象與生命價值的感懷，也開啓了一場非常現實的生存意義之思考。佚名《咸同廣陵史稿》記錄戰爭期間兩湖的民生情景：

兩湖賊兵暨江左亡命之徒，食狗食貓，貓盡食鼠，鴉雀亦槍斃無子遺。甚且煮釘鞋底，煨牛皮箱，人情洵洵，殆無生理。況屍水灌井，疫氣滿空，受之者搖頭輒死。¹⁰⁹

兩湖地區是清代全國最重要的商品稻米產區，雖然兩湖在太平天國戰爭中所受影響不若江浙、江蘇、安徽來得大，於清代米價之相關統計研究中，仍可見戰爭對米價的明顯影響，則蘇、浙、皖之米價，變合理當更劇。從龔勝生〈從米價長期變化看清代兩湖農業經濟的發展〉一文除去貨幣通貨膨脹因素所做的清代兩湖米價統計資料來看，1860年間較1850年間的米價上漲了一倍，由1.43兩／石，上升至2.98兩／石，爲整個清代變化最劇烈者，直至民國初年，方出現更高的米價（3.4兩／石），然而其10年間的變化程度，亦不如太平天國戰爭年間大。¹¹⁰

《避寇日記》與《小滄桑記》中，有不少關於紀錄米價與物價的文字，以《小滄桑記》爲例：「入春以來，軍威大震，而城中無物不貴，食米每石至七千餘文，豬肉每斤一百八九十，魚向四五文一斤者，今十倍之」¹¹¹；「自圍城以來，城中米價，每石八千六百文，肉每斤四百文，柴每斤二十文」¹¹²，

¹⁰⁶ 陳才芳：《思痛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4冊，頁432-433。

¹⁰⁷ 楊鼎昌：〈《思痛錄》序〉，《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4冊，頁432。

¹⁰⁸ 王汎森：〈歷史記憶與歷史：中國近世史事爲例〉一文指出 Halbwachs 有關集體記憶的論點有一主要特色即是：人的歷史記憶是被建構的（constructed），而且是依照個人或團體的利益或政治社會現實去建構。爲了應付現實的需要，或合理化現實社會政治境況，並不一定要全盤創造歷史記憶，有時只需識認、組合或重新詮釋歷史中的某些成份，便足以達成目的。所以爲了當下需要創造或強化某種血緣關聯，如孔祥熙與山東曲阜孔府的聯誼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當代》第91期，1993年11月，頁40-49。

¹⁰⁹ 佚名：《咸同廣陵史稿》，《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5冊，頁95。

¹¹⁰ 參見龔勝生：〈從米價長期變化看清代兩湖農業經濟的發展〉表3「清代兩湖米價變化趨勢表」，《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2期，頁84。

¹¹¹ 姚濟：《小滄桑記》，收於王重民等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6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

此二則日記，前者記於同治元年三月三十日，後者記於同治元年五月三十日，二月之間，米價漲幅高達二成多，物價飛漲若此，而作者不僅當下慨嘆，更憂心於未來的漲勢，「東北鄉田畝既荒，又乏農具，能下種者不過十之三四，目前如是，日後不堪設想」¹¹³，生活的艱難，眼下又無改善之徵象，生存的希望就在數字攀升中，漸漸黯淡。

作者再三記錄當地及鄰近城市的米價。但少做評論，以日常必須的稻米價格來看生存之艱難，也反應其變化中的一些狀況。如沈梓《避寇日記》最重視這個問題，即具體予以記錄：

廿一日，聞濮院米價每升七十七文，屠甸市每升八十四文。¹¹⁴

十八日米價漸漲，冬春須六元內外，濮院每升九十餘文，王店一百外，紹興斗米一元，合錢一千五百餘。¹¹⁵

文桐鄉鍾長毛在烏鎮設卡，每絲一包，稅洋三元。烏鎮何長毛用船保客商過卡，每包絲只收稅一千文。¹¹⁶

新塍米價每升百廿餘文，而濮院可知也。¹¹⁷

米價前月二十邊賤□□洋許，至初旬冬春不過五洋有餘，尖米四洋。¹¹⁸

塘棲米價皆百文，皆系長毛販賣。¹¹⁹

米價問題亦見於同治二年前半年：

聞官兵至富陽不退，居民大得沾惠，營中糞米一百文得米三升云。初餘杭等處自去年以來米價昂貴已久，每升百二十文，販米者與長毛合夥營生，除去關卡路費尚不獲利。自餘杭以上至於潛、昌化，則更貴不可得。¹²⁰

每鹽四兩值價須洋一元。¹²¹

王店長毛齊開當，四月為滿，每千按月六分錢，三千以外四分錢。……聽王娘娘生日，王店派三千。

495-496。

¹¹² 姚濟：《小滄桑記》，頁 503。

¹¹³ 姚濟：《小滄桑記》，頁 503。

¹¹⁴ 沈梓：《避寇日記》卷三，頁 121。

¹¹⁵ 沈梓：《避寇日記》卷三，頁 173-174；又見頁 126。

¹¹⁶ 沈梓：《避寇日記》卷三，頁 174。

¹¹⁷ 沈梓：《避寇日記》卷三，頁 175。

¹¹⁸ 沈梓：《避寇日記》卷三，頁 176。

¹¹⁹ 沈梓：《避寇日記》卷三，頁 177。

¹²⁰ 沈梓：《避寇日記》卷四，頁 193。

¹²¹ 沈梓：《避寇日記》卷四，頁 189。

計春間所派海塘費二萬金，吾鎮只繳二千元。六月中，計民欠漕米九百擔，著鄉官攤賠，應派七千餘元，吾鎮只繳五百元。其秋間復貸米四百擔，吾鎮只派一百四十元。¹²²

每鹽四兩值價須洋一元。¹²³

（咸豐十年六月）廿二日雨，自初六至今一雨不息，計十八晝夜。禾頭生耳，晚棉盡損，既遭兵劫，復遭天災，今冬薪米之貴，不問可知，而床頭金盡，惟仰屋嗟歎而已。¹²⁴

這些細瑣的紀錄舉凡太平軍之販賣鹽米、稅收實況、農作物歉收，如數家常。

姚濟《小滄桑記》中其他數則與經濟、民生相關的日記則與關懷之情並陳：

（同治元年正月）初八日，北路營盤又解來長毛六十餘名首級，左耳無算，訊之大半杭州鄉民，言：「城中被圍兩月，斗米四千文，水草至四十文一斤，餓莩枕藉，至十一月二十八日，萬不能守，王撫軍、瑞將軍、麟方伯同時殉難。」¹²⁵

（同治元年七月）廿七日，胡相之自金山衛回，言：「自張堰以南，大石村以東，滿目荊榛，無一顆稻稈，人家少壯被虜，惟存婦女老稚，三旬九食，止藉糠粃活命，然猶無處乞索，日走一二十里，竟有空手回者，以致面無人色；業奉新令築塘治河，冀以工代賑，而丁壯乏人，且一切起土挑土器具無從置辦，輒呼奈何而已。」¹²⁶

（同治元年七月）廿九日，……兩月以來，兵威大振，而登城四望，烟火蕭條，散者歸聚無期，存者棲身無所，南北鄉開耕之田，十僅二三，飢民嗷嗷，日甚一日，八口之家，一日三四百文，方可圖一飽；加以疫癘盛行，日有十數家，市櫬為之一空。¹²⁷

（同治二年十月）初十日，夏秋以來，西南各路難民沿街倒臥，面無人色，雖設粥局不能徧給，呼救之聲耳不忍聞。昨有一上海好善者，目擊顛連，議借育嬰堂廩間收養童男幼女年在十五六以內者，給予衣食過冬，明春再為設法，誠一大功德也。¹²⁸

（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予家紅秋族弟狗官早孤，隨母撫養於外祖俞氏，於咸豐庚申被虜；忽於昨日有人送回，已為凍餓所困，兩足腫不能行。據云：「自宜興逃出，宜興百姓相食已久，人肉亦賣五十文一斤，人家有病，死者不敢哭，蓋一聞哭聲群將屍身分割去也。」¹²⁹

（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三日，遇南匪人言：「上南今歲木棉大熟，畝收一二擔不等，價可每擔十

¹²² 沈梓：《避寇日記》卷四，頁 185。

¹²³ 沈梓：《避寇日記》卷四，頁 189。

¹²⁴ 姚濟：《小滄桑記》，頁 455。

¹²⁵ 姚濟：《小滄桑記》，頁 487-488。

¹²⁶ 姚濟：《小滄桑記》，頁 507。

¹²⁷ 姚濟：《小滄桑記》，頁 507。

¹²⁸ 姚濟：《小滄桑記》，頁 529。

¹²⁹ 姚濟：《小滄桑記》，頁 532。

千文，因此家給人足。」同在東南五百里間，苦樂之不均乃如此。¹³⁰

（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予出西門，見嶽廟對過起建新新酒樓，仿照滬城式，頗極華麗。阜成水煙鋪亦金碧輝煌，較前更勝。鉅劫之後，轉益奢侈，無怪房貨捐之層出也。聞浦南各營奉調赴蘇，所過之處雞鴨食物為之一空。¹³¹

《小滄桑記》是於太平軍為亂期間，作者姚濟（1807—1876）因足疾且母已年老，故未至他鄉避難，在家鄉松江（於今上海市）所寫之日記。日記絕大部分的內容是作者紀錄與太平天國之亂有關的見聞，來源為友人、鄰人、親戚、路人等，以及松江軍情，亦錄探聽到的軍事情報。除此外，還包括祭祀活動、家中大事、民生物價等內容。

由書名觀之，日記之主要聚焦是「書寫滄桑」，日記中俯拾即是的是死亡的紀錄，清方、太平方之軍人因戰爭而亡，為亂的盜匪、兵勇被懲戒梟首，作者的鄰居、親友，被殺被虜，或傷重或病或自盡。作者似刻意以一種不流露強烈感情的態度來紀錄，並未因戰勝而欣喜過望，也未對太平軍敗而額手稱慶。流露情緒時，多在於「賊」已逼近，直接威脅其生命安全時方表現。

在生命不斷受到威脅的生活環境中，他與家人能繼續生存與生活才是他最關注的。因此日記中，還包括了許多記載物價、民生的資訊見聞實錄。然而，其紀錄死亡，雖以狀似淡漠之語記載，並非漠不關心，而是在滿佈死亡事實的日記中刻錄滄桑，至於情感，則可由少數幾則日記中所錄的輓聯以及作者自身觀時事有感之詩作中，得其感時傷逝的深沈情感，所以《小滄桑記》帶有一些傳統文人的抒情性：

（咸豐十一年三月）初四日，聞南橋有唐某，狀歲游幕四方，晚而家居，以古道自持，上年五月十四日，聞郡城失守，約其友某殉難，友以未了辭，唐乃作絕命詞二首：公服向北再拜，自縊而死。予友郭友松作輓聯云：「落落雲間，守死只一二人，此心百折不回，直欲九原尋卞壺；茫茫寰宇，壯遊經十三省，今後四方靡聘，空教一哭了唐衢。」¹³²

（同治元年五月）初五日，黎明，知五里橋賊仍未退，生生橋營盤出隊迎擊，力戰四時許，至午初賊始望塘橋退去，官兵亦鉛藥垂盡矣。昨夷人照會：「西門外上下岸民房有礙砲路，須盡拆去。」本府與華爾會議，初意立限三日，聽民自拆；及見西北賊勢近，即出城分頭舉火，煙燄漲天，但聞男啼女哭而已，見者無不歎歔淚下。予為口占五十六字以誌時事云：「駭同晴晝激風雷，無數樓臺付劫灰！賊未薄城先奪氣，軍皆出壁肅銜枚。魚殃祇為城門近，虎猛誰憐野哭哀？十萬火鴉飛繞處，令人心膽一齊摧。」¹³³

上述同治元年五月初五日詩作，乃是駐守松江城的夷兵與本府官員因太平軍逼近，於是以「有礙砲路」為由，未到與人民約定的期限即焚燬民房，作者哀憐西門附近人民受到池魚之殃，藉詩發其悲

¹³⁰ 姚濟：《小滄桑記》，頁 532。

¹³¹ 姚濟：《小滄桑記》，頁 532。

¹³² 姚濟：《小滄桑記》，頁 462-463。

¹³³ 姚濟：《小滄桑記》，頁 499。

憫傷時之心緒。文學詩歌就如禮俗一般，對存在於集體意識與日常生活之間的縫隙，可以透過集體記憶的儀式運作與吟詠來紀念緬懷，並填滿解消的。¹³⁴《小滄桑記》充滿祭祀活動、家中事件、民生物價等內容，正是面臨這一段歷史的人試圖彌縫歷史性的以及個人生命歷程的（autobiographical）不同記憶類型，《小滄桑記》不僅因牽涉眾多事件，且富含個人的思想觀照，感情痕跡，使歷史書寫蘊含自覺意識而且具有歷史厚度。

此外，陳才芳《思痛錄》更指出除了物價問題在於人謀不彰，更引發了人性的貪虐與兇殘：

城內糧食既絕，百姓無以療飢，凡木耳、海帶、牛膠以及藥店中之元參、兔絲等物，無不搜食淨盡，每斤俱賣白金四五兩、六七兩不等。甚至鞋底皮掌俱割食無疑，草根樹皮皆絕，於是資人肉為食，始割已死之人，後並不待死而即割之，殘骸遍地，慘絕人煙。陳鎮初猶禁止，見割食人肉者即殺之，梟首以示。至明日，則所殺之人已被割取無遺，所梟之首以破其腦。飢餓所迫，雖極刑亦不能禁止也。盧勇更肆擾害。凡民間草根樹皮之能食者亦被搜去，並非自食，排列市中，仍賣與百姓。陳鎮恨極，帶領親兵，將市中賣物之勇盡行擒殺，並將所售之錢物分散百姓，並令飢民割食其肉，須臾而盡。復不時帶兵至街市巡察，於是盧勇之凶焰稍斂。周每日派兵至百姓家搜銀，復懸賞格令舉發百姓之有窖藏者，若掘得百金，分賞舉發者二十兩。後並不待舉發，率勇役沿門搜掘。芳家並無藏金，亦被掘地數尺。家內僅有衣箱六只，每日被勇役搜檢數過，俱係粗布衣服，渠又不要。剛收拾整齊，復被他勇扯亂，於是堆置地上，聽其檢視，不復能顧也。百姓痛恨已極，知萬無生理，朝夕呼號神天，願賊匪早破郡城，以免官勇荼毒百姓。以城內數十萬生靈俱死於周手，遂名為『周判官』。¹³⁵

正如疾病是表述一種對於現存的生存狀態和生存維度（它的「健康」和「正常」）的否定，饑餓恰是對生存的強烈渴求與肯定。疾病對於身體和世界的反證只是一種前奏，供養生命所需的食物是另一個更現實的戰場主調，《思痛錄》搶食人肉，卻無法以法令禁止的敘述，是生命和世界形態更徹底的「變容」（transfigure）。就如龔又村《自怡日記》中經歷喪子、喪女之慟，而又面臨家中成員紛紛因瘟疫而病倒之時，開始對其姪子產生羨慕，如其云：「況吾自避難以來，了無生色，一腔慙直，於俗不諧。欲覓蠅鬚之館，迄少機緣，覺無才足庇妻子。惟羨大侄之暗中排難，醫不忘酬，親友皆感，到處種緣，事畜無虧，點金有術，遠勝吾父子矣。」¹³⁶一名父親面對世變卻手足無措，無能保護家人的痛苦，以及面對其他於此亂而猶能獨立者的欽羨。當疾病與饑餓把世界的殘忍與功利內化、強化為難以排遣的身體感受與價值理念時，這種失序的沈重感是世變之際最沈痛最具體的黑暗。

三、不問蒼生問鬼神

然而，疾病與饑餓一方面也可以說是對身體的還原與生命感知的喚醒，匱缺與失喪，意味著世界的還原，在這個世界的還原過程中，肉體外的視野可能也因而得到救治，就這個意義上來看，人們的

¹³⁴ 阿伯瓦克（Maurice Halbwachs）針對涂爾幹在理論的問題，提出存在集體興奮與力行生活之間的顯著間隙，事實上是可以被集體記憶的運作來填滿解消的；在原本可能會使人感到沉悶的每日例行生活中，集體記憶用著林林總總的生活裡俗與對歷史英雄人物的紀念儀式，用著吟遊與史詩式的文學詩歌，來紀念緬懷，而使得團體成員的記憶再鮮活起來。柯塞（Lewis A Coser）著，邱澎生譯：〈阿伯瓦克與集體記憶〉，《當代》第 91 期，1993 年 11 月，頁 30。

¹³⁵ 陳才芳：《思痛錄（選錄）》，頁 439。

¹³⁶ 龔又村：《自怡日記》，《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 6 冊，頁 74。

受苦是生產性的，受苦的人可能更有機會接近自己的靈魂，使視線投向肉體外的視野，一種近乎「異象」的視野。

胡曉真在其〈離亂杭州——戰爭記憶與杭州記事文學〉中提及趙烈文在〈庚申避亂實錄〉中，認為自己見到各種天象的預示，而且其意義完全昭顯，不需要猜測，戰爭中的喪亂傷亡僅是這些預言的實現，異象的記錄以及與戰亂的對應昭然若揭。¹³⁷誠然，異象的記錄有時如趙烈文所言「只是這些想像之詞的註腳」，但是人們在面對這樣巨大動亂時，仍不斷尋求更多元或是更大的解釋，而這些解釋所留下來的稗聞野史、街談巷說，即使表面看似鎮痛模式，但是它們仍為更大意義上民族心靈的映現。

（一）觀異象

在記錄太平天國眾多資料當中，有許多異象的記載，隨著災難的感受，開啓了「辨識」的過程，而這些過程也啓動了不同面向的解釋。如龔又村，在太平天國領有常熟時，以教書為生，他在《自怡日記》中記錄了天象徵兆：

（咸豐十一年五月）廿六夕，見長星自西北指東南，光焰萬丈，或言是機槍，指兵亂；或言是彗星，指掃平賊寇。蓋既亂之地，天不必示變，此星想主除舊更新，但至夜半漸指正南，星在紫薇，越旬光滅，未識兆何？¹³⁸

次日，觀《博物志》，有云：「地動臣叛，川竭神去。」邇來吳地屢震，南河成陸，早有亂徵，古人之言非誕也。¹³⁹

此外，半窩居士在游幕廣西時也觀察到天象、物種的變異：

廣西將亂之時，桂林城內空墮一火球，先焚巡撫旗竿，烈焰縱橫，官廨盡毀。柳州提督旗竿亦被怪風吹折，並將右江道轅門照牆吹倒提督右江道同駐柳州郡城。是日天無片雲，赤日當空，而狂飈忽發，飛沙走石，半日方止，人皆訝為不詳。次年柳州郡城及所屬各邑皆失守矣。慶遠府城外，猛虎橫行，常至演武場爭鬥。潯州所產果豆皆如人面。興安縣山中桐茶諸樹，新發枝條如刀槍矛戟之形。各郡縣城中，常有怪禽飛入，悲鳴不止，驅去復來。種種異兆，予皆目睹也。¹⁴⁰

倦圃野老在《庚癸紀略》更詳細記載地震、蟲害等現象：

（咸豐十一年七月）庚申年（指十年），江浙失陷幾及全省，蘇松常杭嘉湖最為賊藪。憶自丙丁戊己之間，天地示變，彗星見於東南方，白紅竟天，地震城愁，不可殫述。七八月間莎雞來，又有蘆蟲蔽天而過，月夜望之如飛灰揚塵，俱自西而東。鄉民或裝入窠中至縣報災，其實並非蝗蝻之類，不食苗，來則主兵，史冊載之。又地生毛，余曾見直豎一根於土上，長吋餘，色白，

¹³⁷ 胡曉真：〈離亂杭州——戰爭記憶與杭州記事文學〉，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主辦「明清文學文化中的秩序與失序」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年8月28-29），頁22-23。

¹³⁸ 龔又村：《自怡日記》，頁68。

¹³⁹ 龔又村：《自怡日記》，頁82。

¹⁴⁰ 半窩居士：《粵寇起事紀實》，《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4冊，頁7。

各處有之。俗稱賊為長毛，賊亦自稱之，至是乃驗。此古所未聞也。¹⁴¹

這幾則記錄當中，對於天象、地震、蟲災等現象的敘述，都夾雜在辨識的意圖當中，並希望透過史冊、古人之言等歷史經驗予以詮釋或驗證。

此外，沈梓在《避寇日記》則記錄了同治二年多次天文異象，如彗星、流星，這一年亦爆發了大規模的疫疾。作者將天文與水文的異象視為此次動亂的徵兆，隱含命定論的意味：

今年七月望都中星隕如雨，皆向東南而飛，二十三日彗星復現，直犯帝座。各省干戈蜂起，……由是言之，天變人事，在在可虞，天下殆無完土矣。¹⁴²

七月廿六、七，有彗星起於紫薇桓端門，光隱隱，衝箕星、女星之間，以漸而西。初四夜已出端門二尺許。¹⁴³

初四夜，有白鬣自西北亘東南，隕星五。¹⁴⁴

初十日，聞王店施王廟有蛇妖，廟為長毛所毀。時天寒，至蟄伏蛇就香爐香氣，故蟠其上不去，好事者皆言惑眾，謂是施王降靈，於是遠近燒香如是。¹⁴⁵

二月間，東岳廟皂班金輦子言吾鎮有大火災之說，既而果然。……於是鎮人皆懼，斂錢延羽士禳災，……長毛亦往燒香。¹⁴⁶

凡鹹水之港，水作紅色，或汲入桶中，至暗室中以手擊之則爆出火星，細細如毛，由以鐵擊石而出火之象也。余初聞不信，既而眾口一辭，有杭人戴醇士甥陸姓者，年六十許，自言親試其事，始知其不妄也。……今水鹹如此，行將及我，至其作紅色出火星，則水妖也，災禍之臻，機先兆矣。¹⁴⁷

有關天地異象以及靈異怪奇見文的紀錄散見於各書之中，不論是屬於較為正式的史傳、史稿體裁，抑或是較為屬於個人的日記體裁都有所紀錄，從其紀錄資料看來，大致可以發現與這類記載所伴隨者，通常是撰者面對世變所引起的諸多「猜測」與「假設」，例如關於彗星的記載，當彗星出現之時，撰者通常認為它是兵亂的象徵。

《庚癸紀略》與《自怡日記》都有關於咸豐十一年見到彗星的紀錄，前者以為彗星乃「天地示變」，後者卻又認為「天不必示變」，兩者雖有所矛盾卻同時指出彗星與兵亂的連結，然而這時太平軍實際上應已攻略江浙，亦即彗星並非預言兵亂之產生，而是應驗兵亂之已然結果，從這類記載中我們大致可以瞭解到撰者在面對亂世之時，他們對於自然界的變化特別敏銳，並在諸多「猜測」與「假設」的過

¹⁴¹ 倦圃野老：《庚癸紀略》，《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5冊，頁318。

¹⁴² 沈梓：《避寇日記》卷三，頁155-56。

¹⁴³ 沈梓：《避寇日記》卷三，頁176。

¹⁴⁴ 沈梓：《避寇日記》卷四，頁182。

¹⁴⁵ 沈梓：《避寇日記》卷四，頁185。

¹⁴⁶ 沈梓：《避寇日記》卷四，頁190-191

¹⁴⁷ 沈梓：《避寇日記》卷四，頁217

程中引向對「世變」的辨識。

（二）卜劫難

太平天國歷史書寫中關於靈異怪奇見聞的紀錄亦甚多，然而這類紀錄主要都與戰爭有關，面對生命的無常，作者向超驗的力量尋求解釋與解答。如在動亂中失去家人音訊，往往藉助占卜或是廟宇求籤卜問吉凶；有時作者亦記錄降鸞與顯聖傳聞，此舉顯示作者與百姓俱不知亂世何時結束，因此對於神明於亂世平息的預言格外的重視，亦可顯見他們對於和平的渴望。如《鯁聞日記》敘述太平天國克復常熟後逃避時的見聞：

……浙江三天竺觀音極為靈感，默祐世人。凡杭之大小官員，俱奉例朔望進香。斯時天降災殃，民遭劫數，即佛慈亦難曲庇。聞賊眾欲焚上天竺廟，未躋半山，便見弘光覆嶺，香飄撲鼻，賊眾皆眩暈不能前步，驚悸而返。¹⁴⁸

貴州貴築縣人黃輔辰，在咸豐初年擔任清政府吏部郎，咸豐二年任知府，三年分發山西，即回原籍辦團練，對抗太平天國。《載經堂日抄》是於咸豐三年由北京回貴州，沿途所見所聞的記錄。當中記載：

日夕，沁吾（羅姓）來寓，談逆賊事：「賊慣焚燒廟宇，至烏江，燒項王廟，旋燒旋滅。賊駭，禮於神，乞籤，得數語云：『本是青山一小猴，五湖四海任遨遊，有朝卻遇青山倒，但見青山不見猴。』賊悚然，竟不敢毀。」¹⁴⁹

十五日，主人借余過零宿廟土穀神祠，余卡筮，問六弟吉凶，得「三友勝同胞，桃園結義高，不聽諸葛計，誰與捉姦曹」智語。又卜二妹吉凶云：「黑夜又無燈，陰風鬼弄魂，鄉村無路去，只恐見閻君。」余見之惘然，以是之湖城必失，而二妹大都死亡也。¹⁵⁰

葉蒸雲《辛壬寇紀》甚至是詢問灶君戰局：

（同治元年）四月三日呂賊至。予夜祈籤於灶君，問何時得免驚擾，詩云：「運蹇時乖屢咄嗟，尚期安守秘英華，一朝撥霧天重睹，孤木逢春自見花。」初十夜復卜賊去留，詩云：「魚性躍，鳶性飛，不躍不飛，恐蹈危機。」我知賊不能憑城拒守矣。次日果遁。¹⁵¹

沈梓在《避寇日記》也記錄了顯聖與一段「鸞語」：

初二傳言關帝顯聖，是日東岳大帝抬至翔雲觀聖帝殿，有廟役金聾子者，執香積首，顙皆起青紫塊。次日關帝亦抬至翔雲觀，香煙甚盛。初四、五日，有傳關帝廟周將軍之刀捏上一段，信者紛紛。余曰：「此神道設教，以鼓舞團勇及鄉人防禦之心，故不可無也。」初六、七日，四處貼條子，云觀音菩薩顯聖，令今後呼長毛為瘟毛。蓋呼長毛則彼之勢日以長大，呼瘟毛則彼將

¹⁴⁸ 湯氏輯：《鯁聞日記》，《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6冊，頁293。

¹⁴⁹ 黃輔辰：《載經堂日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6冊，頁181。

¹⁵⁰ 沈梓：《避寇日記》卷三，頁125-126。

¹⁵¹ 葉蒸雲：《辛壬寇紀》，《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5冊，頁380。

困於瘟疫以死。於是鎮人皆群呼瘟毛。¹⁵²

又聞杭州開鸞，系帝濟顛降壇，鸞語「呵呵呵，秋水到，長毛滅」之說。¹⁵³

除了觀音作為「神道設教」，以鼓舞人心之外，舉凡項王廟、土穀祠也都是人民尋索解釋的處所。

在諸多神明譜系中，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就是標舉「忠魂」¹⁵⁴，關帝崇拜是做為軍事行動合理化的理想資源，如王彝壽：《越難志·瑣綴》與《庚申（甲）避難日記》都記錄關帝事蹟：

人傳賊未竄之前二日，夜漏三下，周文嘉憑几假寐，忽聞喊殺聲大震，城岌岌然動。驚起，跨馬出，見城中紅光燭天，兵馬皆在半空中，旗上大書「關」字。文嘉知關帝顯靈，天數不可回，去志遂決。¹⁵⁵

關聖帝君降乩，詩曰：「天降災殃殺不仁，不仁人殺不仁人。不仁人殺何時了？自有仁人殺不仁。」¹⁵⁶

關帝與觀音，一者扮演懲罰太平軍之角色，一則為拯救黎民百姓之角色，恰與其在民間信仰中之形象相符合，但是在一般人民面對亂世而尋求宗教庇佑的同時，仍不乏由追尋答案，到教化勸懲的文化復歸。

（三）誅除妖魔與自神其教

太平天國運動初期，太平軍領袖將清政府妖魔化，醜化滿族的先祖：「細查滿韃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產妖人，種類日滋，自相配和，並無人倫風化」¹⁵⁷，並攻擊清軍將領的道德與生活作風。然而定都後太平軍領導人也同樣腐化，天京事變後，更暴露太平軍內部的問題，洪秀全因而欲重新構建一個由姻親和神性血統組成的核心。¹⁵⁸沈懋良《江南春夢庵》中天京城破前鬼影幢幢的想像描述¹⁵⁹，一方面也反映了民眾對太平軍的認識與恐懼心態。

太平軍稱官兵為妖，其核心價值之一即標舉「上帝教」，聲稱要破除偶像，然而這一個部分正觸動

¹⁵² 沈梓：《避寇日記》卷一，頁 11。

¹⁵³ 沈梓：《避寇日記》卷二，頁 53。

¹⁵⁴ 王彝壽：《越難志·記敘》載：「偽坐鎮周文嘉欲羅縉紳之素著人望者為之。郡紳何公戟民維城起家孝廉，晉銜觀察，城陷後，伏居山村。文嘉知其名，貼書招之，不至，則遣其屬敦迫之。公知不能免，乃作書復文嘉，大略言：『我受國恩，義不屈節，一死而已，無他言，惟望汝曹體上天好生，少殺百姓。』又作書與父決，即入室自經死。文嘉得書流涕，下令榜其門曰：「此忠臣家，我兵有敢入者死。」愚民見而羨之，不知何公忠魂正當作風雨洗此污跡也。」《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 5 冊，頁 145。

¹⁵⁵ 王彝壽：《越難志·瑣綴》，《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 5 冊，頁 162。

¹⁵⁶ 佚名：《庚申（甲）避難日記》，《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 6 冊，頁 200。

¹⁵⁷ 《頒行詔書》，《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 1 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 162-163。

¹⁵⁸ 魏萬磊：〈太平天國敗亡的集體心理分析〉，《史學月刊》，2006 年第 10 期，頁 31。

¹⁵⁹ 「十三夜，偽宮中見無數紅衣紅面人立屋脊上作指揮之狀，各賊巢亦然，殆將咸陽一炬矣。賊黨遇崇自縊自戕者，不可勝計。福逆洪仁達巢中，見一頂帽蟒服者坐其中堂，驅之則化為無數頂帽蟒服者，三更以後，門外人聲嘈雜，絡繹徐行，作呵殿聲，鐵鏈聲，竹板聲，鑼聲，聲甚希微，間有關門窺探者，見有街燈兩盞，人影一隊，若隱若現，在十步之外，各處所見皆同，鬼怪之擾，亦漸安靜，蓋城破在即，神已先入矣。」沈懋良：《江南春夢庵筆記》，收於《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 4 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 447。

了文化的敏感神經，在執行破除偶像任務時，有些記載太平軍遭受神佛的當頭對付，如陳懋森《台州咸同寇難紀略》：

賊於炮光中，隱隱見有二神人，一紅面、一黑面，往來指揮，而炮火即隨之，於是始大懼號哭而奔。¹⁶⁰

葉蒸雲《辛壬寇紀》也曾記錄：

黃岩店頭大士廟賊入欲毀佛像，一賊發狂坐燈山上怒皆曰：「鼠輩穢污吾地，不速去，禍立至。」賊俱下拜。佛限以時日，須盡拔營去。¹⁶¹

更有趣的是王彝壽《越難志·瑣綴》記載一則幫助神像者，反遭神佛懲罰的見聞：

賊最惡神佛。越中祠廟塑像多遭毀。山陰斗門鎮有張神殿，素著靈異，平時以香燭來者踵相接也。一日，數賊棄神像於街頭，笞之百，以搜桶覆其首而去。一鄉民過，急去桶，加洗滌也。俄而賊復至，見所覆桶已去，大怒，以刀砍神首，擲之河中。鄉人歸，正與家人言賊假神狀，忽瞪目軒眉作神語，大言曰：「吾張神也，天降惡煞，吾輩皆逢運劫。今日賊以穢器覆我，方私幸或全此軀。汝過，則竟過矣，何多事，去所覆，致賊怒斫我，我之所以不能保首領者，汝之罪也。」以手自批其頰，恨怒不已。家人跪求，謂某誠多事，然究出敬愛之心，乞神宥。神凝思良久，領之，長嘆一聲。鄉民醒，而神寂然矣。¹⁶²

《越難志·瑣綴》另一則「包立身」（一作「包立森」）的妖術，也是戰爭期間撰者樂於「聽聞」的事蹟並且廣為流傳：

立身初舉義，患人少，有王某者，善為虛無恂恂之說，願為立身羅致人。遂循各村遊說，自言已成地仙，人信之，竟迎禮也。居恆與人談論，忽起立拱手或膜拜，詢之，則云有神仙菩薩空中過。又言迎來仙佛供聚包村，並言立身他日成功，位在諸侯王上。人益敬信之，隨之去人者日眾。及村破，人皆痛詆之。余謂立身守斗大一村，殺賊至數萬，不可謂非異人。如王某者，雖鼓其舌以惑人，然究為殺敵故，未可厚非也。……亂後，包村白骨積如山丘。當事建屋十三間，中為「忠義祠」，餘盡實以頭顱，以土封之。每夜鬼火萬點，從祠內飛出，散林薄間，將曉復聚，魚貫飛入，有如部伍者。¹⁶³

有關包立身與包村的事蹟被神化處理，亦見於龔又村《自怡日記》：

又云諸暨包立森有妖術，聚黨萬人，曾有白鶴飛來，爰白衣冠、紅頂布作鶴鎮，削竹刀焚灰遇匪撒之，匪皆失明暈倒，死者累累。欲訂出兵之期，請事師父，以元寶投路，私議有拾者即斬，借端起義，豈料數日無拾遺者，知道賊數猶未盡，不便動兵。¹⁶⁴

¹⁶⁰ 陳懋森：《台州咸同寇難紀略》，《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5冊，頁171。

¹⁶¹ 葉蒸雲：《辛壬寇紀》，頁379。

¹⁶² 王彝壽：《越難志·瑣綴》，頁160-161。

¹⁶³ 王彝壽：《越難志·瑣綴》，頁160、頁163。

¹⁶⁴ 龔又村：《自怡日記》，頁94。

包立身的崛起，說明一般人民希望透過信仰，乃至於特異的神格化部份人物與事蹟，以求滿足在亂世中尋求安頓的渴望。但是弔詭的是，這類記載與前述沈梓在《避寇日記》所謂的「神道設教」都為「鼓舞團勇及鄉人防禦之心，故不可無也」的認識相似，神權在軍事目的操弄下，反而逐漸褪去其神聖性與權威，如上述《越難志·瑣綴》中軟弱認命而又是非不明的神佛對自己遭受羞辱，只能自述「吾輩皆逢運劫」，連神佛都無法自救，不僅是一種荒誕，更凸顯信仰在劫難運行中之無奈與無力。太平天國「破除偶像」之舉，引發了另一種宗教文化上「權且利用」的偏執，在文化衝突的意義上，可以說是世俗理性對這一場帶有宗教意涵的內戰的回應，也是一般民眾透過文化復歸，以整合內在秩序與社會秩序的方式。葉蒸雲，在其《辛壬寇紀》檢討世變之因說：

長髮之亂，其匪類之大劫歟？就吾邑論之，為長髮所殺者曾無幾人；皆邑人自殺之耳。或從掠縣城而被殺，禍擾害本庄而見殺，死者數百，初未聞有一人言其冤者，則公論之不容久矣。人怨歸之，即天怨及之，故雖納賄強寇，地方幸全，而踴躍從賊，如蛾赴火，生還落落，則暴骨異鄉，殆將萬人。造物不啻一一選擇之，驅遣之，使群驅絕地也。信乎劫數之難逃也。吁！死於本地者如此，則死於異地者可知。吾邑之死者如此，則他邑之死者可知。洵洵好亂，孰知適自戕其生哉。鑒觀有赫，報應維昭，有損人利己之心，難以免於今之世矣！故君子以不貪為寶。

165

這一段對人心道德的呼籲，其實說明最大的戰場源於小小方寸之中。《庚申（甲）避難日記》中記載蘇文忠公降乩諭民眾脫劫良方的紀錄，撰者對此詳加紀錄，指出蘇文忠公顯靈諭示的脫劫良方，其重點在於「在倫常中接物之間，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兄言愛，與弟言恭，與朋友言信。事事可以對天，事事可以對人。凡一切欺妄心、愛慕心、奸巧心、殘刻心，俱當一切除之。」¹⁶⁶由此可知，當民眾的話語力量透過信仰形式與官方正統相互吻合與連結時，傳統儒家倫常提供一般百姓面對亂世的立場。

五、結語——在「生死飲食」與「鬼神倫常」之間游離的內部視野

綜觀太平天國的資料，大致分為專著與自述兩大部分。專著大多是以清朝角度出發撰寫，但又有幕客與清朝官員的身份、視角之差異，若為清朝官員所撰述，多半記清朝軍隊與太平軍如何彼此進攻、征戰，是以一種清朝為正統的角度出發，合理化一切剿匪行動，大力撻伐太平軍起義之事。

至於幕客的記錄，則是以一種較為持平的角度來審視『何以世變？』，大力抨擊對清朝官僚的無能，認為他們難辭其咎。而自述部分所收錄的皆是不同人於不同時期所見、所歷太平軍之事，由於撰寫者包括團練頭目、被擄入太平軍者、舉人、一般民眾等等。大抵而言，撰述者的身份是較偏向於一般百姓，所言亦皆是從自身的視角出發，採順時逐日記載的形式，內容則是結合了個人生命之變、家庭之變與國家之變。

這些資料分別出自不同身份者的觀察視角，每一個文學描述都是一個視域，他們由各自的立足點

¹⁶⁵ 葉蒸雲：《辛壬寇紀》，《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5冊，頁384。

¹⁶⁶ 佚名：《庚申（甲）避難日記》，《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六冊，頁276—277。

出發，記錄曾經看到的一切。「視域」以及「時間」影響這些撰述者對過去歷史的感知，他們選擇性地建構其記憶，由現在審視過去，賦予過去意義，可以說撰寫時的立足點便顯得分外重要。

孔復禮認為中國的衰落不應僅注意到外來勢力的侵逼，更重要的是來自帝國內部的衰頹現象，他曾就中國內部自身的發展變化來社會和思想變革的深刻歷程，並指出：就實際的國家內部情勢來看，在太平軍運動時期，地方的士紳階層顯然成爲了清廷政府，以及太平天國兩方都企圖爭取的勢力。¹⁶⁷

此外，孔復禮指出帝國晚期面臨政治前途的關鍵點上，確實建立了團勇的訓練制度，而值得注意的是「勇」當中最主要的類型實際上是由無軍職的士紳所招募的，而這種「適應名流內部原先存在的歸屬體系軍事化趨勢，是傳統社會經受住十九世紀中葉危機的能力的關鍵因素。」其目的在指出「地方士紳是如何看待他們的各種村社和地區的責任的。」實際上在江忠源對抗地方小型叛亂乃至投身反對太平天國運動，其「考慮問題顯然主要是從本地出發，即先考慮他自己的縣，再擴大到他家鄉所在的省，在這以後才關注整個帝國的事務。」這說明了在整個帝國晚期面對地方叛亂或者諸如太平天國運動大型舉事的時候，地方士紳依然維持著傳統儒家精神的態度，地方士紳首要關心的乃是自己家鄉的安危，而非整個帝國的興衰。¹⁶⁸

太平天國運動由本地、家鄉到國家順序這一「內部觀點」的提出，引發我們再往內部深掘的視角。當戰場小聚焦到日常生活，並具體的落在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生死呼吸的瞬間，它們累積的情感思想，匯聚爲時代總重量的歷史書寫，或者可以理解爲神啓權威與世俗理性的遭逢，¹⁶⁹然而，在這一歷史性相遇，表面上二者之間似乎並未帶來實質性的對話，因爲疾病、瘟疫、飢荒，接踵而來的社會危機使人間烏托邦的理想，及人類自我道德約束力幻滅，卻同時又召喚著受苦心靈對文化的新認識和詮釋，或至少是對文化的再確認。

刻錄滄桑與召喚國魂並置互存的紀錄，說明當現實中的一切事物，連同現實自我的生命、生存都成爲一種觀看的對象，而神佛遭「團練之勇」、「歛財之貪」者擬象或仿真時，軍事目的的手段，以及宗教技術化，更模糊了正統與異端的等級次序。不同於晚明遺民對故國頻頻回首的篤定眼神，太平天國運動實已深深撼動中國人心的「內部視野」。

¹⁶⁷ 對近代史的分期問題，孔復禮以爲如果我們單純認爲中國的衰落來自於西方勢利的入侵，將會抹滅掉我們對於中國自身內部的可能發展變化的認識，近代「是指歷史動向主要由中國社會和中國傳統以外的力量所控制的時代。」「衰落不再是簡單的清王朝的衰微和伴隨它的社會弊端，而是一個把中國歷史不可改變地導離它的老路，並在社會和思想的構成中引起根本變革之更爲深刻的進程。」孔復禮強調名流士紳對於維繫傳統中國的努力與影響，認爲中國朝代的循環歷史正是奠基於他們「正統的學術傳統以及他們的公務管理的倫理觀念。」從士子—士紳，到官僚—士紳的群體劃分，顯示出中國政治制度的穩定性，有其深刻的社會制度的根源，基於此點，孔復禮因而懷疑「中國歷史的『近代』時期能夠用主要的外部事件來劃界。」並且以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與捻亂說明滿清王朝所以能夠度過危機，正是由於曾國藩這類士紳所帶來的穩定力量，因此「舊秩序的衰落（不同於王朝的衰落）不會早於 1864 年。」孔復禮著；謝亮生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 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台北：時英出版社，2004 年 9 月）頁 22-29。

¹⁶⁸ 同上註頁 166-178。

¹⁶⁹ 王立誠：〈洪秀全的天命論與太平天國的政權建構〉一文檢討了洪秀全伴隨天命論而來的神啓權威，使得他在初期即形成某種宗教偏執性格，引發神啓權威與世俗理性的悖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 年第 1 期，頁 60-64。

參考與徵引書目

一、太平天國史料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 ◆《頒行詔書》，《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1冊。
- ◆姚濟：《小滄桑記》，《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6冊。
- ◆沈懋良：《江南春夢庵筆記》，《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4冊。

羅爾綱、王慶成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 ◆陳思伯：《復生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4冊。
- ◆程畹其：《避寇紀略》，《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4冊。
- ◆半窩居士：《粵寇起事紀實》，《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4冊。
- ◆陳才芳：《思痛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4冊。
- ◆倦圃野老：《庚癸紀略》，《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5冊。
- ◆薛鳳九：《難情雜記》，收於《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5冊。
- ◆佚名：《咸同廣陵史稿》，《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5冊。
- ◆葉蒸雲：《辛壬寇紀》，《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5冊。
- ◆王彝壽：《越難志》，《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5冊。
- ◆陳懋森：《台州咸同寇難紀略》，《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5冊。
- ◆黃輔辰：《載經堂日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6冊。
- ◆湯氏輯：《鯁聞日記》，《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6冊。
- ◆龔又村：《自怡日記》，《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6冊。
- ◆佚名：《庚申（甲）避難日記》，《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6冊。
- ◆沈梓：《避寇日記》，收於《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第8冊。

吳宓：《吳宓日記》第2冊，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

二、相關研究論著

王立誠：〈洪秀全的天命論與太平天國的政權建構〉，《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頁60-64。

王汎森：〈歷史記憶與歷史：中國近世史事為例〉，《當代》第91期，1993年11月，頁40-49。

司徒琳著，王成勉譯：〈儒者的創傷——《餘生錄》的閱讀〉，《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39期（2008年6月），頁1-16。

余新忠：〈咸同之際將南瘟疫探略——兼論戰爭與瘟疫之關係〉，《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頁79-99。

李有成：〈論自傳（上）〉，《當代》（自傳與傳記專輯）第55期，1990年11月，頁20-29。

李有成：〈論自傳（下）〉，《當代》第56期，1990年12月，頁56-63。

胡曉真：〈離亂杭州——戰爭記憶與杭州記事文學〉，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主辦「明清文學文化中的秩序與失序」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年8月28-29。

郭皓政：〈一部失意的「歷史」——論《聊齋志異》的文性質與歷史品格〉，《《聊齋志異》研究》，2006年01期，頁15-26。

楊正潤：《傳記文學史綱》，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

鄒振環：《日記文獻的分類與史料價值》，《復旦史學集刊》第一輯《古代中國：傳統與變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

魏萬磊：〈太平天國敗亡的集體心理分析〉，《史學月刊》，2006年第10期，頁30-35，41。

龔勝生：〈從米價長期變化看清代兩湖農業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2期，頁80-87。
〔法〕哈布瓦赫（Halbwachs, M.）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太平天國敘事中的親歷文本——以《水窗春囈》為例的思考¹⁷⁰

The Self-experience Narrative of Tai Ping Tian Guo——Taking *Shui Chuang Chun Yi* 《水窗春囈》 as an example

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高桂惠 Kao Kuei-Hui

一、前言：重讀太平天國「史料」中的虛構

以文學角度切入太平天國的歷代書寫，可以獲得一種「重讀視野」，這種重讀目的在重新叩問這些所謂史料、野史、詩歌或小說的書寫現象。這些文本汗牛充棟，若用杜司妥也夫斯基的話來說，重讀得以讓我們「雖有全部的答案，但卻不知道問題是什麼。」目前所見的太平天國史料，在文化大革命時，就有所取舍與編修，如《鏡湖自撰年譜》原本十七萬字，就因為編纂目的的因素，刪至十一萬字。¹⁷¹這個取舍歷史文獻以服務當時政治氛圍的現象，本身就是太平天國歷史書寫值得探究的一環。太平天國的歷史面貌，隨著研究視野的變化而有多面向的轉變。這些轉變，不僅影響後人對這段歷史記憶方式的改變，也因為認知方式的改變，牽涉到社群、階級乃至國族的集體記憶；這段歷史的敘事再現、檔案內外的話語形構與詮釋上的迷思，交織成有待研究者釐清的歷史糾結。

夏春濤曾指出：在晚清「太平天國敗亡後，清方曾從宣揚『皇清武功』的角度，陸續刊行了《欽定剿平粵匪方略》、《平定粵寇紀略》、《湘軍志》等公私著述，片斷、歪曲地記述了這段歷史。除此之外，民間談論太平天國始終是一件禁事。直到 20 世紀初的辛亥革命前夕，這一禁區才被打破。」進入民國時期，「由於太平天國文獻(包括印書和文書)早已被清政府禁毀殆盡，此時國內已不易搜求，而一些文人和書賈為弋名或牟利計，向壁虛構了大量的太平天國文獻和文物，遂使剛剛起步的太平天國史研究受到很大制約。所幸的是，海外的一些圖書館仍收藏有大量的太平天國文獻。於是，國內業已失傳的許多太平天國文獻，陸續由中國學者在海外發現並傳回國內。」¹⁷²這裡點出清代被視為「事件」的史料與民國初年的「虛構」文獻與文物，前者似乎因為文本的檔案話語形構，而操演著「真實性」，後者的「虛構」則是在「史料必須真實」的價值取向下，被研究者輕忽。然而，透過「重讀」與文獻考掘，超越前者的史料性與詮釋架構終於可以逐漸現身，各種文本的出現，其實透露著不同親歷者的經驗和感知，一再說明：他們所看見的，與沒有看見的，都一樣重要。

柯文(Paul A. Cohen)對中國歷史上義和團的研究，曾以「歷史三調」的理論來檢視，說明歷史書寫在三種身份的人手中，會有截然不同的詮釋與閱讀意義；在歷史學家手中，他們運用「事件」的文體與敘事手法，進行重塑歷史的工作；在歷史「事件」當事人身上，則變成「經歷」。關於經歷的敘述，可以依敘述者的身份、階級和內容，表現為文學形式可以會因為當時政治氛圍、親歷者內在價值

¹⁷⁰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 97-2410-H-004-139-MY2 的部分成果，於日本長崎大學舉辦的「東亞漢學回顧與展望」會議發表，收於《東亞漢學回顧與展望》，長崎中國學會會刊《創刊號》，頁 234-246，2010 年 7 月 24 日。

¹⁷¹ 「年譜原本一共十七萬字，其中關於生活瑣事，吹噓自己的『政績』和封建迷信部分，經我們刪去不少，所採取約十一萬字。……本書編輯目的，原來是打算作為太平天國史料用的，因為原書所涉及的方面很多，敘述又是綜合性的，我們在整理就盡量把它的內容保存下來。中華書局建議我們把它放在『近代史料筆記叢刊』中，我們同意這一意見。但由於原來的編輯目的不同，可能有取舍不當之處，希望讀者指正。」本文署名為 1959 年 11 月 15 日。中國科學院安徽分院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序言〉，[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2。

¹⁷² 夏春濤，〈二十世紀的太平天國史研究〉，《歷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頁 162-181。

與道德允許書寫與否而導致記錄的形式多變。柯文認為親歷者與歷史學家的差別，在於「他們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來，對整個『事件』沒有全方位的了解，因而，他們對正在發生的事情的看法與事後重塑歷史的歷史學家看法根本不同。」¹⁷³

本人即曾以王韜《遯窟讕言》為考察對象指出：《遯窟讕言》中有關太平天國為主的相關敘事，乃是立足於「豔異」的書寫傳統、以弱抗暴的虛構意識、亂世中道德抉擇與出處境遇的反思，表達對太平軍亂世的直觀感受，透過「遇仙」、「遇豔」以及「遇鬼」的文化語境，再一次檢視那個岌岌可危的世界。這種置於「聊齋」仿擬語境下的太平天國書寫，一方面符合於那個時代經典確立的獨特邏輯，另一方面則期望借傳統文類與語言的文化圈慣性，提供溝通新的文本理解方式，這又是另一種以虛擬語境創作的歷史敘事。¹⁷⁴

如此看來，「現在式」的文字，以及事後回顧的視野；或者是仿擬語境中的神（鬼）話製造，正指出這一段歷史敘事叢豐富的『敘事驅策』(narrative imperative)，提供了創作者將生命中的某些感受、理解或是記憶鋪敘並尋求自我解釋的慾望與衝動。因此，每一個描述視角對後人的體悟與理解重點是「裝框」的歷程，視框分別出自不同身份者的觀察視角，他們由各自的立足點出發，記錄曾經看到的一切。「視域」以及「時間」影響這些撰述者對過去歷史的感知，作者選擇性地建構其記憶，由現在審視過去，賦予過去意義，可以說，撰寫時的立足點便顯得分外重要。本文擬從一個幕僚的視角切入太平天國年間相關的敘事，考察作者如何從親身的經歷去表達幽微的感知與隱含的批評，在歷史人物尚未完全定論之前，面對瞬息萬變的兵燹，以及詭譎多變的官場，清軍內部的視野，毋寧也是一種理解太平天國的方式。

二、《水窗春曉》的親歷筆法和歷史「真實」的弔詭

《水窗春曉》作者為歐陽兆熊，道光十七年中舉，曾任湖南新甯縣教官。上下兩卷，共約一百條，內容記述清代中葉道光、咸豐、同治各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風尚等情況，及統治階級內部各色人物的言語行動，大都是有關中國近代史的資料。上卷是湖南湘潭人歐陽兆熊撰，內容關於湖南者為多；下卷是浙江嘉善人金安清撰，所涉範圍較廣，以談論江淮河工、鹽務者為要。本書所記湘軍首領曾國藩、左宗棠、江忠源、羅澤南等事跡較多，其評論曾國藩尤為中肯。¹⁷⁵

三、幕僚的視角與言說——細述曾文正公瑣事

辛酉，¹⁷⁶祁門軍中，賊氛日逼，勢危甚，時李肅毅已回江西寓所，幕府僅一程尚齋，奄奄無氣，時對予曰：「死在一堆如何？」眾委員亦將行李置舟中，為逃避計。文正一日忽傳令曰：「賊勢如此，有欲暫歸者，支給三月薪水，事平仍來營，吾不介意。」眾聞之，感且愧，人心遂固。

後在東流，欲保一蘇撫而難其人，予謂李廣才氣無雙，堪勝此任。文正嘆曰：「此君難與共患難耳！」

¹⁷³ 柯文 (Paul A. Cohen)，杜繼東譯，《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頁 1-6。

¹⁷⁴ 高桂惠〈太平天國的剪影——以王韜·《遯窟讕言》為主的討論〉，「玄奘大學第一屆東方人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玄奘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中心，2009.06。

¹⁷⁵ 謝興堯，〈《水窗春曉》說明〉，《水窗春曉》(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1。

¹⁷⁶ 咸豐 11 年，1861 年。

蓋猶不免芥蒂於其中也。卒之幕中人(在)無出肅毅右者，用其朝氣，竟剋蘇城。迨至擒匪肅清，淮勇之名，遂與湘勇相埒。而文正處功名之際，志存退讓，自以年力就衰，諸事推與肅毅，其用意殆欲作退步計耳。乃自收復金陵以後，竟不休官林下，亦不陳請補製，以文正之塵視軒冕，詎猶有所戀戀者，豈其身受殊恩，有不敢言退、不忍言退者乎？然亦非其本心矣。¹⁷⁷

在歐陽兆熊的描述中，曾國藩既非被當時清政府神化的中興名臣，也非後來清末民初一些排滿文章與小說當中的庸儒模樣；他一方面處於瞬息萬變的兵燹，另一方面，也面對詭譎多變的官場，身處二端，卻又得心凝一處。從歐陽兆熊的描述，可以看出曾國藩身為凡人的實相：他會被七情六欲所蔽、被利害關係所障、被機變權謀所害。一如所有的凡人，歐陽兆熊略帶距離的批判之筆，照見曾國藩亦步亦趨、小心翼翼地推敲自己人生的每一步。這樣近距離的側寫左右中國近代的歷史人物，我們會發覺這個人物的心靈史——他的個性牽動他的命運，而他的命運牽動了整個國家——一種大歷史與個人內心想法、行為動機互相交織，成為歷史之偶然與必然的雙螺旋絞合之索。

第一段可見歐陽兆熊觀察曾國藩領導統御之術，與在人心離合之際，如何以退為進。以下對李肅毅功高震主，都是在談曾國藩「以退為進」的權謀與心計。如果我們暫時擺脫一種我們這時代所給予我們特殊距離與位置，我們可以暫時避免一種很容易落入的視角，即是毫不保留地接受歐陽兆熊的批判，以為我們掌握了曾國藩人性的幽微，那麼，這對於我們理解個人與歷史之間的複雜互動，沒有太大的幫助。曾國藩的機巧與慎重在其識人名篇《冰鑒》，已經有很多披露，這種著作與見解，其實都是把歷史作為一面鏡子與資源，欲讓現今的讀者得以從中汲取些什麼，而在「未來」中得益。而我們所要在歐陽兆熊筆下所汲取的什麼，並非要於未來中得益，而是撿拾一些可資破解的「歷史神話化」的線索，敘事主體那股「變造歷史，為今所用」的慾望，其所採用的話語，以及達成此目的所繫的技巧。

四、曾國藩與屬下鬥智——從「設櫃求言」談起

文正在徽，置一櫃，凡言地方利弊，悉投其中，不必列名。於是告訐之風大起。人患之，求於老訟師，老訟師曰：「不出三日，必令停止。」眾疑之，及第二日，果撤回。蓋訟師日寫數十無名之稟，皆痛詈文正者，文正不能不閱，又無可查究，此令遂停。訟師之心，可謂巧矣。¹⁷⁸

在這一篇文章當中，我們可以忖度出一個合理的懷疑，就是曾國藩設櫃的首要目的，應該不是想察明地方利弊，而是以告密作為一種監控下屬的方式。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遂有無名的老訟師——無名，於是可為天下訟師之象徵，而「老」暗指智慧與熟於世故。這描述出一種上下鬥智，而在老訟師的機巧下消彌於無形，既沒公開也沒有形成對峙壓力。這一則在前一則「祁門移營」，後一則「左相¹⁷⁹年少事」之間，不像前後二則，有較明確時間、人物、地點，只有地點是可供徵考的線索。歐陽兆熊在歷史實錄筆記中，立此一則如此簡短，如《世說新語》志人軼事的敘事風格，靠著必然遲到的「追憶」之筆，證成這一則造成歷史人物崇高形象產生裂隙的八卦。

歐陽兆熊在〈李金暘〉一則，¹⁸⁰記述曾國藩處事「非恒情所能窺測」的一面。李金暘，年未三十，

¹⁷⁷ [清]歐陽兆熊，《水窗春曉》（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2。

¹⁷⁸ [清]歐陽兆熊，《水窗春曉》（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3。

¹⁷⁹ 這裡是指左宗棠。

¹⁸⁰ 李金暘，年未三十，勇悍絕倫，羣以為跋扈將軍，綽號沖天礮。積功保至副將，賞勇號統兵，在江西戰敗，被陷賊中，旋又逃歸。營官張光照，在毓撫軍處控其通賊，遂將二人並解至東流大營。文正力辯其冤，謂張光照誣告統領上司，先行正法。是日，李來謁，盛稱中堂明見萬里，感激至於泣下。不料旋又傳令：李金暘雖非

是一位悍將，在江西戰敗，身陷賊營，後來又自己逃了回來，被下屬張光照指控通敵。曾國藩聞訊為李金暘力辯其誣，反控張光照誣告上司，先行正法。李金暘獲此重生，當然「盛稱中堂明見萬里，感激至於泣下。」¹⁸¹但後來馬上令「聞者無不駭怪」的，是曾國藩「旋又傳令：李金暘雖非通賊，既打敗仗，亦有應得之罪，着以軍法從事。」¹⁸²幸好，執行處斬的營哨官曹仁美與李金暘有舊，「憐其無辜罹法，故令行刑者身首不殊，屍諸江干，覆以蘆席，親兵十人守之。」¹⁸³而歐陽兆熊遣僕往觀，「聞呻吟之聲，方知未絕。傍晚即揚帆而去，不知所之。」¹⁸⁴這件反覆處置的案件，歐陽兆熊後來詢問曾國藩箇中緣由，曾國藩回答：「左季高、趙玉班俱稱其材可大用，若不能用，不如除之。且江西紛紛言其通賊，吾既違衆而戮張矣，亦何能不稍順人心乎？」¹⁸⁵曾國藩所言，一是從人力資源的角度看，二是從他個人領導力的人心向背看，這事件的曲折在於曾國藩為什麼要先為李力辯其誣？甚至不惜殺了張光照來堵悠悠之口？而派人處理李金暘時，何人不派，卻派「親兵」曹仁美主持此事，使得李金暘的「全屍」有「揚帆而去」的空間。在征討太平天國期間，往返二者的雙面諜頗多，著名的即有王韜的「黃畹案」，¹⁸⁶在那個敵我難明的動亂裡，軍中通敵的謠言比通敵的事實有殺傷力，曾國藩惜李之將才，然眾疑通匪，怕犯眾怒，故明斬之而息眾怨，遣親兵而暗續其命。在輿論上，曾國藩或可得到「賞罰分明」的讚譽，也止住官將通敵的謠言；在背地裡，曾國藩或許藉曹仁美留個轉圜空間而存恤李命，可說是個雙全之計。

這則對曾國藩的褒貶一如其敘述，明裡暗裡，迂回曲折，最後作者附上一筆「曹後隨郭子美征捻湖北陣亡，又已數載，故敢筆之以廣異聞。」¹⁸⁷意思是這個事實之所敢披露出來，是因為真正幫李金暘詐死逃亡的執行者已經陣亡了，所以此罪已無可追究，同時，也用這種筆法說明其記述的真實可徵。耐人尋味的是，作者將此則書寫歸之於「異聞」；新文化史家戴維斯曾於《馬丹·蓋赫返鄉記》指出歷史書寫中虛構的各種可能性，¹⁸⁸再現歷史的書寫必然使用某種程度的隱喻、敘事，在中國則是無可避

通賊，既打敗仗，亦有應得之罪，着以軍法從事。即派親兵營哨官曹仁美綁至東門外處斬，聞者無不駭怪。李本以符水治病，最著靈驗，曹受其法，有師弟之誼，又憐其無辜罹法，故令行刑者身首不殊，屍諸江干，覆以蘆席，親兵十人守之。適予小廝往觀，聞呻吟之聲，方知未絕。傍晚即揚帆而去，不知所之。

後聞其削髮入空門，號為更生和尚，姬妾三人，亦均為比丘尼，斯亦奇矣。

予嘗從容問李金暘何以事白而見殺？文正曰：「左季高、趙玉班俱稱其材可大用，若不能用，不如除之。且江西紛紛言其通賊，吾既違衆而戮張矣，亦何能不稍順人心乎？」文正此等舉動，真有非恒情所能窺測者矣。

曹後隨郭子美征捻湖北陣亡，又已數載，故敢筆之以廣異聞。[清]歐陽兆熊，《水窗春曉》（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5-6。

¹⁸¹ [清]歐陽兆熊，《水窗春曉》（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5-6。

¹⁸² [清]歐陽兆熊，《水窗春曉》（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5-6。

¹⁸³ [清]歐陽兆熊，《水窗春曉》（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5-6。

¹⁸⁴ [清]歐陽兆熊，《水窗春曉》（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5-6。

¹⁸⁵ [清]歐陽兆熊，《水窗春曉》（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5-6。

¹⁸⁶ 王韜有一封署名「黃畹」致太平天國蘇福省劉肇鈞，請其轉呈給李秀成的信，信中力陳太平軍若要取得勝利，在外交上贏得西方人支持與取得上海之戰略位置的重要。後來這封信因為太平軍敗北而被查獲，王韜也因此受到指控而出亡香港；先前，王韜也上書給曾國藩，但未獲重視。王韜欲從二者之間獲得最大利益，以致立場搖擺不定的情況，柯文對其內在心靈與社會文化鉅變的深層鍊結，有精到的剖析。[美]柯文(Paul A. Cohen)，《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 21-37。。熊秉純運用考證研究法，欲解決「黃畹」歷史公案，他從黃畹與王韜的署名、年譜、行文風格、筆跡、日記史料，以及「黃畹」上書前後，王韜與太平軍高層的交往，斷定上書太平軍的黃畹即是王韜本人。見熊秉純，《王韜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1979），頁 65-103。

¹⁸⁷ [清]歐陽兆熊，《水窗春曉》（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5-6。

¹⁸⁸ 馬丹·蓋赫是 16 世紀的法國南部農村人，其 14 歲時與鄰村富裕的貝彤黛結婚。由於不堪無聊的婚姻生活，偷了其父的穀物而被驅逐。在他拋家棄子數年之後，一名男子來到此鄉，自稱馬丹，並以這個身分與妻子小孩生活三年之久，並生下兩名小孩，後來因為與其叔的財產糾紛而鬧上法院，因而引起真假馬丹的爭議。最後的審判中，真正的馬丹·蓋赫返鄉，這位冒牌者方被揭穿。這案件後來被再現為接近當時的原始手稿檔案、大仲馬的小說情節、1941 年賈芮特·李維斯(Janet Lewis)的小說《馬丹·蓋赫之妻(The Wife of Martin Guerre)》、兩部當代電影，分別是法國 1981 的《馬丹·蓋赫返鄉記》(Le

免地會進入某種歷史筆記的書寫傳統裡。

歐陽兆熊是一位幕客，在道、咸、同年間，周旋在於曾國藩、左宗棠身邊，也旁記江忠源¹⁸⁹的軼事。值得注意的，這些筆記除了暗含褒貶之意外，作者少用「太史公曰」總結語氣，也少俯瞰式剪裁時間、貫串事件之作，反而多似信筆記人言行，並且參入自己與描寫對象的對話，如〈江忠烈逸事〉一則末尾：

此次水災退後，晚收尚有幾分，公一概免徵，不貪羨餘之利。謂予曰：「江浙州縣辦漕，不外『欺善怕惡』四大字耳。」¹⁹⁰

晚清漕利常是州縣需要多少錢而徵定多少額度，並且再謊報災荒減免額度，其間的差額，各級官吏可以中飽私囊。江忠源苦民所苦，免除人民重稅，並以「欺善怕惡」一語，道破貪官污吏對良民狂徵暴斂，對惡匪卻只抓拿首領，甚至完全不聞問的鴛鴦心態。（參看悟遲老人的記載）正是作者這種「曾介入歷史現場」的追憶口吻，塑造了敘事的可信度。

五、左宗棠與曾國藩之間的齟齬

在〈李楚材〉中，描述李為太平軍投誠的勇將，但是曾國藩疑其二心，故不重用。作者對此，再次現身說法：

予謂此人有絕技三：一走及奔馬；一入水不濡，可歷數時；一黑夜有光。試之皆驗。文正終不肯再用。渠¹⁹¹欲求薦至浙營，予謂不須作函，但云由曾營過棄而不用，故此投效，必當收錄。恪靖¹⁹²果即令統四營，頗立戰功，惜炮子斷其左臂，已成廢人矣。¹⁹³

為何不需要推薦函，而只要說曾國藩棄用過李楚材，左宗棠就會見用呢？此條末尾附記云：「恪靖嘗謂文正無知人之明，故文正所棄者，無不重用也。」¹⁹⁴可見

Retour de Marin Guerre)與美國好萊塢 1993《男兒本色》(Sommersby)。戴維斯擔任了前者電影製作的歷史顧問，這個經歷啓發了她。她在本書前言中說：「吊詭的是，我愈玩味這部電影，超越它的念頭便愈被挑起。這驅使得我更進一步探究這樁案件，也即用歷史學的方式來理解它。為演員而非讀者所做的書寫，提出了若干新的問題，也即有關 16 世紀人們的動機——有關，比方說，他們對真相是否跟對財產一樣關心。觀看傑哈德·巴狄厄揣摩冒牌的馬丹·蓋赫這一角色，促使我以新的方式思考原來的冒牌者阿爾諾·居·遜爾 (Arnaud du Tilh) 的才藝。我覺得，我有我自己的歷史實驗室，其所產生的不是證據，而是歷史學的可能性。」Natalie Zemon Davis,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viii.

¹⁸⁹江忠源(1812-1854) 晚清湘軍初期統帥。字常孺，號岷樵。湖南新寧人。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舉人。1844年，在籍辦團練，灌輸忠孝禮義，教兵法技勇。1847年，率團丁配合清軍鎮壓雷再浩會黨起義，升署浙江秀水知縣。1851年(清咸豐元年)7月，以太平天國金田起義，奉命赴欽差大臣賽尚阿廣西軍營。旋在籍募勇 500 赴桂，號「楚勇」，為湘軍之雛形。1853年 12 月率部入守廬州(今合肥)，陷入太平軍的重圍。因兵單糧乏，援兵不至，廬州城於 1854 年 1 月 14 日被太平軍攻破，投水自殺。被清廷追贈總督，諡忠烈。有《江忠烈公遺集》傳世。

¹⁹⁰ [清]歐陽兆熊，《水窗春曉》(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10。

¹⁹¹ 唐訓方(1809~1876) 字義渠，清湖南常寧縣(今常寧市)湖塘人。道光二十年(1840)中舉，四次赴京會試，均落第。咸豐三年(1853)大挑得二等，候補教諭。咸豐四年，曾國藩令他以教諭隨徵。咸豐五年，隨羅澤南鎮壓太平軍，因功得知府銜。咸豐十年解軍事，赴糧道任。隨後升按察使，再擢湖北布政使。同治元年(1862)授安徽巡撫，後被曾格林沁親王彈劾降職。同治七年乞假歸故里。著有《俚語徵實》、《從徵圖記》，有《唐中丞遺集》傳世。

¹⁹² 左宗棠。

¹⁹³ [清]歐陽兆熊，《水窗春曉》(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6。

¹⁹⁴ [清]歐陽兆熊，《水窗春曉》(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7。

歐陽兆熊善用時人言語、行事，描繪曾、左之間的齟齬。緊接此語後，是〈曾文正公與左相氣度〉，看似信筆所記，但條目之間，其實頗有關連。他以一事對兩人氣度作了總評：

在文正用兵主持重，除霆營外如徽防朱唐兩大營。恪靖皆不以爲然。

一日來咨，極詆文正用人之謬，詞旨亢厲，令人難堪。文正覆之云：「昔富將軍¹⁹⁵咨唐義渠中丞云：貴部院實屬調度乖方之至。貴部堂博學多師，不僅取則古人，亦且效法時賢，其於富將軍可謂深造有得，後先輝映，實深佩服，相應咨覆云云。」恪靖好以氣陵人，文正則以詼諧出之，從此恪靖亦無一字見及矣。

恪靖與文正書函來往，每以兄弟相稱，不肯稍自謙抑。至文正薨後，乃自書晚生輓之云：「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老；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豈其悔心之萌，有不覺流露者歟！¹⁹⁶

在這樣的比較書寫之後，我們或許懷疑曾國藩是否真的識人，但在其曾左二人的比較中，的確可見曾國藩不落意氣之爭的氣度。

六、蓋棺論定，寓於褒貶的史傳筆法

中國歷史書寫有悠久的褒貶筆法，寓含超歷史的道德關懷。以下這一則對曾國藩「蓋棺論定」的看法，就有這層含意。

文正一生凡三變。書字初學柳誠懸，中年學黃山谷，晚年學李北海，而參以劉石庵，故挺健之中，愈饒嫵媚。其學問初爲翰林詞賦，既與唐鏡海太常遊，究心儒先語錄，後又爲六書之學，博覽乾嘉訓詁諸書，而不以宋人注經爲然。在京官時，以程朱爲依歸，至出而辦理團練軍務，又變而爲申韓。嘗自稱欲著《挺經》，言其剛也。¹⁹⁷

作者先從書學上談曾之三變，用書學暗喻人格由剛變柔，柔中帶剛的轉變：「挺健之中，愈饒嫵媚」，接著歐陽兆熊提出曾國藩性格轉折的分水嶺，激發出他剛柔並濟的性格。此事是他父親去世：「咸豐七年，在江西軍中丁外艱，聞訃奏報後，即奔喪回籍，朝議頗不爲然。」咸豐七年二月，他的父親病故，向朝廷奏報後不待批准，便奔回原籍。朝廷上的議論對此頗爲不滿。左宗棠那時在駱秉章幕府，「肆口詆毀，一時譁然和之」，曾氏也感到內疚，於是得了心病，「文正亦內疚於心，得不寐之疾」。歐陽遂推薦曹鏡初爲他治病，但曹「言其岐黃可醫身病，黃老可醫心病。」曹鏡初是想以黃老之道來諷諫曾國藩，希望他能按黃老的學說辦事。曾國藩由此醒悟，復出後，「一以柔道行之」，原本「言及恪靖遇事掣肘，哆口謾罵，有欲效王小二過年，永不說話之語」，想通之後，「至八年奪情再起援浙，甫到省，集『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屬恪靖爲書篆聯以見意，交歡如初，不念舊惡。」¹⁹⁸其對政敵懷柔至此，歐陽兆熊又述一段只有他和曾國藩之間知道的「記憶」：

嘗戲謂予曰：「他日有爲吾作墓誌者，銘文吾已撰：『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故

¹⁹⁵ 富明阿(?-1882) 清末將領。本姓袁，系明末名將袁崇煥的五世孫，字治安，漢軍正白旗人。原以馬甲從徵喀什噶爾，授驍騎校，升爲參領。光緒八年（1882年）卒。《清史稿》列傳二百零四有傳。

¹⁹⁶ [清]歐陽兆熊，《水窗春曉》（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7。

¹⁹⁷ [清]歐陽兆熊，《水窗春曉》（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17。

¹⁹⁸ [清]歐陽兆熊，《水窗春曉》（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17。

予挽聯中有「將汗馬勛名，問牛相業，都看作糝糠塵垢」數語，自謂道得此老心事出。蓋文正嘗言「吾學以禹墨爲體，莊老爲用」，可知其所趨向矣。¹⁹⁹

作者對曾國藩的最後論斷，援引自己投身歷史現場的親歷記憶，說明曾國藩在官宦、羈旅生涯爲何與如何一生三變。而耐人尋味的是，曾國藩也替自己蓋棺論定——他寫好了自己的墓誌銘，但卻是在一種「戲謔」語境下。這種在戲言中的實情，儘管是下意識的流露，但也正說明歷史人物處於正經正典的感知結構體下，兼又政敵環伺、兵馬倥傯，這一內外交逼的一生三變的「演出」，也只有「戲言」下，某種「實情」才得以廁身其中。這些書寫，在曾國藩「公忠體國」的崇高形象背後，加入了許多歷史當下的人性，儘管曾國藩的崇高形象因此趨於凡人化，但毋寧平添更多歷史再現時的可能。²⁰⁰無獨有偶，歐陽兆熊在本書中〈左相年少事〉記左宗棠的一段軼事，很能歷史人物的日常生活中的側面，析照出這些人物私底下對歷史——尤其是非正經正典之史——某種將歷史編輯化用成「皆我註解」的態度。這則云：

左恪靖小予五歲，其中鄉榜却先予四科。戊戌計偕北上，遇於漢口，即結伴同行……是日，各寄家信，見其與筠心夫人書云：「舟中遇盜，談笑却之。」因問其僕：「何處遇盜？」曰：「非盜也，夢囈耳。前夜有誤牽其被者，即大呼捉賊，鄰舟皆爲驚起，故至今猶聲嘶也。」予嗤之曰：「爾閨閣中亦欲大言欺人耶？」恪靖正色曰：「爾何知鉅鹿、昆陽之戰，亦只班、馬敘次得栩栩欲活耳。天下事何不可作如是觀！」相與大笑而罷。²⁰¹

儘管左宗棠少年得志，氣勢正旺，口氣狂傲可做如是觀。但這位歷史人物的回答的確也顯示，他意識到歷史依賴某種敘事技巧而得以建構。這裡不是指左宗棠具有後現代歷史觀點，而是他聰敏察覺到若要歷史「栩栩欲活」，需要司馬遷、班固的敘事技巧，而還當玩笑話地演繹：「天下事何不可作如是觀」。儘管此言不甚嚴肅，但不可否認，歷史人物如左宗棠的這一面，在這兩人說說玩笑話的當口，場域與語境是考完試後的「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不再以廟堂的嚴肅審慎標準審查知識，他對歷史在敘事等文學技巧上是可以進行某種程度的操作的看法，下意識地流露出來。也在此觀念下，他的確誇大了他的夢話而成「舟中遇盜」的勇事。反諷的是，歐陽兆熊在這裡語境是記此事以資趣談的。

左宗棠在笑談中把過去歷史記憶視爲是敘事技巧的展現，而歐陽把自己的這段記憶變成笑談——也就是說在中國歷史筆記中，有某種《世說新語》式的「以資談片」的傳統，這種傳統到了這文本裡，左宗棠「虛構」舟中遇盜，歐陽兆熊「實錄」左宗棠的歷史虛構觀點——雖是有場域與語境侷限的——這個反諷在於：如果內容可以虛構，那麼這個文類所宣示的「實錄」，其驗證敘述是「真實」的證據力還穩健的存在嗎？沒有因爲那個內容可以虛構的可能性而自我解構嗎？延伸來看，太平天國的歷史到了劉禹生《世戴堂雜憶》那裡，曾經是孫逸仙大力鼓吹的國民革命前身，當易代轉型之後，階段性任務完成，原本達 16 卷的鉅冊，卻變成了文獻凋零、有待蒐羅的〈太平天國佚史〉。歷史記載之散逸，某種程度上，指出這段歷史的確逸離民國創建之後繼起一代的記憶。²⁰²

¹⁹⁹ [清]歐陽兆熊，《水窗春曉》（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17。

²⁰⁰ 熊秉真於〈明清仕女天地中的母與女〉中，藉曾國藩公女曾紀芬《崇德老人自訂年譜》，收入熊秉真、余安邦合編，《情欲明清—遂欲篇》（台北：麥田出版，2004），頁 250-255。

²⁰¹ [清]歐陽兆熊，《水窗春曉》（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4。

²⁰² 劉禹生，《世戴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28。

七、結論——從事件、經歷到建構神話中的太平天國

《水窗春囈》的作者歐陽兆熊是當時清庭中流砥柱的權臣之幕僚，透過他片段、側面與私密的書寫，我們看見歷史層峰人物「不為人知」的那一面；與正史文體比較，稗官野史的形式與修辭與其披露的內容互為表裡。我們知道書寫者的立場常會影響其觀看視角與認知結構，而其融入書寫當中的敘事模式、關注與排除的書寫對象，會形成一種遺留於文本之內，而可與文本之外的時空對話的感知結構。體制形塑某種書寫形式、規範某種內容，使其操持真實權威的話語，例如檔案，仍容有虛構的空間。問題是，「真實」的概念一如對神的信仰，不容一絲懷疑，當有檔案中有所虛構，而且並非全然是人為偽造，而是文類本身的侷限，當檔案的建構性被揭露，「真實」所賴以昂揚獨立的基礎也就危疑不定了。²⁰³ 何大安基於此種質疑蘊含歷史文獻文字底下的建構「真實」假象之陰謀，利用語言學的角度，指出案體（公案、醫案、學案等）的文類發展與其篇章結構中，包含敘事與評議二維，而這他認為是民間從史傳文類偷渡而來的，一方面這是文類的知識下放與權威轉移，但同時，這也使得官方史書的話語形構成爲民間效仿的來源和標準——它成了合理化的範式。²⁰⁴

在志人史傳的文本傳統要求下，歐陽兆熊蒐集、編纂曾國藩與左宗棠的許多軼事，這些軼事對正經正典的歷史人物「記載」反成了月旦臧否的插針之處，透過此，我們得以看見官方歷史大敘述之下的裂隙，這裂隙使得「真實」產生其他可能性。除此之外，對清庭與非災區的北方官民來說，曾國藩、左宗棠等可謂大清三傑，但由於歐陽兆熊持史傳的蓋棺論定寫法，對人物的褒貶躍然紙上，距離文學渲染的英雄形象，仍有一大段距離。透過幕僚之眼的近距離觀察，都轉化爲歷史現場的小人物，有許多喜怒哀樂與爭議性的話題不斷湧現。

透過以上親歷文本，我們得知不同身份與階級在這場大動亂中的的想法、感受和行爲。某種程度來說，做爲「重讀」歷史文獻的我們，同時也是擠身重塑歷史者，而這給我們什麼啓示？研究當代歷史記憶、傷痕與遺忘的專家費修珊與勞德瑞，指出卡繆面對納粹大屠殺，其「作品的風格演變與哲學價值轉換，解讀為對大屠殺極端見證危機的一種間接表達與凌遲見證，同時也是對持續不斷、懸而未解的歷史危機之見證——歷史的危機進而被轉譯成文學的危機，文學成爲面對無法發聲的歷史的唯一見證。」²⁰⁵ 上述文本，脫卸我們當代史料之眼，轉而著重其中情緒、敘事手法與文體形式差異的意涵（前者爲編年，後者類志人筆記），儘管各異其趣，豐富我們對太平天國的深層理解之外，這些立足邊緣位置的書寫，不自覺象徵了一種時代尚未消化的文化價值，對於動亂前後的文化系統來說，「他們」接下來的活動，會形成一種必然的歷史價值轉換的媒介。

²⁰³ 娜塔莉·澤蒙·戴維斯 (Natalie Zemon Davis), 〈緒論〉, 收入娜塔莉·澤蒙·戴維斯, 楊逸鴻譯, 《檔案中的虛構——十六世紀法國司法檔案中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敘述者》(Fiction in the archives 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台北: 麥田出版, 2001), 頁 32-49。

²⁰⁴ 何大安, 〈論斷符號——論「案」、「按」的語言關係及案類文體的篇章構成〉, 收入熊秉真編, 《讓證據說話【中國篇】》(台北: 麥田出版, 2001), 頁 321-335。

²⁰⁵ 費修珊 Shoshana Felman、勞德瑞 Dori Laub, 劉裘蒂譯, 《見證的危機——文學·歷史與心理分析》(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台北: 麥田出版, 1997), 頁 26。